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晚年岁月

 **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主要参考书目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
-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李锐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李锐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著，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
-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 《领袖·元帅·战友》，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 《回忆与研究》（下），李维汉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36 年版。
-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出使苏联八年》，刘晓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 《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李银桥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 《毛泽东》，（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央文献研究室
-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红旗出版社 1987 年版。
-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七、八章，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 《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新华半月刊》1956 年至 1960 年。
- 《新华月报》1961 年至 1966 年。

《人民日报》1966年至1976年，人民日报社出版。

《红旗》1958年至1976年，红旗杂志社出版。

《解放军报》1965年至1976年，解放军报社出版。

《文献和研究》1981年至198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

《党史研究》1980年至198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党史通讯》1980年至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

《党的文献》1988年至199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至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思想论坛》1988年至1992年，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办。

《毛泽东思想研究》1983年至1992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毛泽东之路 晚年岁月

第一章 走自己的路

19世纪末，一名叫李提摩大的英国教士在一篇中文译文中偶尔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据考证，这是中文书刊上第一次出现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之父的名字，李提摩大当然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去接受马克思的学说，这位基督教的布道者做梦也想不到，半个世纪后的1956年初，中国为建立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接近尾声……

一 《论十大关系》

这些日子，毛泽东异常兴奋。1月15日，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第4天，北京市即率先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那天，在曾经主持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从工人、店员、农民和工商业者代表手中接过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喜报。随即，天津、重庆、杭州、哈尔滨、上海、旅大、呼和浩特、长春……各大中城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喜报接踵而来。当秘书田家英按他的吩咐，将起草好的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消息稿送他审阅时，毛泽东咯咯地笑着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的确，《高潮》一书出版之际，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已经在全国兴起。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毛泽东为成功而喜悦，却并没有为之陶醉。

他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聪明过人的田家英竟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显然他还没有想过“下一步”的事情，但是毛泽东已经在思考新问题了。

那是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一天，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汇报中，他谈起为了准备中共八大的报告，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一事，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欣然承担了此任。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同时并举的方针，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统一在这个进程中。改造和建设齐头共进。现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涌起，成功在望，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尽管它还会有些遗留任务，但已处于次要地位，而经济建设将长时期成为主要任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建设方面。

从1953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成功道路，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与之比较，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是自己的创造较少。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过现代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它不得不在最初的经济发展阶段借鉴苏联模式，计划、财政、金融、物资流通等各项体制都是仿效苏联的。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这样说过：“我们搞革命有经验，但建设没有经验，还须硬搬一部分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不向苏联学向谁学呢？”苏联“老大哥”固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模仿的样板，但地理、资源、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的经验即使是正确的，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的地方，何况它还有不少负面的东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

经济建设全盘仿效苏联，已经显露一些问题。弊端何在？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毛泽东决定做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薄一波所谈正合他意。

中南海颐年堂。

又听完一个部门的汇报，毛泽东神情疲惫他说：“我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从2月14日开始的这次汇报，真可谓“连续作战”。35年后，薄一波回忆这件事时，列了一个详细的汇报日程表：

2月14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管重工业），15日电力工业部，16日石油工业部，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19日建委，20日建工部，21日二机部、城建局，22日二机部，25日重工业部，26日石油工业部，27日地质部，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管轻工业）、纺织工业部，2日地方工业部，3日轻工业部，4日手工业管理局；5日国务院第六办公室（主管交通、邮电），6日铁道部，8日交通部，9日邮电部、民航局；13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管农林水利），15日农业部，16日水利部，17日林业部、气象局；19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管财政贸易），26日商业部，27日外贸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9日财政部，10日人民银行；18、19、20、21、22日计委。

薄一波在回忆中还举2月15日这天为例，说明毛泽东听汇报的辛劳。这天早晨9时40分开始，由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汇报工作，13时左右结束；17时20分，毛泽东去勤政殿，会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团；19时10分会见结束，回到颐年堂继续听汇报，直到22时10分结束。

毛泽东从汇报中大量获得了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信息，概括、归纳、分析、判断，他一边听汇报，一边思索所提出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

“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大多，霸道大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毛泽东指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说。轻、纺两部负责人在汇报中充分介绍了轻纺工业这几年来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轻工业部门基建投资与工业利润的比例，1953年为1：1.9，1954年为1：2.1，1955年为1：3.1，呈逐年增大的趋势。纺织工业部门新建一座毛纺厂，总投资约2070万元，投产后一年的时间，即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4600万元，是投资的2.2倍。轻纺工业部门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如此突出，却有自己的苦衷：国家对轻纺工业投资少，根据国务院各部编制的“二五”计划草案汇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将扩大到11：1（“一五”计划大约是7：1）；轻纺工业企业设备陈旧，潜力难以发挥，产品数量、质量、花色、品种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轻工业部门所需设备，有一部分机械工业部门不能供应；轻纺工业所需的农产品原料，农业部门不能按量供应。但是，对于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顾虑重重，担心冲击重工业这个中心。毛泽东看出这一点，批评说：“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他还说：“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

“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毛泽东话里带着些揶揄。计委等部门的汇报表明，沿海工业在建国头几年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极大作用，据1952年统计，沿海各省

市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钢铁工业80%分布在沿海，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也分布在沿海。以上海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底，上海市实现的利润占第一个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9%。“一五”计划从合理布局和国防安全出发，严格控制在沿海地区搞新的基本建设，要求新项目主要放在内地。1954年以后，沿海不建新厂，限制了发展。轻工业部提出，扩建、改建现有企业，比新建企业节省投资2550%，但轻工业企业多在沿海，不敢作大的扩建。毛泽东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强调了一句，“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

“我去年出去了几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他们。地方同中央有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也不通知他们；他们的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国务院三办的汇报还没开始，毛泽东就讲了这么一番话，看来，他已经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所了解。国务院部委的汇报使他的了解更全面更具体。各省市自治区普遍有多办工厂的愿望，不但有兴趣搞轻工业，而且也有兴趣搞重工业，但地方有顾虑，一怕中央不准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去。财政方面名义上是四级（中央、省、县、乡）财政，实际上是一级半，只有中央一级是完整的，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省级财政收入只有三项（5%的农业税附加、3%的总预备费、自筹部分资金），除此而外，与中央级预算单位区别不大；至于县、乡两级则没有什么财权，商业部规定部管51种商品价格，总公司管208种，但实际上总公司管了509种，把本该由地方管的商品也纳入了总公司管的范围，使地方无法进行工贸平衡。毛泽东对作汇报的部委负责人说：“你们大家都来自地方，到中央就讲中央的话了。讲也要讲，但要让他们监督。”他显然为地方“抱不平”。

就在毛泽东听汇报的过程中，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令东西方为之震动的大事。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2月24日晚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一次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代表们时而屏气静听，时而群情激愤，时而掌声雷动。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个后来被称作“秘密报告”的文件，很快便在苏联国内外传开来，西方世界大作文章，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震惊不已，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斯大林这一被崇拜的偶像竟然会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信的，不信的，半信不信的，心态各异。

中国呢？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人民日报》于4月5日发表了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文章说，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

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其“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但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了对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文章还对西方某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中伤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向国内外公开表明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态度。

对毛泽东来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虽然有些出入意料，但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不仅因为他在1955年底即已提出“以苏为鉴”，而且更因为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曾亲身经历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的失误。至少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认为斯大林绝对正确、毫无错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暴露了斯大林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许多严重错误，使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和苏联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因此，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讲话。他一开始就向与会者提了这个问题。紧接着他自己作了回答：“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经过近两个月的“汇报工程”，又经过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震动，毛泽东将在今天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全面阐述。

毛泽东一共讲了10个问题：

-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 九、是非关系；
- 十、中国和外国关系。

这个讲话的题目因此叫《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前5节说的是经济问题（其实第五节既属经济范畴，又属政治范畴，因为它讲的是分权），讲话的后5节说的是政治和思想文化问题。毛泽东讲完之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讨论了三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邀集湖北、广东省委和武汉、广州市委负责人开了四天汇报会，这是继听国务院各部委办汇报之后，毛泽东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汇报的开始。

5月2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再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次讲话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省市委书记汇报会提出的一些意见。

20多年之后，一位美国学者这样评论说：

1956年4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提交了供选择的建议，即他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篇讲话用词含义模糊但要求却十分清楚，即放弃苏联式的五年计划，这篇讲话描绘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

这位美国学者所言尽管并非完全准确，但有一点意思是说对了，即《论十大关系》已经开始突破苏联模式了。

苏联模式，严格说起来应该叫“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就经济方面而言，它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单一公有化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实行超阶段的所有制公有化。1928年中期，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2%弱，20年代末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运动，加速农村公有化进程，强迫命令大批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第二，以牺牲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源于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前者必须大于两者当年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之和，方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苏联确定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是却不惜挤压农业和轻工业，一是减少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将资金用于重工业；二是对农业实行高征购，但收购价格却又远远低于农业成本。第三，超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高速度发展经济，在苏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集体化的发展速度，二是生产发展速度。苏联“一五”计划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180%，其中重工业生产总值增长230%，平均每年的增长率竟高达36%和46%，实际增长虽然没有达到规定速度，但也是以22%的年均增长率速度发展的。“二五”计划虽然规定的速度较之“一五”计划有所降低，但斯大林仍要求每年至少增长13—14%，而且每年的实际增长速度都超过“一五”计划的相应指标，例如1934年增长19%，1935年增长23%，1936年增长29%，速度仍旧居高不下。第四，高积累、低消费的比例。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因而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重积累，轻消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大量的投资用于盲目上马的基本建设项目，很少顾及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粮食产量竟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第五，以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一开始就形成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列宁在其晚年曾对这种体制作过改进的努力，但随着他的逝世未能进行下去。斯大林不仅没有去革新过分集权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反而将列宁时期条条块块相结合的体制变成条条为主的统一管理体制，中央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大权；而地方的自主权则少之又少，1936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地方工业仅占10%。本已集中的管理体制在斯大林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第六，排斥市场的统一计划经济。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由中央政府制定出详尽琐细的国民经济计划，以此作为全国经济生活运转的唯一依据，产品的产、供、销完全按计划进行，受计划支配。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没有市场交换的成分。

《论十大关系》首先肯定“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毋需多作说明，可是苏联几十年为这个简单的道理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一直抓农业和轻工业，所以“一五”计划期间既保证了重工业的发展，又比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生活需要。毛泽东从调查中感到，中国在农、轻、重之间关系上并非毫无问题了，相反不少人总是以为

优先发展重工业就要更多地投资于重工业而挤占农业、轻工业的资金，毛泽东说：“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从长远的观点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既能为重工业的发展准备原料和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又能为重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使得重工业发展更快更好。毛泽东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思路中独辟蹊径，使中国的产业发展能脱出窠臼，避免苏联模式的积弊。

《论十大关系》阐述的“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关系”的方针，是对苏联又一个教训的总结。毛泽东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农村强制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对农民的剥夺十分严重，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伤，加之对农业投入少，苏联的粮食产量竟达不到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毛泽东甚感痛心：“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怎么说呢？”中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教训。1954年部分地区遭灾减产，国家却多征购了70亿斤粮食，农民有意见，1955年国家少购了70亿斤粮食，又搞了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农民手里当年多了200亿斤粮食。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道：“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这是对苏联重生产、轻生活，只强调生产者觉悟、不顾及群众物质利益政策的否定。

最令人注目的，是《论十大关系》论及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这是从体制上突破苏联模式，纵向集权的管理体制发端于苏联，却遍及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未能例外。这种体制，看起来虽然中央的指挥颇具效力，但地方缺乏灵活性和主动性，只能被动地随中央的“指挥棒”转。毛泽东提出要有两个积极性，就是要给地方松绑，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在产业发展的方向、布局、结构、重点方面，在资金使用、物资分配、人员调度方面，顾及到地方的利益，使地方发挥出积极性来。毛泽东还提出了要在统一领导下给工厂一点权利的问题。他说，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的更加活泼，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中央、地方同企业的关系，其实不只是一种经济体制，它还是政治体制，因为这些关系之间既有利益牵连，也有权力分配问题。所以，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谈到要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指出它的制度同中国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的发展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比如美国的州可以立法，而中国的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他提出，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久以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舆论先声。尽管这里所论及的只是纵向放权问题，还未涉及横向分权、权力监督，但它毕竟在开始摇动已经存在 20 多年并居支配地位的观念了。

对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论述，《论十大关系》更多地是出自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的总结。这两个问题彼此有仲关联。建国之初，战事仍然频繁，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紧张，因而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不甚注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内地与沿海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70%的工业都集中在沿海，更加注意倾力发展内地工业，不大积极利用基础本来就好的沿海工业，出于同样的原因，国防建设在整个“一五”计划期间占国家预算的 30%，显然处在投资的重点位置上。毛泽东也提出了对发展内地工业、对进行国防建设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像他谈及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关系时一样，他指出，真想发展内地工业，真想搞好国防建设，那就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以支持和发展内地工业，那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这年春天所听汇报只限于国务院的经济工作部门，但是他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却并不限于经济工作，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占了整个讲话的一半还要多，尽管毛泽东后来说过“十大关系中前五条是主要的”。

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尚未更多地涉及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及方针，主要地还是政治和思想作风方面。比如个人专断、肃反斗争扩大化、党内斗争方面的错误等等。这使毛泽东在思考经济工作的同时，也从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方面去思索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问题，以防止重蹈苏联错误的覆辙。在民族关系方面，他提出要接受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不正常的教训，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派关系方面，他说中国和苏联不同，苏联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这个主张后来被概括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革命与反革命关系方面，毛泽东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指出斯大林抓到一个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清查反革命还是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同时给他们以生活出路和改过自新的机会。在是非关系方面，毛泽东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不分犯错误与反革命的界限，错杀了很多人。”他提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看二帮。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主张。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都不是 1956 年才提出来的。1951 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请毛泽东题词，他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戏剧界发生了关于京剧问题的争论，一派主张全盘继承，一派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认为，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当时，“百花齐放” {ewc MV IMAGE, MV IMAGE, !09100690_0017_1.bmp} 主要讲的是戏

曲创作和表演。“百家争鸣”是1953年毛泽东对历史研究工作提出的方针。那年，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陈伯达任委员会主任。陈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但是，当时这两个方针都只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或某一个方面而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较严重。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建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经过几次批判运动以后，一些“左”的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滋生起来，比如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对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乱扣政治帽子，以至无限上纲等等。还有一个是在移植苏联模式时，把苏联在学术研究中的宗派主义和以政治干预学术研究的粗暴作风，不自觉地搬到了中国；以苏联官方的意见作为评判学术研究中不同派别意见的是非标准。这造成了一种窒息文艺和学术研究活跃空气的氛围，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对中国建设道路探索的思考，以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使得毛泽东至少对上述原因的第二个方面有所认识。这年4月，他曾要求中宣部专门讨论一下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的问题。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把“双百”方针作为整个艺术和学术工作的方针，正是他思考的结果，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那天，他也说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他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又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内容。但是，不难看出，“双百”方针的精神，同《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因此，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论十大关系》内容的一种补充和延伸。

民族关系、党派关系、敌我关系，是非关系、艺术流派和学术派别关系，尽管它们并不能囊括社会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所有方面，但无疑是这所有方面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里最为敏感的部分。斯大林就是在这几种关系上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难得的借鉴，毛泽东才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上述重要思想。同经济建设一样，中国在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上也开始探寻新的路子。

走出苏联模式的框框并非易事，因为事情本身就要有个过程，何况这模式的弊端并不是全部被察觉和认识到了，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本来设想在15年内完成的事情，竟然压缩在3年内完成了，而这短短几年的改造。建立的所有制结构又是那样的单一。过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几乎在它建立时起，便已显现出缺陷。然而，毛泽东在听汇报和作讲话时都没有注意到，或是并不认为这属于所有制结构本身的缺陷。与此直接相关的计划经济模式问题，就更没有在这篇重点阐述经济关系的讲话中提及。至于超高速发展，毛泽东则不但不将其作为苏联建设的教训之一，反而认为否定高速度是“右倾保守”思想作怪。这年年初，他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体现了他的这一看法。在序言中，毛泽东说，工业化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

的规模和速度都不能照原来的样子去做了，而要扩大和加快。1月，他会见一个外国新闻代表团，客人问：五年计划草案说今年才能达到五分之一的合作化，为什么几个月内发展这样快？毛泽东说：过去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以前没有了解私营工商业改造会那么快；我们自己也未料到有这样大的发展。因此要不断修正计划，要看出这种可能性来。不久以后，他对反冒进持保留态度这件事，也可折射出他的超高速发展经济的思想。尽管如此，《论十大关系》毕竟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四年后，毛泽东自己这样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二 “起宏图”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

初夏，作完《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毛泽东去了广州。不知是为前段探索的初步成果而高兴，还是为即将来临的建设高潮而激动，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毛泽东忽发奇想，要到他从未下过水的长江游泳。几乎所有的随行人员都不同意，但谁都没能劝止任毛泽东。他先从广州到长沙，游了湘江，然后去武汉，在长江中流击水，一游就是十六七里。

铺纸，研墨，挥毫，兴致盎然的毛泽东写下了开头和下面的诗句。

……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

有对已往成就的赞美——“一桥飞架南北”，当时正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施工进展神速；也有对未来远景的憧憬——“高峡出平湖”，将来打算在鄂西川东长江三峡一带建立巨型水坝，蓄水发电：那时，水坝上游高峡间汹涌湍急的江面将变成平静的大湖。诗句同诗作者当时的心境似乎有某种暗合：再过些日子，中国共产党将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以往，规划未来，描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国社会发 展宏图。因此，昨天和明天，都是诗人思维的兴奋点。

11年前，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头：抗日战争开始显露出胜利的曙光，而建什么国的斗争也已形成暴风雨来临前的浓云密雾。党的七大把握住了这个历史的转折，四年后、它所确定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得以实现。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历史又一次处于转变的关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几亿中国人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八大将如何把握这次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转变呢？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

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8月30日开始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开宗明义，一开始讲话就说明了八大的目的和宗旨。

总结经验也好，加强团结也好，目的都在于建设。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八大召开前后反复作了强调。在8月22日七届七中全会讨论八大议题与发言安排时，毛泽东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1/3是讲建设。毛泽东在这里提的报告是八大的政治报告。他说报告的重点在建设，实际上也就是讲八大的重点在建设。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此讲得更明确。他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而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根源。八大闭幕以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讲道：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年，这么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几个月前，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虽然重点是讲经济建设，但他没有明确讲经济建设是今后工作的重点。这更多地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尚在高潮之中，全党的注意力也还在三大改造方面。到今年6月底止，社会主义改造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入社农户已占全国总农户的91.7%；有组织的手工业者占全体手工业者的90%，私营工业已有占产值99%和占职工数98%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私营商业也有68%的户数和74%的从业人员实现了改造。情况已经发生更大的变化，改造已经成功。把全党的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不仅具有了可能，而且极为必要，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反复强调重心在建设，正是为了进一步唤起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对此的自觉性。如果是在作一篇大文章的话，那么毛泽东在这时点明了《论十大关系》尚未点明的题目。根据这一点，八大确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而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八大是按照《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来设计的。在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批评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意义而忽略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观点，要求进一步发展轻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八大确定在“二五”计划期间要增加对轻工业的投入。在工业布局方面，八大提出要注意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强调要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发展沿海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在中央经济部门和地方经济组织关系方面，八大提出要把两者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关系方面，八大强调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要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和保证农民能够增加收入，坚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政策。在民族关系方面，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方面，在处理

反革命问题上，八大都把《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具体化了，并形成一系列政策规范。刘少奇后来曾说过：“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

当然，八大路线并不是简单重复《论十大关系》，它比《论十大关系》更丰富、更具体、更全面，有些方面还比《论十大关系》有所前进和突破。比如，大会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提出必须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是《论十大关系》没有提及的问题，而在毛泽东本人那里，对反冒进尚持保留态度。又比如，陈云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体——补充”的构想，大会确认了这一构想，指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集中经营是工商业、手工业、农业的主体，分散经营作为其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也是《论十大关系》没有论及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所设计的是铁板一块的体制，在这个体制内，公有制是唯一的经济基础，管理方式是集中经营，市场结构只有国家市场。“主体——补充”的结构，无疑是对原来所设想的体制模式的一种调整，比起那种铁板一块的体制，它显得有了活力。

毛泽东本人也在继续探索。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走那个老路呢？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围绕这件“新事情”，为了避免在这件“新事情”上走老路、栽筋斗，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也讲了一些他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未曾讲到的意思。

他谈到掌握新的科学技术问题。他说：“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经济起步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来年间，由于各国（特别是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主要致力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因而到50年代中期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进入发达期，但这丝毫不说明人类的科学技术停止了发展，更不能说明科学技术对起步阶段的经济的发展无足轻重。毛泽东不仅提到要学习科学技术，而且还特别提出要学会“新”技术，这说明他在科学技术与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上颇有远见。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由此谈到了造就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

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新技术的掌握，都离不开知识分子，都需要大批专门人才。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才基础实在薄弱，1949年全国各类高级知识分子总计才6万多人，全国各类科研机构才40个左右。新中国最初几年经过努力，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没有根本改观。到1955年底，全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只有几万名，在校学生每万居民中只有5人，而苏联有86人，波兰有50人，西方发达国家的比例就更高了。人才奇缺成为科技发展落后的关键原因。解决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充分发挥现有专门人才的作用，二是大力培养新的人才。后者具有长远的根本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提出“要造就知识分子”。

更为深刻之处在于，毛泽东提出要把政治中央委员会变成科学中央委员会，这是在中国社会转变中执政党实行重点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当中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就面临一种全新的任务，这些政治家、军事家原来熟悉的东西大多已闲置起来了，大量不熟悉的事情摆在面前，这就要求中央领导机关的构成实行转变，把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变成以科学家、经济学家为主的中央委员会。这个转变的实现，也有两种途径，一是原有的中央组成人员自身转化为科学家和专门人才，二是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充实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虽然没有说明这两种途径，但却已明确指出了党中央成分改变的必要性和必然趋势。

任何国家的建设都是在一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的，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局势的安定或纷乱，二是国家间的往来或隔绝。无法否认，不管处于哪种国际环境的背景，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势必受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国家的领导人对国际环境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把握时机，作出决策。八大期间，毛泽东对国际局势作了分析。他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隔了二十多年，以后间隔时间还要延长，也许不是一二十年而是三四十年，或者可能根本不能打。目前的国际局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反映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政治报告说世界局势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从国际局势，毛泽东谈到了对外交往。他说：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都将要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有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有困难，实际上新中国同样有严重的困难，也要通过对外交往来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与文化。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当时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对我国采取封锁政策，隔绝中国与西方的往来。同时，朝鲜战争使新中国再次承受了巨大的人、财、物负担，但一海之隔的日本经济却因为美国向其大量的军需订货而受到刺激和发展。一场战争结束后，中国因此而大大增加了支出，日本则发了横财。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现在刚开始搞一点工业，开办一些学校，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就着力反映

了上述思想。最初的稿子送给他审阅时，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部分讲商业工作时，批语说内容“没有对外商业”，后来修改时加上了对外贸易的内容。8月上旬修改稿送他审改时，他在概括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内容时，加写了一句话：“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八大期间，在一次同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形象地讲道：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能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这里观察中外关系的视野更为开阔，因为它不仅是从中国自身来分析问题，而且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了。当然，这样提出问题的目的，既是为了有利于世界人民，又是而且首先是为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民主问题。他在大会期间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毛泽东还告诉外宾：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力“针”，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但那时只讲了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民主问题。到这时毛泽东讲民主问题，范围显然已经大力扩展了，甚至可以理解为扩大到了全社会。民主问题本来就不单单是文艺民主、学术民主，它还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但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看起来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普遍存在，在经济起步的国度里就更为突出。毛泽东看到了这种矛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内，要动员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集权统治（或叫集中领导），这样才能保持全社会的统一意志，以有效地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但这会同发扬民主发生某种冲突。在某些人看来，必须牺牲民主以换取效率，取消自由以赢得发展。毛泽东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出解决矛盾的明确方案，但他却主张要扩大民主，指出了集中的消极一面，并同他的同事们在思考一条合理地解决问题的途径。

尽管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尽管没作详尽的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八大制定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而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国际环境以及执政党领导、民主政治等等，是实现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正式拉开实现国家工业化事业的大幕之前，毛泽东提出这些关键性问题，不能不说他具有深邃的眼光。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正是在这次大会前，他谈到准备退出主席的职位：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我是准备好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八大通过的党章把“设立名誉主席”一条正式列入，是毛泽东提议的结果。此举是退出主席职位的一个步骤。毛泽东曾谈到理由，比如身体、年龄、精力方面的原因；还比如考虑国家安全，利于顺利、平稳地完成交接班等等。如果联系当时苏共内部正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也一再强调反对个人崇拜的背景，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有比前述更深刻的原因。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将树立一个打破终身制的榜样，对于反对和防止个人崇拜的现象，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遗憾的是，毛泽东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这成为他晚年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是后话。

不管怎样，毛泽东不会一日稍懈。八大制定了共和国的宏图，他将领导把这个宏图化为现实的巨大工程，而且将为此继续探索。

三 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

1937年。

2月的陕北，春寒料峭。延安凤凰山北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像是不觉寒意，正在全神贯注地读书。这是两位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和爱森堡合写的《辩证唯物论教程》。

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的颞抗。但是，布哈林把矛盾和颞抗看作同一，以为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矛盾也没有了。伊里奇回答这种主张，这样说着：

“这是极端不正确的。颞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之下，前者消灭了，后者残留着。”

书是李达、雷仲坚翻译的。“颞抗”用现在的译法就是“对抗”，“伊里奇”是列宁。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用毛笔添添砚台里的墨汁，在“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阶级的颞抗”、“任何矛盾也没有了”和“后者残留着”这几句话下面划上波浪线符号，然后在这段话旁边写了一段批语。

矛盾普遍的存在着，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许多矛盾是不发展成为对抗形势的：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文化领域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领域中，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劳心与劳力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而且认为这时的矛盾不会发展成为对抗的形势。

几个月后，身穿补丁衣服的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唯物论》课程。在讲“矛盾统一法则”这一节时，他这样说道：

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矛盾统一法则”后来改写成毛泽东的名篇《矛盾论》。这里说的是苏联的例子，但在毛泽东看来，它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情况。这是毛泽东较早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是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距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还相当远，毛泽东却看到了将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而且进一步判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质。当然，推动毛泽东认识这个问题的，逻辑的力量超过实践的力量。从理论上说，由于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因此推定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也是顺理成章的。就实践而言，情况却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在中国远未成为现实，而当时的现实也不存在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紧迫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还是一种论断，不仅不系统、不展开，而且还有缺陷（比如只讲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对抗性矛盾，没有讲在这个社会阶段也有对抗性矛盾，等等）。

20年后，情形完全倒了过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首先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客观现实了。

也是2月，不过早已不在陕北的窑洞，而是古色古香的中南海菊香书屋。

伏案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服过安眠药后，仍无睡意，心事重重，几次睁开眼问卫士长：“恩来回来没有？”“恩来还没回来吗？”

周恩来当时在国外访问，定于这天回京。在周恩来的这次访问中，对苏联、匈牙利、波兰的访问，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

自从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国际共运内部就再不曾平静过。似乎是一种连锁反应，6月，已趋紧张的波兰局势更加不稳，发生波兹南大罢工的事件，人们要求苏军撤出波兰领土，要求波兰退出华沙条约，对不正常的波苏关系、执政党内的个人崇拜和不民主现象以及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的状况表示了强烈不满甚至是愤慨。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的事件更加令人震惊：人们始而游行示威，继而冲击机关、电台、工厂，抢劫枪枝弹药，焚烧建筑，同政府军发生激烈的枪战。事情的起因同波兰事件惊人地相似：人们抗议执政党领导人的高压统治和专断作风，要求改变苏匈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强烈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波匈事件最终得到平息。1957年1月，周恩来应苏联政府邀请访苏，主要是想就波匈事件交换意见。周恩来还受到波兰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邀请访问这两个国家，讨论波匈事件之后的中波、中匈关系。

波匈事件究竟如何？苏共看法怎样？周恩来同苏、波、匈三国领导人谈得如何？在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能不为之而牵肠挂肚吗？

然而，毛泽东这些日子所关注的，又远不只是国际共运内部的风波。1956年，毛泽东说过是“多事之秋”，因为国际共运的风波在中国也泛起一阵涟漪。八大之后，国内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界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动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评头品足、议论纷纷。有的为就业和安置问题无法解决，有的为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有的为难以继续升学，有的为入社后生活水平下降、社内经营管理不善和对入社农民生产资料处理不当、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发展。这些事态暴露了国内社会改造过于急促、经济建设中冒进情绪仍未克服和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命令主义等等问题。当然，罢工也好，罢课也好，退社也好，在国内都是少数人；知识界的批评比起波匈国内的政治抗议也平和得多。但是，执政刚刚七年的共产党第一次面对老百姓向自己的罢工、罢课，许多人还是感到了茫然、惶惑和不解，有的人甚至神经过敏、如遇敌情，试图以高压的办法对付之。

毛泽东呢？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有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

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国内少数人闹事时，从这样三个方面分析了原因。分析无疑是中肯的。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对原因的一般分析上。在他看来，苏联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东欧波匈事件的爆发，以及中国少数人闹事，都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反映。他继续说道：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

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历史显得这样富有戏剧性。30年代中期，当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时，斯大林却在克里姆林宫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建成。从此再不提社会主义还有矛盾。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将永远锁住矛盾的“潘多拉魔盒”，从此歌舞升平，一帆风顺。斯大林在理论上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因为至少在他之前，列宁已经说过“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

毛泽东正相反。尽管中国没有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社会实践的历史，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毛泽东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预见到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确立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矛盾，而且在它确立以后矛盾也不会消失。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又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更大范围内的历史经验中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年4月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还将有自己的矛盾。”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加写道：“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结尾又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较早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

整个1956年间，毛泽东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这年8月，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毛泽东不但在正式场合讲这个问题，而且在私人交往中也谈到上述意思。12月4日，他在给从40年代中期即已建立情谊的黄炎培先生复信时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当多事之秋的1956年过去之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已经是无可怀疑的问题了。毛泽东的思考转向

了矛盾问题的纵深。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国内少数人闹事，都不是单一因素引发，它们各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换句话说，它们是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运动的结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或者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结构。这个矛盾体系包含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和各种矛盾的运动规律、特征，各种矛盾相互之间的关系、作用等等一系列范畴。显然，比起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是件更复杂和困难的事情，同时也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认识，从 1956 年春天就开始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方面的一些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针对文艺领域和学术领域里不同流派、不同学说之间的矛盾而提出来的，除了这些，毛泽东还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不同于阶级社会，谈到人民内部的问题（矛盾）不能用镇压的方法，而要用说服的方法。批评的方法。当然，这些认识还是初步的。不过，1956 年的实践和认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和国内外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极大地推进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认识。

就在周恩来出访回京半个月后，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与会者达 1800 余人，当时正在出席、列席第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因而颇令人注目。然而，更令人注目的，还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以《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所发表的长篇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说：“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这些意识形态是为经济服务的，要符合经济基础，如果不符合就发生矛盾。”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观点。他们还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里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特点是什么，他们没有谈过。这自然是时代条件造成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阶级社会消灭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优于以前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还有没有矛盾？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同它有没有矛盾？已经具有认识这一问题的时代条件的斯大林，却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长时期不作回答。实际上，斯大林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有矛盾的，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就只有和谐，没有差异了。直到他去世前才承认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是有矛盾的，处理好了这些矛盾不会变成对立（即对抗），不会导致冲突。

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仅肯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存在矛盾，而且比斯大林更进一步地指出它们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斯大林最终也没能明确提出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明确除了具有理论方面的意义外，在实践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生产力同样是决定性的因素，其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其发展而不断调整，

因而要求其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体制相应地改进和革新。换句话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多方面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毛泽东还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问题。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关于两类矛盾，斯大林曾经谈到，但他使用的是“结合内部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这样的概念，它们不仅在表述上不够严谨和准确，而且在内容上也显得简单和狭窄。更进一步的局限性还在于，斯大林所谈的两种矛盾，是指存在于过渡时期的；对于两种矛盾在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以后是否存在、怎样存在的问题，斯大林未曾说过。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概念，而且就讲话的重点和内容而言，已经含有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两类矛盾重点的思想，这就弥补了斯大林关于两类矛盾思想的不足，并且进一步作了发展。因为斯大林从未谈过两类矛盾的重点问题，而这个问题对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和战略方向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

既然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矛盾的重点，毛泽东通篇讲话就重点讲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他讲话的题目。毛泽东提出了两点思想。第一是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他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他说：“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分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毛泽东还指明，这是从“左”的方面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误作敌我矛盾。他也谈到从右的方面混淆敌我矛盾的倾向，即认敌为我。第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方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是错误的。”他提出，要把延安时期提出的解决共产党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推广到整个人民内部，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在阐述农业合作化、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科学文化工作、少数人闹事等问题时，毛泽东反复用了“改造”、“学习”、“教育”、“争鸣”、“思想工作”、“监督”等等概念，以作为解决各方面矛盾的具体方法。改造、学习、教育、争鸣、思想工作等等一类的方法，说到底是对“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具体化，是这个公式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运用。

不用粗暴的方法而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首先是对斯大林晚年错误的鉴戒，是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处理内部矛盾问题上的教训的结果。晚年的斯大林在联共党内、苏联国内所犯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以粗暴甚至是严酷的手段来对待党内、政府内和人民群众内的各种不同意见、认识和主张，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的领导人，仿效斯大林的这类做法，失去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信任，甚至引起了他们的怨愤，以致产生政治风波。苏共和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都告诉执政的共产党人：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决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这给刚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前车之鉴。

同时，以批评的方法解决内部的矛盾，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传统的承继，是中共的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广泛的运用。对于共产党来说，“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并不是50年代的发明，它产生于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自那以后，它成为党内生活特别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原则之一。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把这个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原则，又用于处理她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同样获得了积极的结果。这种有益的实践，甚至推动民主党派内部、工商界内部也采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得到运用。毛泽东的讲话，是把共产党的方法推及到全社会，使之成为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如此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初步构筑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体系。差不多一年前，他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看作是这个思想体系的经济篇。这次讲话则着重于从政治方面提出问题，可以看作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政治篇。当然，1957年的讲话视角更宏阔，不只是讲政治，还就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阐述，因而比《论十大关系》深刻而更富理论性。不管怎么说，两篇讲话互为补充，总成一体，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意义非凡的发展。

人们当时或许不能完全理解毛泽东这次讲话非凡的理论意义，但是却感受到了一股清新之风，一扫波匈事件后笼罩在心头的愁云迷雾，觉得中国找到了防止类似波匈事件和解决这类事件的正确途径。的确，毛泽东的讲话提出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不能用专政手段来对付，而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他反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们开展批评和讨论，容许各种意见和流派的存在与发展；他还一再强调闹事出乱子具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处理少数人闹事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对于闹事做好教育工作，即使是闹事的头子也不要开除。这显示的不只是领导者的胸怀和大度，更是执政党的力量与信心。所以，当毛泽东结束他长达四个钟头的讲话时，与会者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当然，毛泽东的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它不能不带有初步认识事物时所难以避免的不足与疏漏。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历来注重分析主要矛盾的毛泽东，在这个专论矛盾问题的讲话中竟然没有明确讲到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话里包含有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矛盾的重点的思想，但这并不能代替对主要矛盾的确认。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政治概念，它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和反映，两者有联系却并非一回事，后者的概念高于和大于前者。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问题，是毛泽东讲话有重要的思想贡献的地方，但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留下了缺憾。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它自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体系，涉及党派关系、干群关系、利益集团间的关系、艺术与学术流派间的关系、军民关系等等。只靠批评的方法，是无法解决这样复杂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的。中国要发展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近世文明史表明，一个工业化国家，同时必然是法治化国家，即是说法律是调节社会冲突与矛盾的主要手段。中国在建设工业化国家进程中，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以批评的方法来调节社会矛盾，这不同于一般的工业化国家。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走向工业化时，可以完全避开工

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和本来要求。在和平环境里，只有既通过道德规范、思想教育、心灵感化，又通过法律、政策、纪律、章程等各种手段，才能有效而全面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却忽略甚至遗忘了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巨大影响力所致吧。

讲话中有不足与缺陷，毛泽东当时就已意识到了，尽管他未必认识到全部缺陷之所在。在他讲话后第三天，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结论时说，他的讲话不准备全文发表，还要进行“补充”和“修改”。

毛泽东将如何补充与修改呢？

四 新境与误区

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召集完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一路南行，一路讲话，对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作了重申，也作了发挥。

3月17日，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暴露出来，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在讨论中去解决。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方法，别的方法都不要。

第二天，他到济南，在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又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这么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

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上说：过去的那种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3月29日，毛泽东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这些讲话都强调了这样一个意思：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同2月27日的讲话相比较，尽管他仍没有明确讲主要矛盾是什么，但“中心任务是建设”、“同自然界作斗争”等提法已经包含有这个意思。而且，他还肯定了八大的结论。这是对2月讲话的一个重大补充。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即着手修改他的2月讲话。从5月7日到6月17日，一共修改了14稿。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经过修改的这篇讲话，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文章不仅把讲话的思想系统化和进一步理论化了，而且对讲话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发挥，对其中一些需要明确的观点作了论证，对应该阐明而尚未阐明的某些思想作了补充。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文章对讲话中所说“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作了解释，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文章还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其性质与旧社会不同。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国内形势，文章对讲话作了重要补充，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讲话在分析国内对敌斗争形势时说过两句话，

即“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文章从这个分析出发，进一步得出一个重要的论断：“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革命，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而建设被确定为根本任务。这是毛泽东对春天南下讲话精神的延续，它反映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拓展。

关于两类矛盾问题，文章比讲话的分析更细致和严谨。除了增加对“人民”的概念作历史的说明以外，文章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又进一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农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些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另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它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剥削同被剥削的矛盾，列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的特点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它有剥削的一面，又有接受改造、拥护宪法的一面；因而这种本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上述的分析及结论是讲话不曾有的内容，它的补充使两类矛盾的思想更为丰富和全面。

完全可以说，在上述几个问题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认识有新的发展，其思想在短短几个月里达到又一个高度。{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045_1.bmp}无怪乎，毛泽东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东西方的普遍反响。西方有评论说：“毛的讲话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种革新。”还有评论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来得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消极地贬斥过去。”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毛泽东的文章引起更大震动。否定者有之，赞同者亦有之。苏联国内有人仍不承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也有人肯定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毛的报告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既是对中国经验的概括，也是对苏联经验的概括。波兰《人民论坛报》的一篇文章说：“这是苏共二十大后第一个根据近年来的问题和经验如此大规模地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尝试。”文章还把报告当作“中国的思想和实践的伟大成就”，认为它“使我们活跃起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讲话给自斯大林以来的沉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许多人眼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颗思想界的耀眼之星。按照这样一条思路走下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会发生真正的革新。

然而，正是在经过修改之后，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呈现了某种思想上前后矛盾的色彩。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对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与人以上，他一方面讲“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人认为毛泽东在修改讲话时只是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的论述，并认为这种论述对于防止“和平演变”还有预见性和现实性。这种理解恐怕不准确。从上面所引的话可以知道，毛泽东在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之前，已经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各

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两个概念，显然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如果说这段后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他的另一段话的意思则明白无误了：“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在春天的讲话中，毛泽东就留下了一个缺憾，即没有明确阐明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修改稿在对此有所弥补的同时，又留下了新的缺憾：即一方面说今后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单就强调阶级斗争这一点而言，他的思想比讲话时还有某种倒退。说到底，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仍有某种犹疑，仍然没有获得彻底的认识，

同强调阶级斗争相联系，毛泽东在修改稿里特别提到了讲话中未曾讲到的批判修正主义问题。在讲话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改稿则不同了。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按照上述解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虽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但修正主义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因而前者属于思想认识范围的问题，后者属于政治范围的问题，后者当然比前者更加危险。

面临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人们思想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历史讲，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最长，造成的危害最大。从现实讲，中国在建国头几年已经照搬了苏联经验中的一些教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思想上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此。突出批判修正主义，必然转移人们对教条主义的警觉，放松同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毛泽东这段时间思想上的矛盾。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经过修改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去考察他2月讲话以后到讲话正式发表前这一段他的其他讲话或文章，那么，毛泽东的思想上的矛盾甚至倒退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3月份，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他还说，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按照这个意思，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革命还没有完结，还要“经常”进行。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经常”进行革命，实际上就是经常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自己就说：“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毛泽东上述论断不仅使他关于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判断大打折扣，而且带来某些疑惑甚至是隐患。比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政

治革命，究竟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毛泽东没有说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革命，是指夺取政权的暴力行为，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斗争过程。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仍然提政治革命，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上十分危险。如果再联系后来被称作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内乱，就会觉得“政治革命”概念的提出不能不是一个错误的萌芽。

还是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认为，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了很多批判，但却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稍后一些时间，毛泽东在一篇写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里说，一部分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而一部分有修正主义思想的人，“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一个“比较危险，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毛泽东的倾向性十分明显。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篇文章里，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左”比右好的观点。然而，在他的潜意识里不也透露出“左”比右好的信息吗？

似乎不大好理解。短短几个月里，毛泽东的思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矛盾？那年从春到夏所发生的事情，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1957年的春天。

自然界的气候没有显出有什么特别来，中国社会却不然了。尽管从上一年的秋天开始，国内连续发生小规模罢工、罢课、退社风潮，知识界也不平静，议论纷纷，但是共产党却是不压不禁，反倒显出一种豁达与宽容。

2月，毛泽东发表讲话，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们尽情发表意见。

4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共产党外的人士帮助党整风。

5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一系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人们的确感到了共产党的真诚。有人甚至赞美这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

这里说的是知识分子，它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整个中国都显出了一派生机。当然，反映最快的、最敏感的是知识分子。当早春变成初夏时，“腼腆”已云消雾散，人们完全敞开了心扉。

但是，几乎从一开始，党外人士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就存在差异。对党和政府机关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中共领导人归结为作风问题，并以为通过整风的方式即可解决。党外人士则更多地注意制度问题，认为根治官僚主义的途径在于完善制度。有人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我把整风好比洗澡，法律制度好比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月、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比喻未必妥贴，但他们的注意力和倾向性却很鲜明。从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到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共产党接受监督到健全国家法制，人

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些话说得刺耳了。“好大喜功，偏听偏言，喜怒无常，不爱古董。”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有些话说得不对头了。“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

毛泽东无法平静地接受这些言论：自己倡导起来的整风运动就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吗？关于制度，不是去年已经说清楚了吗？他亲笔修改、审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过，“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有些人认为斯大林错误的发生是制度造成的。文章不仅否定这种观点，而且认为“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这里有两点误解。认为斯大林错误源于制度的观点，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者，他们从根本上否认这个制度并诅咒它；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者，他们拥护这个制度，但认为在这个根本制度下的某些具体制度存在弊病。文章没有区别两种情况，此其误解一。由此而来的另一个误解，就是把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同这个根本制度下的具体制度混为一谈了，一讲制度，便认为是根本制度，一讲制度有弊病，就看作是否定根本制度。在毛泽东看来，现在提出制度问题，是要在中国做否定社会主义的文章。

好大喜功？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无产阶级之功。偏听偏信？偏无产阶级有什么不好？！偏得还有些不够，还要偏一些才好。喜怒无常？有常并不好，不能对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是喜欢。迷信将来？不迷信将来有什么干头？！中国的古董没有多少好东西，有些人拆了牌坊也要流泪。

竟然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了“党天下”，难道共产党不能领导新中国？他们是想自己出来当政，无怪乎要“轮流坐庄”。

毛泽东给党内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鳞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事情真的起了变化。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反右派运动的急风暴雨。几乎所有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人，都被划作了“右派”。那位曾经赞美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作者，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在一夜之间成了著名的“右派六教授”之一。其实，他本人也只不过是“右派”的一个缩影罢了。这时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讲“春天”的社论，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社论说，资产阶级右派“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因而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毛泽东的心理正是直接伴随着变化起伏的政治生活而变化的。在他看来，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右派进攻”说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仍旧尖锐，尤其表现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他不能不修改或补充他的2月讲话的观点和判断。

如果说发动反右派运动之初，毛泽东在思想上主要还是矛盾和犹疑，那么，随着这个运动的大规模展开，他的思想上的失误和偏差就发展起来了。

他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说：“‘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

法是不对的。”又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而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还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毛泽东是离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谈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的巩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清理批判，固然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归根结底，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是最根本的途径。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概括尽管并非十分科学，但从它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点看，八大无疑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毛泽东却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八大的决议。

不过，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结论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当时的经济建设，因此，1957年是一个政治生活与经济建设相对分离的年份。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反右派运动浪潮，另一方面是颇为壮观的经济建设硕果。但是，把阶级矛盾重新认定为主要矛盾，无论如何是理论上的倒退。它表明，曾在这一年达到某种新境界的毛泽东，这时开始又在思想上步入了误区。

1956至1957年，是中国由酝酿、准备到正式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年。就社会的转变而言，这两年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因而同样可以说是历史的关头。没有遵义会议的生死攸关，没有抗战胜利后的命运搏斗，但这丝毫不减弱这两年作为历史关头所具有的意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中国要从这里迈出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也正是这两年，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苏联也好，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也好，既成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权力过分集中，存在个人崇拜和独断专横，所有制结构单一，发展战略偏向重工业，人民生活改善不大，文化领域死气沉沉。凡此种种，在其他某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面临着重要的选择：改革或是守成。或许是现实的力量强大吧，一些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执政党，终于开始反思曾经被认为是至善至美的这一套体制和模式。

对于处在历史关头的毛泽东来讲，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这些事件推进了毛泽东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还在苏共二十大以前，毛泽东已经有了某种自觉，提出“以苏为鉴”，那是因为看到了苏联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盖子以后，毛泽东还看到了苏联模式在本国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这就更加促使他去思考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苏联错误的覆辙、寻求新的道路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都是毛泽东思考的结晶。

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又引起毛泽东的某种忧虑。

对于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病，社会主义阵营内人们的认识是有差异的。甚至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是否有弊病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在著名的“普拉演说”中指出斯大林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制度。此后不久，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则认为

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不是缘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过时，并认为制度不是万能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上述分歧在于：首先，“制度问题”被误解了。铁托所指的“制度”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及与之相应的一套“领导方法和所谓一长制”，他甚至称之为“斯大林制度”。这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两个概念，它类似今天人们所说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已经显露出一些僵化的、呆板的甚至是落后的特征来。例如，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趋向就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中国，一讲“制度”，就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纠正“斯大林制度”被理解成“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接着上述误解而来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规模和深度的认识差异。铁托提出要对整个“斯大林制度”作纠正，而中国党则认为只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因而不需要进行“根本性质的变革”。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在各国长短不一，当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经过了短则 10 年、长则 20 多年的历史，逐渐察觉现行体制的弊病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才刚刚建立不久，因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更多理由去怀疑他们自己建立的这一套体制的合理性，充其量只是试图对这种体制的不完善之处作些修补罢了。

但是，更深入些剖析，就会发现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近乎神圣的理解妨碍了他们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性缺陷。在他们看来，苏联、中国和东欧一些国家今天的现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前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对现实的否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所以，毛泽东忧心忡忡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结果就出现了观念和思维上的矛盾：1955 年底毛泽东告诫人们要“以苏为借鉴”，却又要求加快建立像苏联那样单一公有制结构的步伐；1957 年春他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但又特别强调民主是手段而非目的。

当 1957 年整风运动中国内出现改革“制度”的呼声时，毛泽东顺着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视作如同国际修正主义一样，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他产生了高度警觉，以至于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他没有想到，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思想走入了误区。

话说回来，当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时，他尚未把阶级斗争作为全部工作的重心。思想上的误区与实践中的探索处于一种相对分离的状态。到 1957 年秋，反右派运动展开不到半年时，毛泽东认为运动要告一段落了。他的注意力又回到建设上来，他以为“右派”一闹松了人民群众的干劲，整风反右又把干劲鼓起来了，现在要重新振作，改造中国。1957 年 10 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只花了很少的篇幅讲整风反右，却用大量的篇幅讲农业，讲学习科学技术，讲建设的速度和质量，讲多快好省。字里行间还带着憧憬：

“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高产的国家。”

“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

毛泽东又在规划着未来，反右派斗争似乎只是探索中的一段“插曲”。他将如何设计未来呢？

第二章 社会蓝图

一 莫斯科之行

飞机在跑道上高速滑行之后，抬头升空，冲上蓝天，向北飞去。

机上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此行去苏联参加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副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李先念副总理，乌兰夫副总理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等。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起初，他有些不大想去，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来电盛情邀请他去苏联访问。这次苏联除了举行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外，还召开两个重要会议，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自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一系列事变以来，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是第一次。会议将讨论近几年来和今后几年的国际形势、国际共运的现状与未来及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周恩来劝毛泽东说：“你是党魁么，还得去。”周恩来还告诉他铁托也会去参加会议。其实，除了铁托，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匈牙利党领导人卡达尔、民主德国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保加利亚党领导人日夫科夫、捷克斯洛伐克党领导人诺沃提尼、罗马尼亚党领导人斯托伊卡、阿尔巴尼亚党领导人霍查等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主要领导人都将出席会议。

毛泽东最后接受了赫鲁晓夫邀请，同意率团去苏联，并于 1957 年 11 月 2 日启程。

莫斯科机场。

当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的苏制“图 104”客机抵达这里时，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了。苏方以最高规格接待毛泽东及其一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等几乎全体苏联党政主要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握手寒暄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受中国人民的委托，来到莫斯科向我们的苏联兄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我在 1949 年底、1950 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

8 年前，毛泽东几乎是披着一身战争的硝烟与征尘访问苏联的。新中国建立伊始，满目疮痍，万物凋敝，百废待兴，而人民解放军在华南、西南仍在同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余军队作战。光阴荏苒，8 年后，毛泽东是带着对国家建设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喜悦与自豪踏上苏联土地的。这 8 年里，中国恢复了国民经济和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巨变，使苏联人不能不另眼相看同他们毗邻的中国，以最高规格来接待中国领导人。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过：“中国人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有着巨大障碍需要克服，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对此我是首先加以承认的。”

会晤，访谈，晚宴，参观；

鲜花，美酒，歌声，笑语……

中国代表团在苏联的活动热烈、丰富、欢愉。远离祖国的毛泽东似乎能在这种气氛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松弛，至少他暂时用不着每天去处理案头那堆积如山的公文了。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对中国建设问题的思考。

参加完莫斯科红场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第二天，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毛泽东会见了参加会议的法共党领导人。他特别谈到了中国的现状：

现在中国的情况有进展。总的情况是好的，也还有困难，主要是我们经济没有独立，人民生活水平低，吃穿是大问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正在发展，再有十年到十五年，这物质基础就强大了。

吃穿的问题都尚未解决，说明这困难绝不是一般的困难，说明这问题的确是大问题，它常常令毛泽东萦绕于怀。他当然知道，经济不独立对于新生的社会制度意味着什么。他特别强调说：

物质基础就是生产力，就是工业、农业。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巩固。

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得靠建设。但对于建设，中国共产党仍在探索之中。在另一次同参加会议的东欧工人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坦率他说：在革命上我们的路是走正确了，在建设上我们还没有证明自己是对的，还须看十年。毛泽东说这番话下完全是谦虚，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问题上尚处于起步状态的种承认。即使从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建立算起，中国共产党也只搞过 8 年建设，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远未根本改观。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应该把这顶帽子甩给资本主义，甩给那些同社会主义较量的人！

毛泽东由中国想到了世界。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

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宫宽敞的大厅内，毛泽东正在同两位来自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会谈。谈话的双方，一方来自亚洲，一方来自欧洲，话题正好是东西方谁占优势。这里说的东西方不完全是地理概念，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概念或意识形态概念，即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集团”。

毛泽东接着说：

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昨天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钢只占世界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从这一点看来，好像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经济力量对比中，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去年以来，曾经发动过两次反共高潮。这也给人印象，好像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美英资产阶级渲染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科学上、武装力量上高出于社会主义世界，如果不超出，至少也是平行的。

毛泽东所谈的问题，也是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各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所关注的问题。他说的优势，不只是指军事优势，而主要是说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优势。当毛泽东在后一种含义上使用优势的概念时，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他都揭示了战后东西方较量和斗争的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东西方大多数国家都遭受战争创伤，面临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作，因而双方的斗争主要在政治、经济和宣传方面进行，而很少借助于武器，所以 1947 年美国国务院顾问 B. 巴鲁克在一次国会辩论中，称这种东西方公开但有限的敌对状态为“冷战”。此后，“冷战”

一词被广泛使用。

10年过去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国都恢复了国民经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并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是，东西方毕竟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而在恢复经济时期各自采取的战略、政策又不相同，加上基础不一、外部条件各异，因此经济恢复的结果及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一般说来，西方国家的基础优于东方各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基础自然没有遭受什么破坏，而英、法等战胜国和德、意、日等战败国虽然物质基础受到严重破坏，但是技术基础、人才基础仍有相当优势。战后在恢复经济的初期阶段，西方国家对经济的主要方面实行直接统制，加强国家干预，但实行的主要还是通过市场调节经济的管理体制，而且随着经济的恢复，逐渐放弃直接统制的措施，把市场调节进一步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不同于战前的管理体制。

东方国家基础相当落后，由于战争（包括西方入侵的战争）使得国力更弱。战后东方各国大体上都是实行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向高度集中的方向发展，缺乏灵活性，显得呆板、僵硬，与市场脱节，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副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又往往忽视以至挤压农业、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生活。一些国家已经发现上述问题，试图对现行体制进行调整和某种程度的改革。

总之，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来年后都各自遇到了自己的问题，都在对既往的政策、战略和体制作调整。

与此同时，东西方之间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根本不同以及各国利益的不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矛盾、冲突不断，彼此展开较量。东西方的较量同过去的方式有了很大不同，即以经济、科技实力的竞争为主，而武力方式居于次要地位。

并不只是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

11月14日至16日，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召开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原则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今后共产党、工人党的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宣言里说道：“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16日至19日，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接着召集会议，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宣告：“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至少出席两个会议的共产党或工人党都有共识，即两大阵营的斗争胜负主要靠竞赛，而不是靠战争。

竞赛对于参与竞赛的双方，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毛泽东显然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动力兼压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不仅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晚出世一二百年，而且比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也要迟几十年或十几年。要想以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和平竞赛中取胜，无疑是件异常艰巨的事件。

竞赛还不只是存在于两大阵营之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酝酿和萌发着一股赶超浪潮。

克里姆林宫大厅里，赫鲁晓夫正在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声调高亢而激昂：

钢产量从 1913 年的四百二十万吨增加到 1957 年的五千一百万吨。……

同 1913 年相比，煤的开采量从两千九百一十万吨增加到 1957 年的四亿六千二百万吨，石油的开采量从九百二十万吨增加到九千八百万吨。……

电力生产从 1913 年的十九亿度增加到 1957 年的两千一百亿度。……

1957 年苏联整个工业的总产量增加为 1913 年的三十三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到七十四倍。……

制成并在 1957 年 10 月 4 日成功地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件事是科学技术成就的顶峰。……

谈到苏联的前景和任务时，赫鲁晓夫的声调更加高亢而激昂：

根据有待明确规定的初步草案，约在十五年内苏联的工业品年产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铁矿——二亿五千万到三亿吨，生铁——七千五百万到八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到一亿二千万吨，煤——六亿五千万到七亿五千万吨，石油——三亿五千万到四亿吨，煤气的开采和生产量——二千七百亿到三千二百亿立方公尺，电力——八千亿到九千亿度，水泥——九千万到一亿一千万吨，糖——九百万到一千万吨，毛织品——五亿五千万到六亿五千万公尺，皮鞋——六亿到七亿双。

苏维埃国家现在处在自己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里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现在，当苏联经过四十年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共产主义的光辉宏伟的大厦正日益清晰地各族人民的眼前显现出来……

全体代表起立，掌声雷动，人人脸上泛着激动不已的红光，大家似乎真的看到了那座被赫鲁晓夫描绘得灿烂无比的共产主义大厦。毛泽东也被这场面感动了。他从来不服输：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热浪中，中国能落后吗？！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计划的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是同样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力量吗？！

就在赫鲁晓夫讲话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同英共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第二次谈话。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未来目标：

苏联在十五年后，将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

毛泽东侧了侧埋在沙发里的身子问波立特和高兰：“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

高兰答道：“英国政府的计划是在五年内把钢产量增加到两千五百万吨。”

毛泽东说：“十五年后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

如果说同波立特、高兰等人的谈话，还只是毛泽东私下透露中国的打算的话；那么，毛泽东 11 月 18 日在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则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宣布了中国的目标。

毛泽东说：

我国今年有了 520 万吨钢，再过 5 年，可以有 1000 万到 1500 万吨钢；再过 5 年，可以有 2000 万到 2500 万吨钢；再过 5 年，可以有 3500 万到 4000 万吨钢。……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社会主义阵营涌动的这股“赶超”浪潮，并不只是激情和冲动，它有某种客观事实作基础。苏联的重工业的确在 40 年间发展很快，在不少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位居世界前列，科学技术尤其是空间技术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不相上下，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还领先于美国，因此同西方国家展开经济、科技的竞赛有一定基础。但是，由此认定苏联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并由此认定“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就不能不是冲动多于冷静，激情胜过理智了。

苏联固然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方面发展很快，但这是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结果，在偏重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农业、轻工业进展十分缓慢，以致于粮食产量始终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沙皇时代的最好年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物质财富的积累呈畸型状态。这同共产主义学说创始人所预言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相距甚远。况且，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全人类的理想境界。也不是苏联一国的情形所能决定实现与否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去谈“向共产主义过渡”，预言“共产主义已不遥远”，不过是离开人类发展现实实际的主观愿望罢了。

然而，没有谁在当时冷静地思索这一切，反而为这股热浪所裹挟，所痴迷。毛泽东尽管这时没有预言“共产主义已不遥远”，但也沉浸在一种热望之中。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但其经济、技术基础仍比中国占优势，何况中国经过了比英国更长更多的内战和中外战争，所受破坏程度远甚英国。如果说是一场经济竞赛的话，那么，两国并非处于同一起跑线。设想在 3 个五年计划之内超过英国，哪怕是在钢产量方面，也显得过于乐观了。（后来的事实显示，到 1978 年中国的钢产量也才 3178 万吨，仍未达到毛泽东预想的指标。）

11 月 21 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离开苏联回到北京。

过了 11 天，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宣布了中国赶超英国的打算：

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

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设想，已为中共中央肯定，成为中国今后 15 年的发展目标。这或许是毛泽东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收获。

如果说毛泽东去苏联获得了某种激励，那么回国之后的一件事则使他受到刺激。

毛泽东双眉紧皱，手有些颤抖地接过卫士马维回家探亲带回来的一个窝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窝头啊！又黑，又硬，掺杂着粗糙的糠壳。毛泽东费了好大劲才掰开窝头，把一块放人口里，慢慢阻嚼，不一会儿，眼圈红了，泪水“叭叭”掉下来。

听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都尝一尝，他声音哽咽：“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人吃的口粮……”

连续数天，毛泽东寝食不安，常常喃喃自语：“怎么是这样呢？翻身了，人民当家作主，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本来，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改善并不是同步的，前者可以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实现，而后者则必须花费较长的时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历经战乱的国家来说，需要更长一些时间，来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却不能容忍花较长的时间去改变中国的面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经过这件事以后，他多次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就是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办法。曾经导演过中国革命战争活剧的毛泽东从不信邪：搞经济就比打仗还难？！他要在中国的大舞台上导演出更加辉煌的建设剧目来。

二 热风吹雨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乘风破浪”四个特号大字赫然醒目，这篇元旦社论透出的信息也是灼热逼人。

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目标进了一步：“超英”尚未实现，“赶美”又已提出。不久，“超英赶美”成为大众口号。

实际上，1957年末已经兴起一股势头渐强的舆论热浪。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再提“大跃进”口号：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要不要跳，能不能跳，敢不敢跳》，言词咄咄逼人：

现在事情已经一清二楚地明摆着：我们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应该跳，也可能跳，问题是我们敢不敢跳。敢与不敢，在我们思想领域里，是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诚与否的对立。

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说：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整个舆论界都在为那场“大跃进”运动的兴起造声势。但是毛泽东认为，在党内，特别是在党内高层对于加快建设步伐、掀起“跃进”浪潮仍有思想阻力。

毛泽东的顾虑是有来由的。

1955年底，毛泽东欣喜地看到以农业合作化为先导的三大改造高潮即起，国民经济头几年一直健康发展，便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工农业发展速度，一股急躁冒进的情绪开始在党内蔓延，并直接影响到1956年上半年的经济工作。这年初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竟提出粮食、棉花每年分别以8.7%、10.4%的速度递增，到1967年分别达到1万亿斤、1亿担。如此高速的农业发展计划，很快波及工业、交通、文教各部门，促使各部门修订原已拟定的计划，追加指标。整个国民经济计划被打乱。

1956年春天，经济冒进导致的不良后果接踵而至：资金紧张，设备不足，

材料缺口，生产和建设秩序开始出现混乱。

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双眉紧锁的周恩来词诚意切他说：“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年初，他和陈云便察觉经济工作中的冒进情绪，告诫过各部门“提出的数字都很大”，要求订计划要实事求是，但作用不大。这时问题越来越多，他不得不以其总理的权力与责任，采取反冒进的措施。

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5月间召集中央会议，与会者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认为应该压缩、控制目前的经济膨胀势头，并提议写一篇反冒进的社论。当刘少奇将这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只批了“不看了”3个字。从字面看，未置可否，实际上毛泽东并不同意。在他看来，当前要反的是右倾保守，而不是什么急躁冒进。

反急躁冒进，还是反右倾保守，实质上是党内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两种意见，表明在中共中央高层存在分歧。反对急躁冒进者，主张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反对右倾保守者，则主张“打破平衡”，高速发展。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反冒进的多数人意见，毛泽东服从了前者，但对反冒进仍持保留态度。“不看了”三个字恰是毛泽东上述心态的反映。

冒进情绪受到抑制，经济建设趋于正常。1956年下半年、1957年全年经济稳步发展，其中195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然而，党内高层在建设速度上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对反冒进，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话里有话：

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好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再明白不过了：“去年的一股风”不就是指“反冒进”吗？！反冒进成了“松劲”，成了“右倾”，还扫掉了那么些个好东西，能不受到批判吗？！八届三中全会一开完，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评和指责便成了占压倒优势的舆论主流。事情的发展竟会如此大起大落：从反冒进变成了批“反冒进”。

不过，毛泽东心里有数：就像他当时对那篇反冒进社论有保留一样，中央这一层的一些同志对今天的批“反冒进”亦有二心。他要在党内，尤其在中央高层进一步发起对“反冒进”的批判攻势。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主），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南宁。毛泽东在他召集的部分中央和地方负责人的会议上严厉指责前年的“反冒进”。1958年新年钟声刚刚响过，毛泽东已经是第二次在中央的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了。1月3日至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小型会议上，已经批评过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当前要反右倾保守。从杭州到南宁，毛泽东意犹未尽，亲自起草开会通知，除留谭震林、陈毅在京分管党中央、国务院工作并由朱老总挂帅外，其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和部分省市委、中央部委负责人均赴南宁开会。

即使地处亚热带，1月的南宁也仍有几分寒气。邕江边的宾馆会议厅里却火力正旺。毛泽东词严色厉，愠怒不消。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毛泽东甚至点名批评了提出并组织实施反冒进主张的周恩来、陈云等人。他拿着柯庆施的报告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不写得出来？”柯庆施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1957年12月25日的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柯在报告中批评了“反冒进”，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反右倾保守、高速度发展经济的意图。毛泽东对柯的报告欣赏备至，《人民日报》便用这个报告题目的前半句作了元旦社论的题目。

毛泽东的讲话，使南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异常紧张。周恩来等曾经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不得不作检讨。整个会议对“反冒进”进行了一场讨伐。

毛泽东很注意批判的武器。当他把反冒进同“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联系起来时，问题的性质就变得严重了。这不啻于说“反冒进”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式来看待和处理经济建设上的认识分歧和不同意见，自中共八大以后还是第一次。事情就是这样蹊跷。1957年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反右派运动方面并萌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时，经济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还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毛泽东注意力转向经济建设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却开始波及经济建设。“阶级斗争”成为高悬于经济领域之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毛泽东要凭着“阶级斗争”这个手段，来推进他经济主张的实现。究其原因，一是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历史具有一种惯性，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经历，使毛泽东熟悉那一套规律，而疏于和平建设的特点。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事务，毛泽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二是在毛泽东看来，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具有阶级内容的问题，正是题中应有之义。1955年下半年，他用这种方式抑制住了党内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1957年，他又用这种方式解决了党外（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纷争。因此，似乎阶级斗争的方式具有其他方式不具备的“强力”。问题正是出在这里，阶级斗争方式具备的是一种被扭曲的力量，表面看来人们不能不被它压服，实际上各方面的问题依然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客观存在着，并不因为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就解决或消失了。

批判“反冒进”并不只是为算“旧帐”，更是为了廓清发动“大跃进”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常常说的“破”。毛泽东还要“立”，他要为“大跃进”立根据。

毛泽东说：

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平衡，没有一个暂时的平衡和统一也不行，但它是相对的，就是要不断地用先进的经验，在前进中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只有把平衡打破，事业才能前进。平衡打破了就前进了，前进又达到平衡，平衡又是暂时的，然后又有好多工作前进了，又把原来的平衡打破，又前进。

平衡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

像是谈哲学，但实际上谈的是经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了后来被概括为“积极平衡论”的思想。对“积极平衡论”，当时的舆论作了浅显的解释，即“时时刻刻向旧的事物冲击，向旧的定额、旧的指标、旧的规章制度挑战”。按照辩证法的解释，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两者相互排斥又相互转化，但是由平衡到不平衡、由不平衡到平衡的转化都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就人类社会而言，转化的条件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两个方面的条件皆不具备，或者只具备一个方面的条件，转化的前提都不成立。“积极平衡论”讲的是社会经济生活，但它只强调主观方面的因素，而忽略客观条件，一味要求不断打破原有定额、指标与计划、不顾一定时期内生产部门之间、物资和信贷及财政之间等各方面的综合平衡。它用经过高度抽象、舍去了大千世界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具体特征的哲学观点，简单地图解了具体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使真理在这里朝前又走了半步，为错误的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工农业生产中，“积极平衡论”就等于“大跃进”，“大跃进”就是不断修订计划、提高指标；否则，就是“消极平衡论”，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一边”。

—“破”—“立”，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最后打开了通道。

“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过这么一句话。在这位一生中有过22年战争生涯（从1927年领导秋收暴动算起）的军事家看来，天下最难的事就是打仗了。他的秘书胡乔木在南宁会议期间，私下里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他有一种类似抗战初期那样的兴奋。”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关系中华民族存亡。当时间过去30年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的是民族振兴的问题，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仍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如果搞不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30年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30年后中华民族又处在振兴的关键时机，毛泽东就像处于一种临战状态，那心情能不兴奋吗？！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慷慨陈词：“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十五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气可鼓而不可泄，鼓励士气，还是士气败坏？要不断革命……”

在高坎乡农业合作社的电井旁，毛泽东握着生产队长长满老茧的手说：“你们干吧，你们的水利化已经加上电气化！……”毛泽东走后，这位队长立即提出一个“大跃进”规划：苦战20天，完成水利化；大干4天，完成绿化；4个月电气化，8个月达到机械化。

在抚顺煤矿的矿井旁，毛泽东问矿长产量情况，听到回答说“去年出240万吨，今年要生产400多万吨”时，由衷地笑道：“这样是好的！”于是，煤矿的“跃进”计划一提再提：400万吨 1100万吨 1300万吨……

在成都量具刀具厂，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在郸县红光农业社……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视察各地。从东北到西南，从田头到车间，所到之处，群情振奋，“跃进”潮起。毛泽东既以他强劲的政治权力发动“大跃进”运动，比如召集中央会议、国务会议，更凭他非凡的个人魅力来为“大跃进”浪潮推波助澜。对于后一点，毛泽东甚至是自觉的，在1958年3月另一次发动“大

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个人崇拜是一种十分落后的社会现象，是人治政治形成的社会根源。斯大林就是在其生命最后 20 年里通过制造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滥用权力，犯了严重错误。个人崇拜同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个人作用无限制的夸大，后者则是对个人作用的客观反映。但是，毛泽东同时使用了这两个概念，把个人崇拜区别为正确与错误两种，把正确的个人崇拜同肯定个人作用等同起来，使得上述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之间变得界限模糊，语义不清了。问题不只是在语义，重要的是，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受到国际共运批判同时也为中共八大反对的个人崇拜，竟在毛泽东的这种看似辩证的分析下得到了肯定。

肯定个人崇拜，这的确是毛泽东的真正意思。当陈伯达在会上解释说：“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当即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在中国，在 20 世纪的 50 年代，承认个人崇拜，只能是承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自己也未必不清楚这一点。然而，对毛泽东说来，这是进行政治动员、调配资源所需要的。毛泽东要推动“大跃进”运动，要把一个东方大国 6 亿芸芸众生调动起来，进行一场改造河山的浩大工程，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会动用他的权力、威望直至人格力量。

在杰出的历史人物那里，思想的形成与受这思想支配的行为往往是同步的。事情不是等观念体系孕育成熟之后再发生，而常常是在观念体系尚处孕育的过程中便已发生。

毛泽东在发动规模宏大的“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在毛泽东的关于“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中，最核心的还是超高速发展经济。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速度的分歧，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一个是关于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他进一步引申，把上述所说的分歧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两条路线的高度。他说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前者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毛泽东首先提出 15 年赶超英国，以后不久又把这个目标的实现缩短到 7 年，并提出在 7 年之上再加 8 至 10 年赶上美国。《人民日报》曾在一篇社论里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这是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发展战略构想最贴切和准确的理解和说明。

向重工业（其中主要是钢铁工业）偏斜，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的第二个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本来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而对于钢铁工业毛泽东又更加关注。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他专门

讲了一段有关钢的话，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把钢产量由 400 多万吨提高到 2000 余万吨。1957 年去莫斯科，毛泽东多次提到钢产量问题，赶超英国也主要是确定在钢产量方面赶超。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他又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在他看来，粮食解决吃饭问题，钢铁解决生产资料问题。当相信了 1958 年夏季虚假的粮食高产丰收之后，他甚至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钢铁生产方面，以致出现了全国上下 9000 万人大炼钢铁的奇特景观。

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的第三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搞经济建设不能冷冷清清，而应该轰轰烈烈，轰轰烈烈就要搞群众路线。他戏谑地称，冷冷清清搞建设是以“寡妇心情”“来搞社会主义，因为宋朝女诗人李清照是个寡妇，她曾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词句。”他说，鼓足干劲，干劲就是六亿人民的干劲，六亿人民的绝大多数干劲很大。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是实现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最佳途径。所谓“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他以为战争年代“大兵团作战”的战术可以有效地运用于和平岁月的经济建设。问题在于，他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造成一种错觉，即不搞群众运动就是不走群众路线，将带根本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同具体的工作方法混同起来。其次，他误认为单纯的群众运动就能解决速度问题，看不到速度问题从根本上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不是靠简单的人力动员。

毛泽东关于“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实际上是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核心内容。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受命对这条总路线作了以下概括：“根据几年来人民斗争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发展，党中央的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总路线，可以具体化为下列公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和发展轻工业同时并举；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所有这些，目的都是在于力求促使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更通俗些，或许也是为了更突出速度的意思，毛泽东又把这条总路线简要地概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某些内容有中共八大前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果，但其核心即“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却是对八大前后探索的倒退。它大大发展了八大前后的探索中尚未认清的某些观念，比如速度问题。过去批“右倾保守”，以为各项事业都可以加速发展，但在八大前后的探索中尚未成为基调。而 1958 年超高速不仅成为主旋律，并且有了 7 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国的具体目标。它还产生了八大前后探索中所没有的观念失误，比如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实现“大跃进”。如果说 1957 年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在政治上步入了思想误区的话，那么 1958 年毛泽东形成“大跃进”发展战略思想，则是在经济上陷入了某种思想误区。从 1956 年初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曾经有过一个良好的起点，现在却向不健康的方向滑去。

然而，这一切失误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被由他自己发动起来的“大

跃进”运动陶醉了：“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位把主观主义当作共产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的人物，此时却忽视了主观主义的表现。抗日战争胜利前夜，他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但是现在，他却无所顾忌，竟然容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唯意志论的口号流行全国，因为他自己已经把精神对物质的作用、主观对客观的作用绝对化了。在他的潜意识中，意志超乎于物质世界成为第一位的要素，可以无条件地任意改变一切。他曾经这样欣赏和评价“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口号：“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与其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不如说是主观主义心态的一种流露。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

人山人海，安营扎寨，高炉林立，火光冲天，挑灯夜战，通宵不眠，“元帅升帐”，“卫星腾空”。1958年，从春到夏，经过发动，“大跃进”的狂飚很快席卷全国。人们似乎真的成了“舜尧”，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膛目的“神话”。钢铁“元帅”的指标一再突破：年初计划产量为624.8万吨，3月成都会议提到700万吨，6月中旬又提到820万吨，6月下旬再增至1100万吨。“高产卫星”更是接二连三“升空”：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36900余斤，花生亩产10000余斤，大麦亩产5702斤。

虚报，浮夸，高指标，瞎指挥……整个中国人们失去了理智，他们相信只要这样就会在弹指之间甩掉那顶“一穷二白”的帽子，尽快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夏夜，毛泽东透过专列的车窗观看野外大炼钢铁的热烈场景，脸上泛起兴奋的红光。对这种“大兵团作战”，他既熟悉，又极为欣赏。这位从湖南乡村走出来的农民之子，并不是不知道那腾空而起的“高产卫星”中所包含的虚假成份。有一次，毛泽东问他的机要秘书：“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10万斤稻谷？”机要秘书作答后，他说道：“你不要相信这些事情。”但是，毛泽东却异常偏爱这种“热情”、“干劲”和“积极性”，多次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保护它们，而不要伤害他们。虽然他也说过要有热有冷、有张有弛，但总是“鼓热气”多，“泼冷水”少。中国一穷二白，经济、文化、技术落后，人民有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问题是，在强烈的愿望和冲天的热情中，隐伏着冲动与冒进，这种冲动与冒进是导致事情走向极端的因素。毛泽东没有对此作充分注意，反倒以“矫在过正”的心理加以肯定和维护，使得冲动与冒进的情绪愈发膨胀起来。

冲动超过了冷静，盲目抑制了理性。“大跃进”运动不可遏止地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狂潮。

三 东方“太阳城”

1601年的一天，意大利斯吉罗城，在西班牙侵略者冰冷、阴暗的监狱里，一位33岁的意大利青年在经受近40个小时的酷刑之后，从漆黑的囚室门缝中看见了一线阳光，顿觉太阳的温暖与光辉。他在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以其惊人的毅力，握笔疾书，将其全部的社会与政治理想，通过文学游记的形式，写就成一部书，名为《太阳城》。这位意大利青年，叫托马斯·康帕内拉。

《太阳城》是通过一个航海家对一个招待所人员讲述他在航海中发现的一个仙岛的见闻。这个仙岛就是太阳城。

在太阳城里，土地、手工作坊、劳动工具、产品、房屋以及其他重要财产，都属于大家共同所有。这里的居民都是富人，也都是穷人。都是富人，是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都是穷人、是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私有财产。这里根绝了贫富对立，从而也根绝了阶级剥削和阶级本身。

在太阳城里，人们实行公社制度，按公社的形式组织起来，“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劳动和工作，都是分配给大家来承担的。”人人劳动，共同工作。男女分组劳动，服从自己的“王”，没有不满与私怨，只有快乐与欢愉，因为他们视自己的“王”如同父兄。

在太阳城里，产品非常丰富，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由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既不给任何人多于他应当获得的东西，也不会不分给他必需的东西。由于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商品和货币不复存在，金银财宝只用于对外贸易和装饰品。

在太阳城里，小孩出生后即由国家抚养，过集体生活，由有学问的人担任教师，习文绘画，参加体育锻炼。7岁起，光头赤脚，到工场学习各种工艺：制鞋、烤面包、打铁、绘画等。八岁起学数学、自然科学、医学、外国语。并组织少年到田间、畜牧场学习农牧业知识。所有的居民，从12岁起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和战场救护知识；妇女也同样要接受训练。这一项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

在太阳城里，人们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美德。他们热爱祖国，藐视私有财产；注重荣誉，而忽略衣食。人们相互之间，尊老爱幼，照顾病人、产妇。他们的精神生活高雅而丰富，从不赌博，也无人游手好闲。

总之，在这个仙岛上，太阳普照一切。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只有辉煌，没有阴影。

生活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交的康帕内拉，把对早期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结晶，凝聚成了这座“太阳城”，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社会。

遗憾的是，这位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尚未来得及在现实的土地上，构筑他那辉煌的“太阳城”，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太阳城毕竟是海市蜃楼，含有太多的虚幻之光。康帕内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莫尔、闵采尔一样，只是“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而这“新社会的轮廓”离现实是那样的遥远，显得那样的飘渺。

尽管如此，“太阳城”闪烁的理想光焰，并没有随康帕内拉一道消失，相反，却在人类跋涉的征程中继续燃烧着，不断激励人们消灭压迫、剥削、贪婪、等级等一切邪恶的东西，追求公正、合理、平等的美好世界。

1918年春夏，古老中国的内陆城市长沙，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约同学、好友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到城西湘江岸边的岳麓山，进

行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

春夏之交的岳麓山，鸟语花香，万木葱茏。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这里野餐露宿，登山游水，半耕半读，赤脚草鞋，云麓宫观晨曦，爱晚亭看晚霞。生活清苦淡泊，精神充实愉悦。在 20 世纪中国内忧外患、国破家败之时，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绝不是想逃避尘世，过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相反，他们是在计议建设“新村”。他们要把这个新村，变成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模式”。他们选择了岳麓山作为新村建设的试验地，而其半工半读生活正是“新村”设想的实践。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康帕内拉完成他的《太阳城》之作 318 年之后，毛泽东完成了他对“新村”的设计。

毛泽东认为，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能只讲革除旧生活，而且必须创造新生活。新生活须通过新学校对学生的培养而渐渐创立。这位从湘潭韶山冲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深感旧学校的学生“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不熟谙社会，因而必须从革除此弊入手，创办新学校。在新学校里，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毛泽东所说的工作，包括种园（花木、菜蔬）、种田（棉、稻及其他）、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各项，“全然是农村的”。他还为学校安排了每日的生活时间表：

睡眠八小时
游息四小时。
自习四小时。
教授四小时。
工作四小时。

创造新学校，培养具有新生活意识的学生，目的还在最终实现社会的改造。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这是东方的“太阳城”。毛泽东描绘的这个理想世界，与康帕内拉所展示给人们的竟是如此相似，尽管湘江之滨与亚平宁半岛天隔地远，毛泽东与康帕内拉相差几个世纪。长眠于亚德里亚海岸的康帕内拉如果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喜和慰藉，因为“太阳城”的理想光焰，跨过了空间和时间的鸿沟，传到了世界的东方，传到了 300 多年以后。

然而，东方“太阳城”同样构筑在幻想的基础之上，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没有比康帕内拉在思想上有所突破。“新村”的生命火花转瞬即逝。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没能维持多久这种“半耕半读”的生活，就分手下山，各奔前程了。留下的只有对往事的记忆：

……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新村”实践过去 40 年之后，1958 年，毛泽东在一次同刘少奇谈话时，设想了几十年后中国的情景：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此设想有些“新村”的味道，只是“新村”的概念变成了“公社”。在毛泽东看来，40 年前无法实现的理想，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现实，而且远远不会局限于湘江之滨、岳麓山下的那一块小小的地方，960 万平方公里的整个中国大陆都会成为共产主义的雏型！

把这理想世界重新烘托出来的，自然是那蒸腾的人的“大跃进”热浪。

1958 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同陈伯达的谈话中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型，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乡社合一，是陈伯达一年多前提出的一个意见，被党中央认为这个问题牵扯较大而搁置，“大跃进”运动初起，毛泽东不仅在探索中国式的超高速发展道路，而且在思考中国未来的社会模式。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乡社合一的建议竟在此时唤起了他对早年社会理想设计的某种思想回归。起初是朦胧不清的，而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以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模式的轮廓。毛泽东给这个模式选定了——一个名称，叫“人民公社”。

毕竟是在毛泽东身边十几年，善于揣摩加上秘书的便利条件，陈伯达已经了解了毛泽东正在描绘的这幅社会图画。这位写过《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风靡一时的小册子的“大手笔”，很快就向外界透露了毛泽东的设想。1958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它在实际上是指出了我国能够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区别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从而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出顺利条件的一种正确道路。”半个月后，《红旗》杂志第 4 期发表了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中共成立 37 周年大会上的讲演稿，说得更明确：“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

位。”陈伯达接着说：“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的前景。”

陈伯达的两篇文章，恰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37 周年时发表的。37 年前，在细雨濛濛的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宣告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游艇上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括毛泽东在内，绝不会想到仅过了 37 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宣布“共产主义为期不远”。

真的是“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躁动于母腹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092_1.bmp}

几乎没有人怀疑，几乎所有的人都膨胀起热躁的欲望和情感，用全部的身心去拥抱这个民族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梦想。

河南信阳嵒岬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

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成立；

河北徐水大寺各庄人民公社成立；

河北安国、定县，山东历城，河南襄城、长葛，商丘……就像工农业生产一个个腾空而起的“卫星”一般，这年夏天，当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思想传出以后，首先队中原大地开始建立起最早的一批人民公社，用当时报纸上的话说，叫“东方地平线上初升的太阳”。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这时又最早实践了毛泽东的社会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人民公社的确是东方“太阳城”的第一抹“阳光”。

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

铺盖着墨绿色平绒布的宽大办公桌上，摊开着几张大报纸和几份地方送上的材料，都是有关人民公社的。毛泽东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提出了“人民公社”的设想，但毕竟没有看过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吩咐秘书和工作人员，要下去看看。他特意嘱咐要随身带上那本他正在阅读的《张鲁传》。汉朝末年的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即在大路上设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即吃饭不要钱。这些与他心目中的“公社”组织，似乎有某种相通之处，颇受他欣赏。一边读《张鲁传》，一边看人民公社……

第一站到了河北。在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毛泽东问：“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农业社主任答道。

“噢，那每亩多少斤？”毛泽东又问。

“754 斤！”

“啊”，毛泽东笑着赞叹：“不少啊！”

县委书记告诉毛泽东，当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要拿到 12 亿斤粮食，平均亩产 2000 斤。毛泽东听了睁大眼睛，笑着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伸出手指算了算说：“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县委书记一下被问住了，有些尴尬。毛泽东左右环顾看看周围的人，笑着说：“粮食多了，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接着，毛泽东去看了社里的粮食加工厂、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幼儿园、“幸福院”和食堂。当地委书记告诉毛泽东，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时，毛泽东欣慰他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转过身来看了看徐水县委书记，对省委、省人委的负责人说：“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了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他们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徐水县早在这年春天就打破地界，实行全社统一调配的劳力大协作，组成像军队那样的连。营等劳动组织，社社建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4月份的《人民日报》就对此大加赞扬，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毛泽东问地委书记“徐水的军事化，你们推广了吗？”他多么希望“徐水共产主义”能够在广袤的大地上处处开花结果啊！

第二站是河南。在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这个公社的情况，参观了托儿所、“幸福院”、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毛泽东对这个最早建立的人民公社大加赞扬。在公社的棉田里，毛泽东一边看女社员喷杀虫剂的操作，一边高兴地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点点头道：“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正是在七里营人民公社，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有许多好处时，毛泽东欣喜地随口说道：“好么，好么，人民公社好。”第二天，被跟随采访的记者登报发表了出去。毛泽东看了报纸，连说“糟糕”，因为毕竟此事还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不过，事已如此，毛泽东也只好听其自然，何况从内心深处讲，他对人民公社确实有种由衷的喜爱呢！

说不清是农村基层的人民公社实践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模式的设想，还是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指导了农村最早建立人民公社的实践，反正，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农村所看到的同他所想象的竟是那样的一致。他心中有了底，第三站到山东，当省委负责人汇报说该省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肯定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第四站是天津……

当毛泽东结束这次视察回京时，心中已经鼓荡起“人民公社”理想的风帆。大概是想再一次在充满泥土芳香的田野里品味实践“公社”理想的喜悦，就在回北京的前一刻，毛泽东让专列临时停在了北京城郊的丰台火车站，他又视察了北京丰台区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一块大白菜地旁，毛泽东听生产队长一边比划一边汇报。“我们这一亩四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二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1700斤‘杂货’（一种牛蹄羊角毛皮等混合而成的肥料），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一亩从过去的2000来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生产队长从措施到结果汇报得很具体。

“能产120万斤？这是计划啰！”毛泽东问道。

“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之后又去看玉米试验田。在玉米试验田，他问社里的干部今年小麦能打多少斤，听到说：“今年打398斤，明年计划每亩产

2000斤”时，问道：“2000斤，有把握吗？”得到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回到中南海时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风尘一路的毛泽东竟然不知疲惫，反倒显得精神矍铄，两眼目光闪闪。他对身边的卫士长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

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日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15000到25000个社，每个社5000到6000户。两三万人一个社，相当大了。这样，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养猪都归公，自留地暂时还留一点），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

毛泽东向政治局委员们，向列席会议的部长、省委第一书记们，滔滔不绝地讲起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来。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破坏。

4年前的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写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诗篇，慨叹人世沧桑：帝工统治数千年的华夏大地，而今已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此刻，又是在夏天，又是在北戴河，毛泽东要让中国再换人间，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10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五九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穿衣是否也可以不要钱。

仿佛这酷暑一般，北戴河会议也弥漫着一股热躁不宁的情绪。通过了“钢铁翻一番”的计划之后，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它向全体中国人宣布：“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就其应该包含的内容而言，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确立科学的社会目标模式和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建设道路，换句话说，就是解决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大问题。从已知的历史过程看，不管是不是一种自觉意识，中国共产党人起初的探索重心在后者，《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着重寻求中国建设道路的方案，并且取得了初步但可贵的实践成果和思想成果。

“大跃进”浪潮兴起之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仍然进行建设道路的探索，并把超高速发展、向重工业偏斜和发动群众运动作为有效的建设途径。探索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另一方面在“跃进”浪潮的推动之下，开始设计中国社会的目标模式。伴随着“大跃进”运动高潮迭起，目标模式的设计也从朦胧、粗糙变得清晰、细致。到1958年夏，可以说，毛泽东已经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中国未来社会的图景。

毛泽东所设想的中国未来社会，有如下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实行高度公有化的单一的所有制。在未来社会里，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都属于公有。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自留地以及社员家庭的家禽、牲畜一律归公，逐步实行全民所有制。在城市也要逐步建立人民公社，毛泽东曾赞扬搞人民公社“农村走在了前头”，同时提出：“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同样，城市要继续巩固全民所有制，也要将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并消灭任何私人和个体经济成分。{ewc MVIMAGE,MVIMAGE,!09100690_0099_1.bmp}

第二，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产品实行平均分配。毛泽东认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等等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表现。他指出，供给制与薪水制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恢复供给制不是倒退而是进步。在这个社会里，要取消工资制度以及一切等级和差别，吃饭不要钱，搞公共食堂。其消费水平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因此，没有交换，没有商品，以致没有货币，社会产品完全平均分配。

第三，逐步取消社会分工，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社会。所有的人民公社都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农、林、牧、副、渔”兼备。每一个人民公社都是一个狭小、隔绝的小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多面手。整个社会，没有交流，没有分工，没有专门人才。

第四，按照军队组织建立人民公社的内部结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内部设团、营、连、排、班，像军队那样，搞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毛泽东称之为“生产大军”，这支“生产大军”可以生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

第五，实行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在未来社会里，人人都具有共产主义精神，道德高尚，思想纯洁；自觉劳动，不计报酬；互相协作，不讲条件。

毛泽东所设想的这个社会，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但他把这个社会作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一个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毛泽东自己也说过，经过四、五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然而，毛泽东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的设想，带有某一种空想色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16、17世纪以来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蓝图以及中国历史上大同理想的再现。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不仅意识到了，而且有某种自觉。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他还雄心勃勃地说过：前人的乌托邦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所谓“超过”，并不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与扬弃，而是沿着这条空想的轨迹再往前迈一步。

毛泽东早年受到过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青年时选定思想方

向的时朗，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精神激烈冲突与彼此渗透的时代，西学涌入，异说杂陈。其中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也大量传入中国，《新青年》杂志就曾介绍和鼓吹过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此外，法国的“鹰山共产村”和美国的“蓝路共产村”等“新村”也被一些知识分子介绍给国内民众。毛泽东正是受上述“新村”思想及模式的影响，在长沙岳麓山下进行“新村”试验的，在黑暗世界里跋涉的毛泽东，一旦看到空想社会主义所闪烁的公正、平等、自由的思想火花，就立即被它吸引住了。十几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回忆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

后来的毛泽东没有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向了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某些思想成分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摈弃了前者所崇奉的改良手段而相信后者倡言的革命方法，但是空想的光环至多只是在他的意识中暗淡了，而没有彻底消失，以至于几十年之后暗淡的光环在他意识中重新闪现。

不过，20世纪的空想论同20世纪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比较一下，其空想的含义有所不同，尽管二者的理想社会图画十分近似。从莫尔的“乌托邦”到闵采尔的“千年太平天国”，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温斯坦莱的“自由共和国”，从巴贝夫的“平等共和国”到欧文的“公社”，20世纪以前空想社会主义蓝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初生、形成和远未发达的时期。那时的人们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在其初期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却又缺乏对它的成熟的理性认识与思考，希冀通过“道德感化”、“人性复归”等等一套精神、观念的手段，来消除一切社会不公的现象，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显然，20世纪以前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在于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是空想的。

20世纪中国的空想论则有不同。它出现在一个经济文化基础十分落后、但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农业国家，要求在生产水平相当低下的条件下实行单一公有制经济，在产品远不丰富的情况下实行平均分配，在商品经济很不发展的前提下取消商品，在物质生活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普及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测过共产主义远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公民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知识技能等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但是，这需要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经过一系列阶段包括商品经济阶段，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毛泽东的中国未来社会目标模式，恰恰是忽略了上述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逾越了实现共产主义必经的阶段，特别是逾越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阶段，因而是空想的。

如果说西方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毛泽东描绘的未来社会图景染上的某些色彩，那么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与传统则是这幅图景构成的重要线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大小几千次的农

民起义尽管旗帜不一，口号各异，但都贯穿着绝对平均主义的精神幽灵。进入近代以后，这种平均主义曾形成数次思想高潮，以康有力的《大同书》为顶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反对封建剥削和封建专制方面而言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有落后的一面，即企图越过反对封建主义的界限，从根本上也就是越过商品经济的阶段，对社会财富进行绝对平均的分配。这无疑不是推动而是阻碍社会向前进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就更具落后性以至反动性。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受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少年时期他喜爱那些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领袖，青年时期他最早崇奉康梁，受康有力思想影响较大。这种思想的积淀，在大跃进中又活跃起来。读《张鲁传》，送《大同书》，毛泽东这时已忘记了1948年他曾批判这种平均主义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相反，把它融进了关于中国未来社会的理想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1958年6月，毛泽东曾在一份搜集的1920年《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资料上，批评这篇宣言“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此时批评20年代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空想错误的毛泽东，却正在引导一场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论实践运动。如果说难以意识到眼前的错误，可怎么又看到了当年的幼稚？既然已经察觉了当年的失误，却如何偏偏忽略了眼前的错误？

不管怎样，想象中的东方“太阳城”已经矗立起来。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再次到各地视察。他会看到现实里的“太阳城”吗？他将看到什么呢？

四 庐山风云

又到了河南。这地方大概颇具典型性，第一颗小麦亩产的“卫星”是从这里“升空”的，第一面人民公社的旗帜也是在这里扬起的。专列停在郑州车站后，毛泽东即吩咐秘书叶子龙找在河南参加上炉炼钢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来汇报，他相信他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会向他讲实情。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毛泽东对工作人员的一片赞扬“大跃进”之声仍不放心，他盯住中南海摄影组的胡秀云问。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什么？“吹牛”？胡秀云愣住了，她没料到毛泽东会说这种在当时被视为“右倾”、“保守”的话。

或许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句话，胡秀云打破了顾虑：“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到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既是疑惑，也是答案。

毛泽东望了望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还是在放大炮？”

继续南行。武汉、大冶、黄石、安庆、桐城、舒城、肥西、合肥、芜湖、南京、上海……看公社、工厂、矿山、港口，看农田、高炉……20天的走马观花，毛泽东始终保持了一种兴奋的情绪。在合肥，他感慨道：“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果真无忧无虑了吗？不，毛泽东心里也有某种不安与隐忧。在河南，他听到了工作人员关于“高产”的真话。在武汉，他的老朋友、老同乡李达甚至同他发生了争论。李达说，“大跃进”有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毛泽东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讲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如果现在谈。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泽东也不相让，他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争论越来越激烈，两人都沉不住气。李达最后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话有些刺耳，但李达所说的确是事实。

“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将整个中国的经济秩序打乱了，工业与农业之间、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重工业内部之间、财政和信贷及物资之间等等的比例全部失去了平衡，“以钢为纲”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生态。资源被破坏；农村生产关系的改变急促而粗糙，一个多月内全国各地一哄而起，建立了23397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劳动军事化等做法，违背中国农村的实际，造成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极度混乱；挑灯夜战、连日突击的超强度劳动，致使人们健康水平骤降，许多人患疾病，甚至出现了死人的现象。总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

对于浮夸风、放“卫星”，毛泽东有所察觉。但是他的态度却是自相矛盾的：他不相信粮食亩产真的达万斤、几万斤乃至十几万斤，还说过让孩子

站在水稻上是“吹牛！站得越高跌得越重”；然而他却把浮夸风作为“群众热情”加以保护，要求领导干部“要热又要冷”，而对群众的革命热情则要爱护、要保护。当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时，毛泽东也不能不开始考虑纠正一些过头的主张和做法。

1958年11月。还是在郑州。毛泽东在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批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和废除商品、货币的主张和做法。

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10年就过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二字，机动一点。

要有一个奋斗过程，混淆这个东西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就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大容易了。……它是个客观规律，是个客观的东西，我们主观上把这两个东西混同起来，那就没有奋斗任务了。

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可能富裕。要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个词，忌讳它于什么呢？它现在有作用嘛。

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提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后来，他索性在会议期间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

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

读书也是为了纠“左”。显然，同北戴河会议比较起来，毛泽东在思想上有所退却和降温。他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商品交换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目的在于阻止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现象，申明保存商品生产的合法性，刹住否认交换、取消商品的舆论之风。

11月下旬，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月上旬，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9年2月，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3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冬去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伴随气候的转暖而升温，反而有些减热。在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都“唱的是低调”。经济计划指标有所下降，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趋势有所减弱。

然而，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去触及引发“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狂潮的动因。在他那里，“人民公社”依然是辉煌的目标，“大跃进”依然是通向理想境界的坦途，因此，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的纠“左”过程，呈现出似乎不可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他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另一方面，他也指责“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并说“气可鼓而不可泄”。一方面，他说要划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要马上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要在农村人民公社急于建立全民所有制；另一方面，他还是认为人民公社是完成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最好的形式。他认为前一段的问题在于走得太

快了些，只要把步子稍微放慢一点就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至于寻致这场狂潮的超高速发展战略和未来社会目标模式两个根本性问题，毛泽东是没有也根本不会意识到的。

正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批发了《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这个县设计了一个三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要把全县 993 个自然村合并为 25 个“共产主义新乐园”，每个“新乐园”都有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浴池、养鱼池、供应站、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厂、畜牧场等；到 1960 年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新乐园”不就是“新村”的翻版吗？毛泽东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毛泽东是诗人，他喜欢诗，也喜欢诗化的理想。对于他选定的目标与道路，他有种诗人般的浪漫与执著。

但是，经济生活并不是一首浪漫诗，它要求人们以最现实的态度来对待它，并尊重它自身的规律，在规范、协调、平稳的轨道上办事。一旦失去这个前提，经济生活就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不是浪漫。“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已经导致了经济生活对人们的报复，毛泽东却还是把它们当作“一首诗”。因此，1958 年秋至 1959 年夏的纠“左”并没有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困难依旧存在，问题层出不穷。

毛泽东对危机的根源已有所认识，但他并不愿意看到眼前的混乱。他要使通向理想境界的进程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失衡转为平衡。再开会，到庐山去开，那里远离尘嚣，或许可以好好讨论一些问题。

1959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谓“扩大”，指除了政治局的委员、候补委员外，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候补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主要负责人亦到会。

鉴于许多领导同志不懂得社会主人经济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在常委会上，从读书、形势到任务、体制，毛泽东一口气列了 18 个要讨论的问题。中心在强调“冷”。他承认去年“两小无猜”，把精力放在搞小高炉、小转炉，其他都丢了，去年大丰收，今年又大春荒；说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指标，恐怕要 4 年才能达到。毛泽东还说，积极性有两种，盲目性和实事求是；说去年大跃进包含某些错误与消极因素。{ewc MVIMAGE,MVIMAGE,!09100690_0110_1.bmp}

毛泽东的确想让狂热的形势冷却下来。会议期间，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二周是湖南省委负责人，李锐是他的兼职秘书，恰好也是湖南人，毛泽东戏称开“同乡会”。周小舟说粮食“高产”引起了钢铁高潮，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主要怪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话说得重，有些还是直接批评毛泽东本人的，毛泽东竟也承认了，没有发生像他同老同乡李达之间那样的争论。

“提倡敢想敢干，确实引起了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

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三个听者也哈哈大笑，久久不息。王鹤寿是冶金部长，钢铁翻番是毛泽东的提议，他能说不行吗？

“我这人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毛泽东对自己的同乡还是推心置腹的。

“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准知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把抓经济比喻成打麻将，毛泽东多少是对自己不懂经济的承认。

“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毛泽东还但露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状态。

李锐后来忆及这次谈话时这样说：

我们三人从主席处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尤其小舟大胆讲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直接批评了主席，不仅丝毫没有引起反感，反而更加谈笑风生

这种轻松的场景是前期的庐山会议的一个缩影。7月的庐山，绿树浓荫，空气清新，既可消夏避暑，又能放松精神。遍布山中的古迹胜景，流传久远的神话传说，更给人平添许多雅兴，与会者在这里可以暂时避开第一线繁纷芜杂的事务的搅扰，过一段较闲适的生活，开怀畅谈，总结经验与教训。人们多有超凡脱俗之感，犹如神仙。一时间，庐山会议竟有“神仙会”之说。

如果以为庐山会议的与会者真的“超脱”了，那就错了。实际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有认识的分歧。关于1958年以来的形势，毛泽东在常委会的讲话采纳了周小舟的说法，叫“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表面上看，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总的估计；实际上各人的理解和强调的侧重点大相径庭。一种意见认为对形势不能估计太乐观，最重要的是第二句话“问题不少”，去年一年教训很多，值得认真总结。另一种意见认为去年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今年仍然是大跃进，证明党的路线完全正确，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两种意见互相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遭到指责，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对会议更深入一步地讨论问题产生了消极影响。

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是持前一种意见的。“大跃进”初起，他曾欣喜地拥护这个建设运动。当耳闻目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真情实景时，他由疑虑到痛心。在参加庐山会议的车上，他眼望沿途的饥民，满腹心事，终日不食。在会议的小组会上，彭德怀直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分析失误的原因，同样被人批评为“看问题多”。其实，在小组会上他还有“不便讲的一些问题”没有说，骨鯉在喉，不吐不快。7月14日，彭德怀终于将表达自己看法的一封信送呈了毛泽东。

彭德怀的信并非人们流传的“万言书”，全文不到4000字。他讲了两个问题，头一个是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认为生产产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还说“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他在信中也指出，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基建项目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后一个是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信的重点部分，彭德怀

分析说，1958年的缺点错误有些是因为对建设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而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把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国”都属战略性、长远性方针，我们缺乏研究；又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饭。

信里还有这样一些话：

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文如其人，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历来坦率、耿直，信也不含糊其辞。

彭德怀了解毛泽东。大概觉得信里有些话还是蛮刺激的，他特别在开头说自己“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还说这封信是“特写给你作参考”的。细细体会一下，不难懂得其中的“潜台词”：如果话说得难听、不对，敬请谅解。

毛泽东怎么看呢？

一天、两天……四天、五天……七天、八天，一连八天，毛泽东除了把彭德怀的信批发给与会者讨论外，没有更多的表示，只是在政治局常委内部说过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实际上，这点点滴滴的反映，已经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不满。在毛泽东那里，解决1958年以来的问题，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一条原则，即必须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下进行适当调整，谁都不能逾越这条界线。而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信之后，认为彭德怀正是冲着“三面红旗”来的。

其实，对于形势的估计，俩人的估计相差不远，彭德怀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还说“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而毛泽东自己留的余地比彭德怀还大，说“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十年。”不过，俩人的心态的确不一样。当彭德怀看到的是“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时，毛泽东眼里却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即使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已经闯下大祸的时候，作为诗人政治家的毛泽东依然在迷恋他设定的那个理想社会：“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东晋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良田肥沃，池塘清清，桑树环绕，男女青年往来耕作，老人孩子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早已作古，但他描绘的那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式封闭社会的图画，却依然为后来人所追求和向往，初上庐山，毛泽东不就在诗词中同历史作这种对话吗？

朴实、厚道的彭德怀此刻的心情异常沉痛，他当然不同于毛泽东的心态。他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找出导致困难的深刻原因，以彻底地摆脱困境，而下是

简单地以“缺乏经验”来敷衍塞责。而毛泽东却不能容忍彭德怀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批评，更不能容忍他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缺点错误所作的分析。彭德怀的那些分析，在他看来不是只讲两个运动的缺点错误，而是攻击整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115_1.bmp}

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讲“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

接到彭德怀的信之后第九天，毛泽东终于发话了。他在全体与会者大会上作讲话，整个讲话没有一字提到彭德怀的那封信，但锋芒却直指彭德怀。

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毛泽东借彭德怀的话，把“小资产阶级泄气性”这顶帽子戴到了彭德怀头上。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

联系到了彭德怀的历史，追根溯源。意思很明白：错误路线站错队，正确路线站不稳，彭德怀这次“动摇”并不偶然。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会上的）一部分同志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

联系到了社会上。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批发了几个文件，其中有党外人士和党内干部（如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批评意见。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党外”与“会外”的“风”。

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比会议初期轻描淡写多了，目的在证明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

同轻描淡写讲困难比起来，“两条罪状”的说法又是退一步了，这使许多与会者替毛泽东感到冤枉。而“我无后乎”一番话，更使一些人为之动容。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根，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白。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毛泽东的讲话，使庐山会议纠“左”的主题急转直下变成反右。一场批

判的暴风骤雨突然降临了。

劝说、责难、批判；

挖根子、追历史、查关系……

按照该会议“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会议的批判已下限于彭德怀的信，他的发言以及他过去有关“大跃进”的言论统统被兜出来予以批判。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赞成或与彭德怀持相同看法的与会者也遭到同样严厉的批判。

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进一步批判彭德怀等人。8月16日，当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时，彭德怀等人已不是什么“中间派”、“动摇分子”了，而成了“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党进攻的“反党集团”。会议同时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纠“左”的进程终于中断了，尽管它是极受局限的纠“左”。原本打算有所退却的毛泽东，此时却丝毫不再退却，反倒重新超前了。历史仿佛跟人们开了个玩笑。“大跃进”运动就像一把上弦的弓箭，在稍稍向回反拉之后，却以更快的速度朝前射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指出：“调整后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

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写下了上面这样一些文字。它可以被看成是对庐山会议这场党内批判的一个思想总结，其实质是从理论上肯定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可能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或者说从理论上肯定把那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这里只说“从理论上”，是因为实践上早已把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前面所说的1955年批“小脚女人”、1958年批“反冒进”都能证明这一点，只是以前斗争的规模和程度不及这次罢了。

党内斗争并不都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即使革命年代也是如此，而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条件下，党内斗争不仅不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甚至主要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毛泽东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党内分歧作为阶级斗争来处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生活中的表现，他把这种人为制造的党内阶级斗争作为一种规律，并武断地认定“要斗半个世纪”、“斗到阶级完全消灭”，这是他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新发展。

后来的历史表明，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新发展，在实践上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注意力放在了党内。在

在他看来，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已不再构成直接威胁，而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党内的“阶级斗争”，从此直至生命终结，毛泽东都在为纯洁党的队伍、消灭“党内资产阶级”而斗争，以捍护并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目标。

1958年至195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大规模付诸实践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也异常活跃，他把“大跃进”作为中国建设的发展道路，把人民公社作为未来中国社会的目标模式，从而在全国上下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果说“大跃进”更多地来自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赶超战略，那么，人民公社则多少源于他早年追求过的“新村”理想。毛泽东毕生致力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繁荣。早年他曾把这信念寄托在“新村”理想上，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他就搁置了“新村”理想（这里不说“放弃”而说“搁置”，是因为当年他放弃的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改良手段，至于这个理想本身他并未曾真正放弃，只是在他的思想中呈隐伏状态）。1958年，当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时，早年的“新村”理想以另外一种形式浮现了，而这个理想的核心没有改变。

1918年毛泽东在长沙一隅的试验都难以维持，而1958年他却可以把他的理想推及全国。这是因为他掌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使他可以把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他关于“人民公社”理想的试验场。“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几乎都是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发动和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愈是有阻力的时候，行政力量也就显示得愈充分。这既说明“大跃进”的道路和公社化的理想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也表明这些脱离实际的空想一旦与行政权力结合所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将如何面对这接踵而至、越来越重的灾难呢？

第三章 大梦初醒

一 苦果与读书

1959年10月。

国庆节刚刚一过，毛泽东即乘车南下视察。与天安门广场万民欢腾的景象截然相反，毛泽东沿途所见，一片萧条。专列开到曾经宣布三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范县所处的山东省时，映入毛泽东眼帘的不是“新乐园”，而是龟裂的土地和地上泛起的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接着到安徽，田野里除了飘散着青烟的小土炉和在轻风中无力摇曳着的红旗之外，根本不见丰收的庄稼。随同毛泽东南下的卫士长曾这样回忆：

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靠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

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

一年前，也是在合肥，毛泽东说过“沿途一望，生气蓬勃，大有希望”。而今，他曾经目睹的“生气蓬勃”的场面消逝了他期冀看见的“大有希望”的景象更没有出现。其实，当时的那种“生气蓬勃”的场面又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呢？

山东、安徽不过是全国形势的一个缩影罢了。尽管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试图再次掀起新的“跃进”高潮，严峻的现实还是把一个“左”倾错误酿成的苦果抛给了人们。195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呈畸形状态，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48%以上，在工农业中的比重占到43.8%；而农业则由上年的34.3%下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1959年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又增加81亿元，增长了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基建战线太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率的膨胀，导致消费额比上年减少22亿元；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但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平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下降了22%。到1959年底，现实向人们亮起了“黄牌”：国民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

这一切，毛泽东似乎看到了，又似乎没看到。说看到了，是因为回到北京后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宣布：他本人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定量”。这当然是对严重困难的承认。说没看到，是因为此后他仍在动员“新的跃进”，对“大跃进”的主要政策没有做大的调整，以致于估计1960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

这年底至1960年2月毛泽东的一段读书生活，颇能反映出毛泽东在认识上的这种矛盾状况。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本人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秘书陈伯达，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的秘书田家英。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1958年出了经过修订的第三版。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读书的建议。除号召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外，他还说过：“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把纠“左”变成反右，读书之事被冲得烟消云散。南下视察所见引起毛泽东震惊，他身边的一件事也使他颇受触动。

1959年底，几名休假探亲的中南海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的情况。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所见所闻，还有农民吃的糠菜窝头。窝头交到了毛泽东手中。又是窝头！两年前，毛泽东吃着卫士从农村带回来的窝头时，曾含泪说要“想个办法”改变穷困的现状。两年后，当全国上下都实行了毛泽东所想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办法后，卫士给他带回来的，仍旧是捂馊了的糠菜窝头。毛泽东又一次泪水沾襟。这时他是什么心情呢？同情？愧疚？苦涩？我们无法真实地描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终于想集中一段时间来读一读由他本人倡导却被屡屡搁置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了。

读书活动从杭州开始，经过上海，到广州结束。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读书小组的成员将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记录整理成《读（政治经济学）下册的笔记》。

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有些问题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根据读书小组的归纳，有13个方面：

1.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
2.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3. 民主革命；
4.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5.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6.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7. 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8. 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9. 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10. 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11.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12. 国际问题；
13. 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

读书，联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问题，有所反思。他谈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他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毛泽东还特别说到；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大跃进”运动的基本问题之一，便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中又

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其结果导致了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呈畸型状态，工业高速增长，农业急剧萎缩，引起人民生活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全面紧张。毛泽东讲到了中国自身的教训：说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问题是什么叫大量。我们过去也是讲对农业大量投资，但是实在说不像样子，拿 1959 年来说，给农业的钢材也只有 50 多万吨。毛泽东这时的认识大体回到了《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水平上。经过两年“大跃进”之后，对农业与工业、农轻重之间关系比例问题有切身感受，再次强调和重申“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观点。然而，正是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在认识上又表现出同上述反恩相背的一面。他谈到要“争取把大跃进继续下去”：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大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他谈到要“大搞群众运动”：

教科书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

他谈到“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

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

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

他谈到“积累、扩大再生产”：

有一种说法：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他还批判了“物质刺激”，赞扬供给制。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些带指导性的思想观念和主张，诸如超高速增长战略、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平衡论”、轻视或否定物质鼓励等等，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几乎都被肯定下来。这同前面所述的对问题的反思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反差。其实，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是表象的。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确出现了某些缺点，但是从根本上讲并没有错，因此，“三面红旗”不能放弃，不能否定，如果说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上述认识还只是一种潜台词的话，那么，3 个月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则道出了他的心声：“我们工作有缺点，总的是好的。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动摇。”话说得斩钉截铁，仿佛还带着一丝温怒。

的确，毛泽东感到了某种“挑战”。

在毛泽东看来，“挑战”是冲着他来的，更是冲着他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来的，“挑战”来自国内和国外。国内是“右倾机会主义

者”的“进攻”，他的同征共战30年的老战友彭德怀是“代表”。国外是西方和东欧一些国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批评和非难，尤其是那个“老大哥”国家的指责。

想到苏联，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党首先是在评价斯大林和国际共运等问题上发生思想分歧；继而对1958年中国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苏联领导人又颇有微词。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第七天，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的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的讲演：

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是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

敏感的西方记者立刻从赫鲁晓夫的讲演中，察觉了他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之意。《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发回的报道称：赫鲁晓夫对波兰农民说：“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办法是错误的。”报道猜测说，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西方记者的猜测没有错。赫鲁晓夫后在回忆他50年代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时说，“虽然我当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问题还不止是意识形态和中国道路方面的分歧，自1958年以后两国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1958年4月，苏方提出在中国共建共管特种收发报无线电台的要求。7月，苏方又提出建立一支共同原子潜艇舰队的要求。这两项要求都涉及中国的主权，苏联意在对中国实施控制，因而均被中国拒绝。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中苏两国于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核工业的技术援助。9月，苏联不顾中国政府三番五次的解释和劝说，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在声明中有意偏袒印度方面。9月底，结束访美之行的赫鲁晓夫匆匆赶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纪念活动，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仅强词夺理地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还埋怨中国炮击金门、马祖二岛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岛使用武力，毛泽东断然驳回了赫鲁晓夫的无理指责和要求。会谈不欢而散。报复接踵而至：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个，导致中国建设事业的极大困难和损失。

毛泽东面临巨大的压力。但他是一个历来不畏惧压力的人，当年王明压过他，共产国际压过他，斯大林压过他，他都以其特有的倔强与韧劲顶过来了，并且最终冲破了压力，成为举世瞩目的成功者。在毛泽东的性格中，仿

佛有一种物理学上所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的现象：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他毫无惧色地迎接这场他自己感到的“挑战”，甚至宣布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要向全世界作战”。

1960年夏天，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表明了他对来自外界压力的抗拒：

人民公社全世界很多人反对，说是不行，说是强迫劳动，说是拆散家庭。首先反对的是美国的杜勒斯，然后有铁托，然后还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明友，他们说人民公社不行，世界上无此前例。无前例的事多得很，巴黎公社就无前例，成功的十月革命也无前例，为什么人民公社就不好？

接着，他谈起了赶超英国，谈起了破除迷信，那气势同发动“大跃进”时相比毫不逊色。

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我们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各种迷信一样，敢说敢想……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么复杂。说起来，赫鲁晓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最早掀起“赶超浪潮”的领导人，而且最早宣布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时却转而批评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如此，作为旁观者，他的批评却不能不说有几分道理，至少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提醒人们注意改造生产关系、发展经济建设的复杂与困难。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来自苏联的批评同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理论上的认识分歧和中苏两国关系上一连串令人不快的事情交织在一起，缠绕不清。而且，这些批评又偏偏同来自西方世界的非难，有某种表面上的相同之处，让人觉得两者有一呼一应的联系。毛泽东没有对这团缠绕不清的“乱麻”作条分缕析的清理，而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连同理论上的种种分歧和它在国家关系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统统视作了“挑战”，并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击”。于是，他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另一方面又拒绝了至少在客观上有益的批评，维持了他在国内建设上的错误。

当然，执著地追求他自己设计的社会目标模式，是他维护错误更深刻的原因。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一再号召“破除迷信”，但他意识不到他本人已经陷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迷信。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还是迷信得那样真诚和固执！

1960年，中国继续在“大跃进”的轨道上前行。年初，舆论认定1960年国民经济将实现“新跃进”。然而，年末，当寒冬夹带着冰雪降临大地时，现实也冷酷无情地把一个更大的苦果抛给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人。1960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粮食产量降到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比上年减少1292万担，油料减少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比1959年又下降了9.8%，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比上年大量增加，钢产量增加479万吨，达到1866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基建投资总额达388.7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达31%，积累率居高不下。相反，城乡人民消费水平却急剧下降。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国每人年均消费的粮食由406

斤降到 327 斤，猪肉由 102 斤降到 3.1 斤。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少布，政府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实行凭证限量供应。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100 万，问题突出的信阳地区这年有 9 个县死亡率超过 100‰。无论人们的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表明，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几乎退到了崩溃的边缘。

1960 年 12 月 26 日，这天是毛泽东 66 岁生日。中国人喜欢讨口彩，“六”字是个吉利的字眼，两个“六”更是吉上加吉，人称“六六大顺”。毛泽东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书房里，眼望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灾情的报告，不要说大顺，就是小顺的感觉也丝毫没有。

他的卫士长后来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说：

毛泽东点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 7 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 7 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毛泽东用手指指子龙，又指指我。“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

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他又讲起历史上一些大灾荒，讲了当年红军吃树皮、啃草根的斗争生活。说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面对巨大的灾难，毛泽东的心情比一年前更为复杂，也远为沉重，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弄清导致这场他始料不及的灾难的真正原因。尽管他未必会因此对“三面红旗”作彻底的反思，他还是在考虑从既定的政策和步骤上有所退却，而调查研究是这却的第一步，当然，退却与其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为严峻现实迫使所致。

二 一篇老文章

毛泽东看着这本纸质粗糙、颜色发黄的小册子，不禁喜出望外。它其实是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单行本，全文约 5000 字，末页印有“特委 19308.21。翻印”的字样。作者正是毛泽东本人。它写于 1930 年 5 月，是毛泽东在赣南闽西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为反对教条主义而作的。当时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传，后因战争原因散失，但毛泽东多少年来对这篇论述调查研究问题的文章念念不忘。1959 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去福建龙岩收集革命文物时，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 年，中央政治研究室从革命博物馆借去这篇文章。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田家英得知此事，于 1961 年 1 月中旬将原件送给了毛泽东。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读着这些自己当年写下的文字，毛泽东眼前浮现出赣南闽西农村满目翠绿的田野和炊烟袅袅的农舍，仿佛回到了“风展红旗如画”的革命根据地，同老俵们拉家常，问寒暖。

不过，这篇文章被发现之所以令毛泽东高兴，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当时正在大力提倡调查研究。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 月 14 日至 18 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两个会议上，毛泽东都重点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把 1961 年搞成实事求是年，搞成调查研究年。

他说：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他指出：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力。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帐、不退赔，这点不对。上海会议 18 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 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的不够彻底。{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137_1.bmp}

他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下大了解情况，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

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

明后年，搞凡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搞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规格、品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战线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

这次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这次会议标志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一些“左”的错误。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从思想路线上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以消除脱离实际的“五风”。实事求是的发扬，需要从大力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开始。所以，当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得到他30年前写的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真是觉得恰逢其时，如获至宝。在他看来，这篇历史文献对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他专门为这篇文章写了一个批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后附了毛泽东1930年写的这篇文章，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为了在党内兴起调查研究之风，也为了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这篇文章在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料，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一开完，毛泽东本人就组织和领导了3个调查组，分别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担任组长，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进行调查。出发前，毛泽东要求给每个调查组成员发一份他写的《调查工作》，并要求每个调查组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随即，田家英带领的组赴浙江，胡乔木带领的组赴湖南，陈伯达带领的组赴广东，分别开始实地调查。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的重点放在农村，不仅是出于他历来重视农民问题的思想特点，更是因为当时困难最严重的地方是农村，农民缺吃少穿、大量死亡的情况最为突出。当年随同田家英赴浙江农村调查的逢先知回忆说：

说实在的，当时下去调查，只要态度端正，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实在是问题成堆，俯拾即是……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来说（有相当的代表性），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完全是“五风”造成的。……我参加调查的那个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和合生产队，水稻亩产通常是600多斤，1960年竟只有291斤。

各调查组是1月下旬下去调查的，2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便南下浙江、湖南，在杭州和长沙分别听取了浙江调查组、湖南调查组以及两个省的省委负责人汇报。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了一些讲话和插话。

关于公社的规模，毛泽东说，公社太大了，这样就把积极性搞掉了，就搞平均主义了，穷的就依靠富的了，瞎指挥风就来了，生产指挥就谈不到了。他谈到生产队大了还是小了好时说，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生产队太大了。比方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生产队，有11个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是一个生产队，户数虽然不多，但是这个队的地面很广，这个队不知那个队干什么，那个队也不知这个队在干什么。由于地面广，贫富不均，有富队，有贫队，有中间队，在分配的时候要拉平，老百姓就有意见。这怎么会有积极性呢？这种情况就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

关于核算单位是以队为好还是以小队为好，毛泽东说，在一个核算单位里，有富、中、贫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把生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生产以生产小队为单位，不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生产和核算单位不宜大。他还提出解决核算单位问题的办法，指出，第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方案，维持现状。但是在有的地方实行就值得研究。队很大，结果就搞平均主义，这样就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第二种方案是使经济状况大体相同的队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经济基本核算单位。这样老百姓就有了搞头，不然他没有积极性了。总之，一百多户就比较难办事，队大了就复杂了。如果是山区，还要小，二三十户都可以。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食堂化小为好。城市里百把户可以，乡村就不宜。现在二三十户比较普遍。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他还说，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常年办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他强调，办食堂或者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垮台，也应该垮台，如果不垮台那才奇怪呢！

关于自留地问题，毛泽东说自留地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要把反复的原因向农民交待清楚，基层干部要从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死。

关于种植问题，毛泽东说，农业的种植统一搞是不行的，一个公社统一搞很危险，全省更不能统一搞，如果统一搞更危险。

毛泽东还要求解决退赔问题。他说，要决心赔，破产赔。准决定的由谁退赔。要使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作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

就在这一段的汇报中，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制定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的建议。他在上述谈话中提出的一些认识和主张，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做了思想准备。

2月下旬，毛泽东把3个调查组和部分地方党委的负责人召集到广州，开始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羊城的3月，花团锦簇，春意盎然。毛泽东却连日工作，无心欣赏花城的景色，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一就，3月10日至13日，他就在广州召集了有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三

南”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农村工作。

在“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只要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他将《调查工作》的文章印发给与会者，并说道：

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

毛泽东在会上还着重谈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宣读了自己给同时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的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信里接着批评道，对于两个平均主义大问题，中央的同志和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至今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泽东原本打算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赴京送信，同时向“三北”会议介绍“三南”会议的情况，但随即改了主意，要参加“三北”会议的人员即刻到广州，把两个会合并起来开。于是，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议题仍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共有10章：一、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二、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三、公社管理委员会；四、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五、生产队管理委员会；六、社员家庭副业；七、社员；八、干部；九、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十、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共计60条，所以简称为《农业六十条》草案。它的中心在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广州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照例在会上讲话，谈的仍是调查研究：

又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得罪人很多。不过，我不是讲别的，只是讲对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这几年做官了，已经做了八年了，就是不做调查工作。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做调查。在农村要调查六种人的意见，雇农、贫农、下中农，也要调查富裕中农的意见。这次调查从调查两个平均主义入手。

没有调查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就不能解决问题。策略路线包含政治路线，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倒什么人？正确的策略路线，只能从斗争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由此谈到了他的一个心愿：沿着黄河而上，再由长江发源地而下，一个逆流而上，一个顺江而下，不坐火车，只走路骑马，到处做调查研究，那才真是快事。多少年后，他的机要秘书高

智回忆起 1962 年他从毛泽东身边调离时，毛泽东也曾对他说过：“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1965 年高智从外地到北京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再次表示“我还是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然而，毛泽东最终没有能实现进行这一宏大的调查计划。他晚年的最后岁月愈来愈脱离他历来重视的实际，因而犯了严重错误，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后话。广州会议后，《农业六十条》草案发往全党进行讨论，并在个别地方进行试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很快便得到了来自农村第一线调查研究的信息反馈。

4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农村调查。经过调查，刘少奇感到：“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在湖南期间，刘少奇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调查情况。

5 月 7 日，在河北邯郸地区农村进行调查的周恩来，向在上海的毛泽东电话通报了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评工记分的办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四、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5 月 9 日，经过对四川、河南、陕西农村调查后，朱德给毛泽东写信，着重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等问题。信里反映说，农村社员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动力，浪费时间，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信里还反映了基层干部对办食堂的意见：“费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骂，作了不少难；食堂办不好，生产受影响；领导还叫于，群众有意见。”

5 月 10 日，率领 5 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顺义、怀柔县农村调查的邓小平、彭真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报告还反映，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中央其他负责人和中央局及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也向毛泽东送呈了一些调查报告和书信，毛泽东及时将它们批转给各地参考，并在转发这些报告和书信时写下批语，以随时提醒各级党委的负责人。5 月 14 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关于他调查一个生产大队情况的来信上批示：“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在注意来自各地的调查研究的信息同时，也关注着他领导的调查组的工作。广州会议后，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回到浙江，进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试点工作，在试点的过程中还进行讨论。4 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听取田家英的汇报，并研究今后的调查工作。会后，浙江调查组根据会议决定，分成三个调查小组，分赴三个地方，继续对研究中提出的若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从各地反馈回来的调查研究的信息以及他本人所掌握的情况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以完成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即修

改《农业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他还感到农村中尚有若干关键问题需要在近期内作重点调查，这些问题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4月25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请他起草会议通知，决定于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题主要是修改《农业六十条》。会议最后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并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同广州会议比较起来，修正草案最大的变化就是取消了草案中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草案提出“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修正草案则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草案规定继续实行供给制，修正草案则完全取消了这一条。除此以外，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问题，根据讨论情况会后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前者规定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这三种所有制。后者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农村集市贸易，是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不可缺少的三条渠道。两个文件纠正了“大跃进”期间在手工业、商业方面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搞活手工业、商业的一些政策。北京会议无论在深度还是范围上，都比广州会议又向前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对会议作了评价：

这一次会议虽然疲劳，但是大有收获，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搞清楚。去年北戴河会议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10月搞了个“十二条”。九中全会以前，还是要办食堂，三七开。今年3月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那次会议也大有收获，解放了思想，但是不彻底，主要是食堂、供给制问题不彻底，粮食、商业、手工业、山林问题都没有提到，其实是初步解放思想。

他接着说：

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都是逐步认识的，逐步深入的。任何人都一样，我也不例外。

的确，1961年，从冬到春，从春到夏，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是逐步认识的。他最初深感人民公社内部无偿调拨错误的严重，以后又从调查研究的材料中了解到办大社、办食堂、取消自留地等问题。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的认识渐渐贴近了实际。当办大社、办公共食堂，“一平二调”这些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突出特征的错误一旦被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潮就不仅抑制住热浪腾空的势头，而且缓缓平息下来。

三 又上庐山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方面的调整问题。

历史竟会如此惊人地相似。两年前，也是在庐山，也是在夏季，也是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的问题，结果，纠“左”转成了反右，导致了一场国民经济的大灾难。对第一次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心态较为复杂。他对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毫无反悔之意，反倒耿耿于怀，屡屡提及。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8月庐山会议原来纠“左”，纠“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强迫与我们争论。那时非反右不可，右倾机会主义和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和国内右派相呼应，向党进攻，不反不成。但是，对于庐山会议前已经存在、庐山会议后愈演愈烈的灾难，毛泽东又心情沉痛，认为庐山会议的反右打乱了原来的纠“左”步骤。6月在北京会议上，毛泽东曾说，庐山会议，彭、黄起而攻之，搞派别，他们实际是高饶的漏网分子，想乘机整我们，应该反。话锋一转，他又说：我们的错误是不该传达到县以下，如果传到县级以上就好了，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继续反“左”就好了，一反右，造成一个假象，以为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了，其实不是那样。既不否定对彭、黄，张、周的错误批判，又承认庐山会议反右打断纠“左”的失误，这就是毛泽东心态的复杂之处，也是他认识上一种深层的矛盾。

这次又要上庐山开会，这次的会将怎么开呢？

上山之前，毛曾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对于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这时并无后悔之意（“反右是正确的”），但对于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过程、从而遭受更大的“共产风”的破坏，则是痛定思痛，心情确实很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果然，这一次会议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批判的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坦，比较地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又产生了几一个好的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田家英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期是受压的，参加这次会议却是另一种心情。

第二次庐山会议的重点在城市方面。这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主要精力抓农村工作，对农业政策做了较大调整。北京会议时，毛泽东提出：上半年把农业问题安排好，下半年再搞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这次庐山会议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提议召开的。会议提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会议认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会议就工业、财贸、教育等方面的调整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

这次庐山会议的确未蹈第一次庐山会议的覆辙，在宽松的气氛中完成了原定的各项议程。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到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对中央常委说：“听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心情很舒畅，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有辩论，你辩过去，我辩过来，需要。”其实，毛泽东本人心情又何尝不舒畅呢？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庐山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为夫人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这首七绝诗。诗的内容多少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境。

年初以来，毛泽东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北上南下，开会调查，先抓农业，现在又抓了工业、财贸、教育，制定了大政方针，部署了具体步骤。在毛泽东看来，事情已经比较清楚，并在好转，问题已经不那么大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个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际，可以稳步上升了。他还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他甚至这样谈到几年来的问题：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

面对那样严重的困难，毛泽东上面这些话的确显示了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从容是从容，却含有某种过于乐观的成份。就政策而言，各方面特别是农业方面已经开始了调整，但不等于实际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开始一天天上升。因为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比制定政策的过程时间要长，困难要多，所以政策的制定并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取得全面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当时的经济生活还远不是“一天天向上升”的局面，工业方面还在继续下降，危机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毛泽东的估计比实际情况要好，曾使他的秘书田家英感到不安：

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田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他半夜里睡不着觉，便到梅行（当时参加起草《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的卧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

同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相联系，毛泽东对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彻底的。或者换句话说，1961年的这一系列纠“左”的工作，还不是从指导思想上来解决问题的。

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实际上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表层次的问题，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及一系列具体做法；一个是深层次的问题，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其主体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目标模式的构想和超高速发展战略。前者是枝，后者是干；前者是流，后者是源。要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就要解决作为本源的深层次问题。认识深层次问题比认识表层次问题要困难得多，因为深层次问题的形成，有久远的历史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原因。就毛泽东个人而言，认识深层次问题要更困难些，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是他本人提出来，并且是他孜孜不倦所追求的。

应当肯定，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表层次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是，他没有去触及作为这两个运动的指导思想，相反，他甚至仍然维护它们。就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他还肯定“总路线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看来，指导思想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执行的过程中。所以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只要在退赔问题上改了，就能成为红旗。就

其认识过程而言，在表层次问题上表现了勇气，在深层次问题上则出现了停滞。正是由于认识过程的不彻底，毛泽东才会说“错误就那么一点”。当然，对错误的不彻底认识，还没有妨碍对表层次问题的解决。

河北邯郸。

刚下庐山的毛泽东在这里召集河北、山东等省的省委负责人谈话，调查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从普遍发展高级社以后，特别是普遍建立公社以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过大，生产权和分配权因此不统一，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半年前，河北要求全省实行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山东提出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广州会议曾议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通过。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依然关注农村工作，其中特别注意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问题，所以去较早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河北调查。

在座谈中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毛泽东说的“脚”是指生产队，“腰”是指生产大队。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对核算单位退到小队的不同看法时，毛泽东说：

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三级所有，土地还是放在大队好，名义上归大队所有，实际上还是归小队使用。

9月29日，即毛泽东召集座谈会的第三天，他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大队，分配权却在小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毛泽东还在信里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该醒过来了吧？”毛泽东随信附去河北邯郸座谈会的记录及河北、山东、湖北、广东等省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他建议各地党委派调查组去农村作调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看究竟哪个办法好。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0月7日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并附了毛泽东召集邯郸谈话会的记录和河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材料。《指示》说：“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指示》要求各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在一两个点进行试验，并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1961年岁尾。当冰雪又一次覆盖大地时，毛泽东已然挥去了一年前沉重的感觉，满怀轻松和愉悦。他对中央的同志说，他感觉去年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六十条”一搞，最近把队为基础更进一步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见效了，毛泽东兴致盎然，禁不住笔走龙蛇，写下《卜算子·咏梅》这首词来。相比之下，陆放翁“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孤芳自赏显得有些可笑，而“已是黄昏独自愁”的凄凉抑郁又显得有些可怜。在毛泽东眼里，虽然雪飘四野，冰挂悬崖，但傲然怒放的梅花不己透露出春天的信息吗？虽然严冬中梅花独绽枝头，但她不正等待着同粲然烂漫的山花一道去拥抱春天吗？

四 “未必认识的必然王国”

春天毕竟尚未来临，严冬依旧笼罩大地。

尽管已经进行了一年的调整，经济形势仍然异常严峻，困难还在不断暴露，甚至在加深。农业方面，1961年全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主要农产品除粮食外，棉花、糖、烟、黄红麻、茶等经济作物继续大幅度减产。轻工业由于受经济作物继续减产的影响。1961年全年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1.6%。国家财政收入，1961年比上年减少37.8%，货币发行量则急剧上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减少12.8%，1961年年内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增加了29.8亿元，每人民币元流通量拥有的零售商品只有5.1元，是建国以后13年中最少的一年。市场商品供应货源紧张，物价上涨，零售物价上涨了16.2%。全民所有制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为415元，比1957年下降了29%。1961年，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消费量比上年减少9斤，食油消费量比上年减少0.9斤，棉布消费量由上年的25尺减少到8.6尺。人民生活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对于形势的认识和今后任务的安排，党内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头脑较为冷静，估计形势较为客观，认为必须把困难估计够，才能搞好调整。有些人虽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调整的必要性，但是担心被视作否定“三面红旗”，因而在调整的步子上踌躇迟疑。也有不少人以为不必把困难看得过重，不能“泄气”，并期望形势好转后再度“大干”，继续“跃进”，因而不愿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和降低居高不下的经济指标，此外，许多党员，干部对“大跃进”特别是“反右倾”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上级领导缺乏民主作风、主观主义、瞎指挥，下面不敢说真话的状况意见极大，不少人还有埋怨情绪。认识的差异、分歧以至对立，表明全党没有在思想上达到自觉的共识，没有形成统一的步调，调整工作自然难以顺利进行。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全面总结经验，客观认识形势，统一全党思想，部署今后工作。毛泽东觉得按以往的规模和开法，难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落实到县一级，提议改变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惯例，扩大会议的规模，让地。县两级党委和部分大型厂矿党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所以，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数达7118人，被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

会议是1962年1月11日开幕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刘少奇代表中央对会议所作的书面报告。与以往不同，报告的稿子尚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就建议立即发印全体与会者，请与会者提意见。

按原定计划，会议在讨论、修改和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再由中央主要领导人作讲话之后即结束。可是，书面报告印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11)许多与会者觉得时间短，还有许多话没有说，要求会议强调发扬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话不敢说，上下级关系不融洽，有人不让下面说话，下面的人心里“有气”。

毛泽东改变原定会议期，提议延长时间，号召开“出气会”。1月29日，他在大会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关键要上下通气，要在这次全国五级干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用他的话说，叫“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

大家满意”。在会上，毛泽东邀请与会的7000多人一同在北京过春节。毛泽东言毕，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昂，与会者热烈欢迎毛泽东的提议。因此，“七千人大会”延长到2月7日才结束。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一共讲了六个问题，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ewc MVIMAGE,MVIMAGE,!09100690_0156_1.bmp}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毛泽东还从克服困难的角度，谈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他特别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的现象：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

话说得尖锐，但的确是事实，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损害，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达到泛滥成灾的程度，对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假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左”倾错误就缺乏起码的基础。

不过，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省、地、县三级党委的负责人，对于中央尤其是中央领导层却只字未提。然而，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恰恰首先来自中央核心。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中央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情况，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则使中央领导层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在这个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本人的个人专断都发展起来。这是民主集中制不能在党内真正贯彻的关键原因。对此，毛泽东没有任何反思与自省。他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阐述不能不因此而大打折扣。

当然，在大会上，毛泽东也谈到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自己的责任：

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1961年以来，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自己的错误，作自我批评。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甚懂，有点懂”，

并说“有错误就要讲”，要求与会者把他本人的错误传达到各省去。这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同中央书记处的谈话中又说：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当着从中央到县委一级负责人作自我批评，不仅对错误承担了责任，而且推动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负责人自我反省。

有意思的是，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报告起草委员会曾发生过一次争论，争论的问题正好是“毛主席有没有责任”、“毛主席能不能批评”。在讨论中，彭真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彭真还说：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陈伯达却反驳说，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起而答辩道：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如果说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争论只是一个“插曲”的话，那么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则是一番精心的“表演”。

林彪说：

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少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地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林彪这个异乎寻常的讲话，同“七千人大会”重点总结教训的基调极不协调。按照林彪的说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不是全党实践毛泽东空想的社会目标模式的构想和超高速发展战略的结果，而是人们从“左”的方面理解毛泽东的主张和思想的结果。再明显不过了，林彪是在维护毛泽东的“一贯正确”，加深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报告起草委员会的争论和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都是在毛泽东对全体与会者作自我批评之前。看来，这两件事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在这个7000多人的场合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过，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位专家介绍的一个情况，让人感到事情颇为微妙：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当时便很欣赏并加以赞扬。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大意）罗瑞卿回答说：我作不出来。（13）

这是毛泽东的由衷之言。把这番话同他关于承认错误的话作一比较的话，不能不使人感到这番话的意味深长。

除了重点讲民主集中制以外，毛泽东还特别讲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整个讲话的又一个重点，就篇幅而言，它比民主集中制问题还要长一些。

毛泽东首先讲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并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过程，然后说道：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是在分析或解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原因，尽管他并没有明说。这个原因，在毛泽东看来，是由于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王国。

用认识论来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在毛泽东说来，已经不是第一次。1960年6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十年总结》里就说过：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961年11月，他在同一个省委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也说，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讲全党，我们过去十一年就是闹不清楚如何搞法？要革命，如何革命？建设如何建法？规律找出了一些，也不那么完全。

在30年代写下《矛盾论》、《实践论》名篇的毛泽东，不愧是运用哲学语言解释事物的政治家。应该说，毛泽东所阐述的认识论原因是真实的，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人们会由于认识的原因而犯错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仅对中国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而且就世界范围来说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没有现成的尽善尽美的模式可以遵循，人们必然在探索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与偏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同样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认识方面的原因并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发生的唯一原因。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延续三年，遍及全国，导致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困难，而其间纠“左”的努力屡遭挫折。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仅以认识方面的原因来解释又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而言，都是一项新的事业，都有一个逐步认识与摸

索的问题，这些国家在 50 年代都先后发生过一些问题，但是为什么没何发生像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样严重的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人们还无法对它作出判断，甚至以美好的愿望来赞颂它，但是当它很快就在实践中暴露出问题，实践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客观认识它的条件的时候，为什么人们的认识仍然没有前进？或者人们的认识有所前进（如庐山会议前期），却又很快倒退了昵？在同样的客观环境下，面对并不难于作出是非判断的情况，为什么有的人冷静地看出了问题，而有的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实际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的产生与发展，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

然而，关于认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看法，对分析和深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的原因，实际起了模糊视线的作用。这种看法以认识方面的原因掩盖住了其他的更重要的原因，妨碍人们全面而又更加深刻地总结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在谈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时这样说过：

在 1958 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里，实质上毛泽东是肯定了“三面红旗”，只是认为在“三面红旗”之下缺乏一整套符合实际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他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说明这一点，指出党也是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三面红旗”对了，但缺乏一整套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这恐怕就是毛泽东所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王国”尚未被认识的表现。

无论从认识的过程看，还是从三年“大跃进”的事实看，毛泽东所说都是有道理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的形成和完善的确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政策、方针也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对此，应该作出总结。问题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不是具体政策和方针的错误。主要是总体上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了实际。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后者是前者的依据；前者是外壳，后者是核心。假若只是从具体政策、方针上进行调整，而不对错误的指导思想作反思和清理，其结果或者是对具体政策、方针和办法的调整不彻底，或者是新制定的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方针和办法同原有的一整套指导思想发生矛盾，以导致冲突。

事实上，在评价和认识“三面红旗”的问题上，“七千人大会”已经产生了思想分歧。在小组讨论中，有这样一些发言：

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不能笼统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

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己也不怀疑。但是，为什么实际出了这么多问题，

而且这么严重，这么普遍，造成这么大的困难。

“三面红旗”是不是正确，原则上好讲，实践上难讲；抽象讲好讲，具体讲不好讲。

这样一些看法，显然是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以至批评。

在中央领导层，更是存在分歧。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的时候是不那么完整的，可是，它在发展中已经逐渐地完整起来，逐渐地具体起来，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地完整，继续地具体化，继续地发挥作用。”林彪的讲话同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一致的。

另一种看法是以曲折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中这样谈到“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未明确否定“三面红旗”，甚至还讲要继续为“三面红旗”奋斗。但是，只要同林彪的讲话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差异。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没有作最终的定论，甚至还明确说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实际上他对“三面红旗”怀有疑问甚至批评。正因为这一点，毛泽东对刘少奇心怀不满，而且渐渐不信任刘少奇。1966年毛泽东在批判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特别点到“1962年的右倾”，就包括这件事。

“七千人大会”上关于“三面红旗”的思想分歧，是一种十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之后所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同原有的一整套带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之间。“七千人大会”看起来仍然肯定了“三面红旗”，但这不说明消弥了思想分歧，相反，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分歧继续存在并发展着。新认识的主体按照自身的认识，在6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某些带萌芽性质的改革。而毛泽东带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则遇到了挑战。他逐渐感到“纯洁”的社会主义理想受到“玷污”和“冲撞”，终于决心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以捍卫他所构筑的东方“太阳城”。

1958年，毛泽东不无豪迈他说过：“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其实，这梦想也是他本人的，毛泽东还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编织这个梦了。

然而，事情却并不如人意。狂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了巨大的困难之中。梦想没有实现，更没有被超过。毛泽东开始改变他自己在狂热中提出或赞同的主张（如“吃饭不要钱”，供给制、办公共食堂等），甚至承认社会主义建设对自己来说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毛泽东对错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但是，毛泽东一方面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着手进行经济调整；另一方面继续肯定“三面红旗”，只把犯错误的原因定在“缺乏经验”这个认识层面上，而根本不去反思他构想的那个社会目标模式。实际上，他是试图在不触动那个关于社会目标模式构想的前提下，进行某些方面的政策调整。在他看

来，这既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容许人们在否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调整。60年代初，毛泽东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

从毛泽东自身而言，以往的经验仍然在束缚着他。物质匮乏的战争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平均消费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使毛泽东确信“大同”不仅是理想，也曾经是现实。经验的巨大力量使毛泽东认为“大同”理想的实现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不过是军事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再现。即便军事共产主义在实行中碰壁，他也不怀疑自己的经验，看不到经验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由于正在经历开国以来空前的困难，在毛泽东的意识里，这一时沉了下去。但它绝没有消失，一旦条件适合，它又会重新浮现的，不是吗？七千人大会后不到五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又一次提出了类似1958年的某些设想。

第四章 转折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

从1960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卧薪尝胆，沉痛自责。经过一年多深入调查和紧张工作，形势已出现了明显的转机，毛泽东沉重的心情逐渐开朗。1961年8月，他在动身前往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曾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七千人大会中，尽管有使他不如意的地方，但刘少奇报告中所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代表中央认识的重要判断，却与他的认识相同，使他感到宽慰。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形势已开始好转，并将以更快的速度好转，毛泽东如释重负，开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他认为，现在所应着力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贯彻《六十条》，继续解决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1962年五月下旬，他还曾要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到湖南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没有料到，在北京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也没有料到，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即发现的新情况，很快就改变了中央领导层刚刚形成的共识，进一步的调整暴露并发展了以往潜在的分歧和矛盾。更重要的是，这些分歧和矛盾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尽管当时他们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

— “一个很困难的经济形势”

1962年上半年进一步全面的、“伤筋动骨”的调整，开始于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对经济形势的重新认识。

七千人大会曾对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宣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会后不久，中央就发现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其主要原因是发现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将有几十亿元的赤字。在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专门分析了经济形势中出现的新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会间，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非常时期的时期。

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必须肯定“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在列举了目前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困难后指出，农业连年大减产和建设规模超出了经济可能与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两点，是经济困难的最主要成因。据此，他提出将10年规划为恢复和发展两段，而目前主要集中考虑恢复，考虑克服困难，恢复工农业。关于恢复时间，陈云强调“争取快，准备慢”的原则，具体时间他认为从1960年算起，大体需要5年。

陈云的报告当即得到了“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鼓掌”，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和赞同。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他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和方针政策。根据刘少奇的建议，陈云于2月26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会后，刘少奇主张立即以中央名义将陈云的报告转发全国，并要求在按语中说明：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困难有十分，只讲七分、八分，讲少了，工作被动；把困难估计够，甚至于估计得多一点，我们工作主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邓小平快人快语，他在书记处会议上说，报告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

1962年3月7日，在一次会议上，陈云把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必须采取的调整措施以更尖锐的形式摆在全党面前。他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根据以上认识，当时在北京主持调整工作的中央一线领导，反复强调要求全党以实事求是、敢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待经济形势，力求在形势问题上统一全党认识，以此作为进一步调整的前提。

4月2日，中央在批转财贸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中央认为，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1962年1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今年国家财政，在采取措施以前有50亿元的赤字，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目前主动承担这些困难，比财政继续发生赤字，通货继续膨胀，将来被迫承担更大的困难，要好得多。”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方针、

办法和措施。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又说道：“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一点，我看要跟干部讲清楚。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他又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也讲了类似的内容，他说：“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指出，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按照 1962 年的调整计划，同 1957 年比较，农业总产值仍将减少 22%，主要农畜产品的产量，绝大多数还将低于 1952 年的水平；轻工业总产值将增长 9.6%，而其中 6 种吃的将减少 37%，14 种穿的将减少 39%；重工业总产值将增长 42%。目前农业生产提供的农副产品，无论如何也供养不了现在这么多的城镇人口，农轻重之间的矛盾还很尖锐，”

党中央在批发这份报告的指示中，又对形势作了系统、中肯的分析：“今年 1 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对于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有些同志问：现在我们对于困难的认识是不是已经够了。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但是，应该指出，有一些具体的困难，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今后也还可能出现一些现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ewc MV IMAGE, MV IMAGE, !09100690_0173_1.bmp}同时，也应该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不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逐步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有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的可能。这是全党干部必须警惕的。现在，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谈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讲话的精神，《指示》又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多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从西楼会议到 5 月中央常委会议，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央一线领导对当时经济形势及其原因的认识，又产生了一个飞跃。根据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中央一系列覆盖面广、力度大的调整措施相继出台。西楼会议后，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并任命陈云为组长。5 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后，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对国民经济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整。

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第三，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第四，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等等。

因为认识提高，决心大，措施得力，经过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这次规模空前的经济调整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至 1962 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财政收支在连续 4 年出现赤字之后，首次出现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

1962 年调整工作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年初对经济形势的重新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是实事求是、深入调查、正视困难的结果。这种认识解决了主观同客观的矛盾，但却又引出了一个新的、更为深刻的、在当时还难以被人们深刻觉察的矛盾：在不能触动“三面红旗”的条件下，如何解释如此严重的困难局势？换言之，这样严重地估计困难，会对“三面红旗”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个问题的后面，隐含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观念的深刻冲突。

二 “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

1956年三大改造后不久，中国农村经济中随之完全自发地产生了一个新的事物——包产到户，至60年代初，它已经几起几落，人们对它褒贬不一。

高级社建立后在分配中存在着的平均主义，使广大农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寻找实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形式。1957年春一些地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对平均主义的抵制，但在当时却被当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的几个月中，河南、江苏、甘肃等地又出现包产到户的做法，而在当年庐山会议后，它又再次受到批判，被认为“实际上是恢复单干”，“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合作化以来，每当党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时，每当农村政策稍有放宽时，总会有农民自发地起来搞“包产到户”，虽屡禁而不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包产到户这种经营形式，在许多方面适合中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适合中国大多数农民的需要，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

1960年以后，在安徽、广西等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又自发地以各种形式恢复了包产到户。1961年3月初，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包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同年7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做法，毛泽东表示同意试一试。于是，到这年秋末，安徽省实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达全省的85.4%，增长效果明显。与此同时，其他省份的包产到户也呈迅速发展之势。9月底，为彻底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再下放到生产队（即原小队）的意见。10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就是否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报告意见。自此，毛泽东改变了看法。他认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问题便基本上解决了。“责任田”之类的做法没有必要再搞了。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重申，包产到户等是变相单干，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应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撤职处分。

包产到户等形式适应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满足了农民多劳多得的愿望。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法遏制生产力这种内在的需要和冲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农民满意，却未能使他们满足。已经尝到包产到户甜头的农民凭着自己的本能继续向前走去，他们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明改暗不改，希望通过包产到户一类的形式，使自己真正成为生产的主人。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在社会的某种需要未得到满足之前，它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农民的这类要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甚至支持。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经过长期多方面的调查、思考，认为安徽等地实行的“责任田”或“包产到户”等不是方向性错误，肯定了农村生产责任制和产量相结合的作法。他还提出，要适当扩大自留地和允许一定范围内小自由的存在，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等等。他的这些观点，曾在1962年5月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和6月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过，在同年春、夏的一些报告和讲话中也多次提到。

邓子恢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内，是很有代表性的。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朱德就曾提出：单干户全国调查还有多少？是否在《六十条》上单写一条，这样才好，才合法；单于户将来十年、八年还会有，你不写，他也存在。1961年8月，陈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青浦农村调查》中，坦率地提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关于自留地，陈云指出：“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也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针对当时党内有人坚持“私人不能多搞”的说法，陈云提出“要大胆让私人搞”的意见。1962年6月，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也提出：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邓小平在1962年7月的几次会上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7月，陈云也先后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提出，“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存在”，可以采取“分田到户”（即大包干）等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恢复生产，等等。1962年上半年，周恩来也请杨尚昆打电话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询问：“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尽管在此之前党中央所发生的文件中，已经几次把“包产到户”定性为单干，但在1962年上半年，在党中央的领导层内，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明显地对“包产到户”采取了现实、宽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最富有戏剧性的变化甚至就发生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原来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省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含泪附信一封。他在信中说：“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互助求生，他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田家英在这封信中所持的观点和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毛泽东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家英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1962年2、3月间，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去湖南农村调查，在短短几个月中，他改变了一年前坚决不同意包产到户的看法，向毛泽东呈上了一份客观地反映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6、7月间，他再次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他在汇报中说到：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由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60%是集体的或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11）

田家英通过调查研究所发生的深刻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的

迫切要求，反映了当时党内许多人的共识。在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萌动、发展，鉴于党内在包产到户、责任田等问题上的认识仍不统一，中央指示各省省委对此类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为在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研究和解决农业问题做好准备。

三 从“甄别平反”到“脱帽加冕”

60年代初的调整是深刻的、全面的，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它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建设上的退够和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调整，而且还深入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重要调整。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扩大化错误，几乎都在这次调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

在政治领域里，最引人注目的调整，是后来被指责为“翻案风”的甄别平反。

1961年6月1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在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的指示中提出，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这一工作由农村到城市陆续展开后，取得一定进展，但由于一些地区和单位领导认识上的差距，甄别工作发展得很不平衡。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近几年来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或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1962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即对过去搞错了或基本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了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这一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后，甄别平反工作迅速地全面展开。到1962年8月，全国已有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这一重大决策为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整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

甄别平反的结果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在600多万主要是因为对“三面红旗”持有不同意见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员、干部、群众平反之后，“三面红旗”原先那种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又一次面临着挑战。使人们不满的不仅有“大跃进”自身的错误，而且还有“大跃进”得以发动起来的种种粗暴形式。事实上，与经济调整同步的甄别平反，与不能触动“三面红旗”的前提和基调是很不协调的。从更深的层次看，这项工作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触及到了当时已经萌生的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时代的限制，尽管当时多数人的认识还停留在具体工作和政策的层面上，但对于中央领导层那些思想敏锐、历史感强并亨握全局的人来说，对这项工作深刻含义的感受远比一般人更力强烈。

这次甄别平反工作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例如，中央认为，对1957年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人，除其中个别者外，一般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再例如，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仍然维持1959年的结论。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发言中曾说到，彭德怀1959年那封信，不少是符合事实的，提意见的方式也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这封信写错了；问题在于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国际背景”，搞“反党活动”，等等。刘少奇的这些话，代表了当时中央常委的意见。诸如此类的局限性，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历史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对这类问题提出疑问的时候，更何况解决。

彭德怀不同意对他的指责。1962年6月，他向中央呈送了八万余言的申诉材料，为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辩护。人们不难想象，这种申诉将会招致对他个人的又一次严厉批判；但是，人们却很难想象，不久之后，刘少奇等人和彭德怀却都被带上了同一顶帽子——翻案风。

在政治领域里，除甄别平反外，中央还自觉、主动地采取其他一系列得力措施，缓和当时紧张的政治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针对1957年反右运动后发展起来的扩大化倾向，以及庐山会议后大范围反右倾拔白旗所产生的国内政治关系紧张化的局面，在1962年3至4月举行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对于今后我国的阶级斗争，应该看到它的总趋势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在当时得到党内外普遍的、衷心的拥护，成为上层建筑领域里调整的基本指导思想。在1962年初举行的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在这些会议上就当前形势和工作中的问题发表了坦诚的讲话，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气，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在此后召集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民族工作会议上，检查了近几年来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强调必须正确处理阶级

181782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工作等各方面的的问题，加强全国各阶级和各民族的团结，等等。党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自1957年以来政治领域里的紧张关系，为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政治调整的同时，思想文化方面调整的力度也在明显加大。1961年至1962年间，党中央先后批发了《科研40条》、《高教60条》、《文艺8条》等文件。这些文件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科学、教育、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等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在文化工作中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左”的偏向，突出了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和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内容。

为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的报告。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陈毅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宣布了这一科学论断。

以上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周恩来、陈毅等的重要讲话，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有效地改善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使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工作秩序得以从大跃进所造成的混乱状态中恢复起来。重要的是，在这种恢复中，通过总结经验和对大跃进以来“左”倾思潮的清理——尽管这种清理还远不能说是彻底的，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逐步形成，初具规模。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许多在大跃进中被冠之以“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做法，已在逐渐失去往日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而在这两者的对比之中，我们也可以隐约地感受到两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分歧和消长。

总而言之，七千人大会以后，由于认识的深化，各项调整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向深度、广度方面发展，并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在实际上，由于“左”倾错误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为人们在不大长的时间里比较深刻地认识这种错误提供了可能），以及克服严重困难的迫切需要（这使人们有可能冲破一些禁区 and 传统观念），实践的洪流很快就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原有的框框。人们越来越接近于几乎是从总体上怀疑以至否定 1958 年时的那种模式了——尽管当时他们还不可能从理论上提出“模式”这一概念，对形势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实际的估计，在客观上无异于对“左”的错误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批评。解散食堂，下放基本核算单位等，实际上使人民公社远离初衷，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高级社的水平，包产到户的再次出现并迅速推广，则已经是近乎对“公社化”的“全盘否定”了，而这居然还得到了党内领导层许多人的支持或认可；甄别平反不仅是对 1958 年以来扩大化错误的否定，也是对被平反者当年意见的某种肯定：知识分子政策及文化。科技、教育政策的调整，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 1958 年“拔白旗”、“教育革命”、“文化革命”中许多极端的做法。

深入的调整甚至不再满足于对大跃进的怀疑，而把反思的视野扩大到 1958 年以前的年月。1962 年 7 月，邓子恢在一个报告中说到：“1958 年以来问题很多，但事实上毛病不是从 1958 年开始。合作化以来就有毛病了，根子很深。”他又说：“为什么互助组时期最好呢？那时的经营管理是个体所有，彼此互相分工，农民积极性很高。”这种敏锐的历史眼光，把 1958 年的错误同三大改造后期已现端倪的急躁情绪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这种观点又能被人们接受到什么程度呢？除去调整的深度以外，调整的全面性及各领域调整的同步、协调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济领域里的调整，很快就在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中引起连锁反应，并一度形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调整以同样力度、深度发展的良好势头。人们曾经用“伤筋动骨”来形容当时的经济调整，实际上，这个形容词在一定程度上的也适应政治、文化等领域里的调整。

实际上，从实质上看，调整就是对大跃进某种程度上否定，是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某种程度的改革，虽然这种实质在当时还未能被人们所深刻理解。也应看到，“三面红旗”的模式，特别是它的那些极端的形式，虽然受到多方面的强烈冲击，但在一些更深的层次上，它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例如，就是在中央领导层内积极支持包产到户或对它采取宽容态度的领导人中，也往往把它当作是“单干”，把它当作渡过困难的权宜之计，“等形势好了再改回来”。

从调整的那一天起，中国就开始接触到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调整的加速进行和深入发展，随着调整的深层性质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这次历史选择的结局日益迫近：或者是势头良好的深入调整在不久的将来摆脱自己虚幻的前提，把具体的调整上升为对陈旧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或者是在被深入发展的调整所激化的矛盾冲突中，调整被迫中断或部分中断。

当时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者们，都希望在 8、9 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讨论和分析半年多来迅速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在诸如包产到户一类问题上统一全党的认识，进一步推动调整深入发展。

那么，七千人大会之后，对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争论，毛泽东的态度如何

呢？半年多来，毛泽东对此似乎没有直接提出多少系统、全面的意见。但是，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明白，他的态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都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能听到他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希望听到与中央多数人相近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在社会上系统阐述的观点却出乎他们的意外。

四 心事浩茫

七千人大会后至 1962 年夏季，国内形势和党内外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又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全党又一次面临着重要的选择。

那么，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在这次历史选择面前，他的目光将注视着哪一方面呢？

从 1958 年至今，毛泽东的思想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他是大跃进的积极发动者和热情支持者，他又是较早发现大跃进运动中的严重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纠正错误的中央领导之一。但几个月之后，他又因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而导致了大跃进的错误再次泛滥。从 1960 年起，当国内各种经济关系全面紧张，饥饿的阴影笼罩神州大地时，他再次清醒过来。从 1960 年夏天起，农村中的严重情况逐渐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的心情沉重起来。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对农民有着一种特殊的深厚感情。他热爱农民，灵犀相通。他曾对中国农村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在农民问题上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不久之前，他还满怀豪情地希望通过人民公社、大跃进使中国农民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捷径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现在，却面对着农民普遍忍饥挨饿的严酷现实。他忧心如焚，痛心疾首，内疚自责。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有时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有的。在严重的困难面前，他首先想到的是严于律己，与全国人民患难与共。在最困难的 1960 年，他 7 个月没吃过一次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充当一餐饭，一盘炒菠菜支撑着一天的工作。他流着眼泪吃下身边警卫战士从农村带来的农民的口粮——糠菜窝头，他甚至同全国人民一样因饥饿而浮肿。

毛泽东按照他的方式苦苦地寻找着发生错误的原因。他含着眼泪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调查。他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他严肃地要求他们“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¹²⁾他迫切地希望拨开浮夸风的重重迷雾，冲破官僚高压所设置的层层屏障，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意愿，看到问题症结之所在。困难使他头脑冷静，使他逐渐从空想的殿堂接近了严峻的现实。

在调整阶段的前期，即大致在 1960 年底至 1961 年 9 月之间，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在诸如对困难程度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克服困难的方法、调整的重点及步骤等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或比较接近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思想，采取的许多措施，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都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他反复要求全党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加强调查研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他坦率地承认支持办食堂是不了解情况，是受了骗，多次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错误，下大决心纠正此类问题；他提出要为 1958 年以来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的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主持的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他亲自主持制订的《60 条》，对于克服人民公社体制中的许多弊端，稳定农村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等等。1961 年下半年，他根据多方调查和反复比较、研究，终于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公社内部关系又作了一次重大

调整。这一调整虽然还未能解决人民公社体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但在当时的确使人民公社退到了较为现实的基础之上，解决了一批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一政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在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克服严峻困难的紧张工作中，已经宣布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在实际上往往仍然处在领导第一线，发挥着统帅和核心的作用，从思想路线和重要的方针政策方面指导着全党的工作，这也是调整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主要条件。

与此相适应，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我们只要把他在大跃进年代和在调整第一阶段里，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人民公社的规模和公有制水平，以及在诸如食堂、供给制、平衡与不平衡等问题上的言论和认识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的幅度和范围，就应当承认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自1962年以后，虽然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越来越严重的错误，但直到去世，不论别人的头脑是否发热，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在建设速度问题上，他始终保持了比较冷静、慎重的态度，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这些变化是稳固的。毛泽东的思想中这些深刻、积极、稳固的变化，是党最终胜利地完成调整任务的重要保证。

但是，毛泽东认识上的这些变化，在1961年秋至1962年年初间，也就是调整工作初见成效以后，似乎已达到了一个极限，因而停滞了。

这种变化首先比较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上。调整之初，他没用多少时间就比较客观、清醒地认清了形势。在此基础上，他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开始了在思想上和政策上的一系列重要转变。到196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认为，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报告中有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的论断，反映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心情。可能是出于这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和困难已经过去认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并不涉及各项具体工作的调整，而是侧重于阐述党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及思想方法方面的一些问题，带有从方法论上总结前一段工作，指导下一段工作的意味。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他也不像以往那样主动、坦率、严厉地谈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了，他甚至对别人像以往那样谈论错误表示反感。在1961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有人在发言中谈及所犯错误时，他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那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而几个月前，在1961年5至6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还主动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说：“违背客观事物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13)两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1961年7月，毛泽东曾对安徽省“责任田”表示了可以“试一试”的态度。但到同年9月，当他提出了将基本核算单位再下放到生产队的意见后，便认为农村的平均主义问题已经解决，“责任田”之类办法没有必要再试行下去了。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又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做法是变相单干，是不正确的。

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前。现在的问题是，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一线领导根据对形势的重新认识，又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有力措施，使调

整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出了七千人大会以前调整的初期阶段。面对着这样一种发展，认识基本上已停留在七千人大会时期的毛泽东，会有一些什么想法呢？西楼会议对形势的重新估计以及据此采取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上的变动，他能接受多少？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工作广泛、有力地迅速展开，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本意和初衷？对于认为农村问题由于下放核算单位而已完满解决的毛泽东来说，1962年上半年在党内外、中央和地方再一次出现的“包产到户热”意味着什么？面对着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浪潮，他是否愿意修正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他发现名义上是作为与总路线相配套的各项工作的条例实质上是在强调科学、纪律、秩序和效率，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对总路线的否定时，他在这两者中的选择会更倾向于哪一方？

1962年春天和复初，毛泽东似乎在保持着沉默，没有多少公开的言论。他在仔细地观察着，苦苦地思索着。年初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不少已超出了他的预想，有些甚至本来就与他的认识相左。这些事情如果只是个别地出现，他不会感到多少意外，有的甚至也可以接受。而现在这些事情却是同时出现，同步发展，且大有燎原之势，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震动和深思。调整超出了他的设想和限度，而他的目光也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分歧，他在思考着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命运。到夏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他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成熟了。对于如何回答历史摆在人们面前的选择，他的答案已经了然于胸。对于这一点，西方的一些学者也看到了。“1962年夏，当毛出席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他对自己面临的挑战已经了如指掌，对他自己的战略已经成竹在胸。毛表示他对七千人大会后几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14)

五 新模式的确立

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为讨论农业财贸、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却离开了会议原定内容，提出了几个出人意料的新题目：阶级、形势和矛盾。

关于阶级，他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他说：

形势问题，也要谈一谈。国际问题，究竟是什么情况。国内形势，究竟这二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小，确实很大。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他说：

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过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实际上重新为会议确定了主题，为会议定下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调子。此后，这次会议和随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着重讨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问题。对于这次讲话，他事后曾说过，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就可能顺理成章。

(15)

如果说，毛泽东8月6日的讲话还只是使人感到突然和困惑，那么，他在8月9日的发言就是使人震惊了。在这天的发言中，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在这个总题目下，他又讲了单干问题、形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总结经验问题等。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了分组讨论。从8月26日至9月23日，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讲话中，他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问题，正面地、集中地、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近几年来党内、国

内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关于阶级问题，他讲得比北戴河会议时更系统，更具有理论色彩了。他说：

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所以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后，都经过了几次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关于形势问题，他说：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国际形势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1959年、1960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是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更早了，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11月、12月武昌会议，1959年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4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1960年间，因为修正主义压我们，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反赫鲁晓夫去了。

关于矛盾，他在列举了国际上的各种矛盾以后，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在明确了这种矛盾的性质以后，他又进一步说到了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

关于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和资产阶级的问題，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

对于当时正在顺利进行的甄别平反工作，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平反。

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发言近十次之多。发言中，他从历史的和理论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当时党内国内一些重大事件和分歧的看法。讲话涉及不少方面，

但中心还是围绕着他在8月6日和9月24日讲话中所提出的“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上。在这三个题目下，他以浓厚的理论色彩和开阔的视野，对当时在党内外成为热点的形势问题、包产到户问题、甄别平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中的“右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是认识事物、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七千人大会后显露或发展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形势的不同认识。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作为他在会上所阐述的观点的逻辑起点。

他对形势的认识明显地不同于中央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58年底，毛泽东比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当时，出于保护群众积极性的考虑和对“观潮派”、“算账派”的警惕，他对这些问题采取了淡化以至回避的态度。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尽管人们对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已是噤若寒蝉，到处都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呼声，尽管有时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需要，他也曾以轻蔑的口气把困难说成是无非是猪肉、蔬菜、肥皂不够，头发卡子不够，但毛泽东却不再像1958年那样头脑发热，他的态度是比较冷静的。在1960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要求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时间估计得长一些。1961年以后，经过多方面的调查，他对形势有了更深入、实际的认识，他承认，最近三年我们受了很大的惩罚，碰了钉子，吃了苦。(16)但是，与当时困难的实际程度和原因相比，他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差距。所以，在形势恢复的速度上，他又总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早在1961年1月，他就满怀信心地预言：“四个月以后，事情就好办了。”(17)

1961年下半年，《六十条》在全国范围内宣讲和试行后，在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很好的效果。农业很快开始复苏。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样，感到高兴和振奋。1961年8至9月间，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意在继农业问题之后，系统地解决工业、教育、科技等战线方面的问题。上山之前，毛泽东曾表示，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当时，他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他在会上曾说，问题暴露出来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这次上升与过去不同，认识接近实践，可以稳步上升了。基于这种认识及其他方面的某些原因，他对继续讲困难的言论已表现出某种不耐烦的情绪。但直到七千人大会，在形势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基本上保持着比较一致的看法。

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在形势问题上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在北京得出“我们现在处于类似非常时期”(18)的判断，认为在城市里和在工业中“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19)，以及“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时(20)，毛泽东却在中南和西南巡视中，从各大区负责人那里得知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些与毛泽东认识一致的汇报，更坚定了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使他对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不满。

1962年夏，毛泽东的认识成熟了。1962年7月20日，在一次谈话中，他以这样的方式提出了问题：“目前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不难看出，用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别人是难以回答的。因为即使是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的人，也从没有得出过“经济形势是一片黑暗”的结论，更何况夏季以来形势进一步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年初

对困难局面的正确估计。

自 1962 年 8 月起，毛泽东开始系统、正面、大量地阐述有关形势的见解了。8 月 5 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急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功夫，这些问题才能解决。

8 月 9 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发言说，现在有点只许讲缺点、错误、讲困难，不许讲成绩、讲前途。毛泽东显然是为这种观点所打动，他接着说：讲缺点已经一年多了，上面受到压力，缺点错误讲得多了，必然发展到讲成绩就不合法。接着，他又更深一层他讲到了这个问题。

从 1960 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两年了，大家只谈黑暗，不讲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单干。认为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任务不同，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世界观上来。

在这里，他把对形势的估计与单干（包产到户）联系起来，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使在形势问题上的分歧具有了一种特别严重的性质。

在 8 月 11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把在形势问题上的分歧与对“三面红旗”的态度联系起来。他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谈成一片黑暗，有的谈农业恢复要 5 至 8 年。他甚至认为，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反革命、党内的坏人露了头。

在形势认识上的分歧后面，竟然隐藏着这样尖锐的矛盾？中央多数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竟会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为什么毛泽东会对形势认识上的分歧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上，毛泽东素以直言困难和危机，敢于正视困难而著称，向以冷静、准确地判断、估量形势而见长。在民主革命时期，每当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处于临强敌、处劣势、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屡屡表现出人们所熟悉的那种从容镇定、坚韧不拔，藐视困难的统帅风度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多次告诫全党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严重困难和挫折。但是在今天，为什么他对有关困难的客观估计如此不满了呢？是他对困难无动于衷吗？是他失去了正视困难的勇气吗？显然都不是。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对形势的认识在 1961 年底就基本停滞了，对实践的隔膜使他的认识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一矛盾在七千人大会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时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对于“三面红旗”的褒贬来说，对 60 年代初期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判断，实在是一个非常直接、敏感的问题。而“三面红旗”的问题，又与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的社会主义模式息息相关。调整时期，虽然毛泽东已不再像 1958 年那样高度地评价“三面红旗”，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这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能接受超出这一限度的任何做法。再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那种不同于他的形势估计，直接地导致了 1962 年初以来更为彻底、更为全面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中的许多内容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并不畏惧困难。就在 1961 年下半年，面对着国际上的尖

锐斗争和国内的困难形势，他还在几篇诗词中吟咏“乱云飞渡仍从容”和“无限风光在险峰”，歌颂“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梅花，呼唤“金猴奋起千钧棒”。这些雄浑豪迈、壮怀激烈、意境悠远的诗句，反映出毛泽东一贯特有的藐视困难、敢于斗争的气质和精神。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他认为问题主要地并不在于经济中的困难，而在于对于困难的过于严重的估计，以及基于这种估计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既然主要危险和困难来自他所确认的“右倾”，他便像以往一样，以坚定的信心和斗争的豪情向这种“危机”和“困难”宣战了。

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最使毛泽东感到气愤、不安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和社会主义模式转换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是当时被他严厉批判的“单干风”——包产到户。

1958年年底，毛泽东就已发现并提出了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和平均主义问题。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他又多次尖锐地批评了人民公社体制内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为探索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途径，他深入调查，苦苦思索，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他尚未形成自己成熟的意见之前，他对各地为解决这一矛盾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三包一奖、大包干、生产队内社员实行评工记分以至责任田等采取了鼓励起码是允许试验的态度。1961年9月，毛泽东最终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思想后，便认为大跃进以来人民公社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已告完成。因此，他认为，各地在此之前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做法和试验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些在这一探索中出现的带有明显“资本主义倾向”、而在此之前还不便处理的做法，则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批评。如同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一样，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体制富有成效的探索，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于1961年底停止了。

使毛泽东感到不满和不解的是，在他看来形势已经好转以后，在已经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以后，为什么已经被中央几次明令禁止的“包产到户”之类的单干却屡禁不止？在他看来，一些落后农民、富裕中农乃至地主分子在困难时期自发或自觉地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尚可理解，而党内领导层中对这种单干的支持或默认就是难以容忍了。1962年6、7月间，当田家英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谈及经过农村调查，他已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后，毛泽东突然提出了一个田家英所没有料到，但对所有支持包产到户的人最终都无法回避的“尖端”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已经作好充分思想准备的田家英，对于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竟也一时语塞。毛泽东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尽管当时田当即回答是他个人的意见，*但毛泽东对此却早已了然于胸。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表态，但他的不满已溢于言表了。

在这股真正来自中国农民，并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的历史潮流面前，毛泽东没有贸然表态，他在理想与现实、道德标准与生产力标准、前进与倒退之间苦苦地思索着。他的视野早已超出了有关包产到户争论本身，他在思考远比包产到户更为广泛、深刻的问题，终于，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系统地，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7月20日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他劈头就提出：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接着，他回答说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

搞包产到户。这里，他已经很明显地把包产到户等同于资本主义了。他又说：

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觉，如果有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行了，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有希望。*实际上，在此之前，田家英已向刘少奇等几位中央常委汇报过自己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支持，起码是不反对。

这次谈话，实际上已经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给这次会议定下了基调，结束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和尝试。

在8月6日的会议上，他把包产到户的问题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他问道：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既然毛泽东已经把包产到户等同于资本主义，特别是他已经明显地感到这种“单干”行为得到了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或允许，所以，在近两个月的会议过程中，他多次地、多角度地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现在有困难，这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而单干只能造成两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他描绘了一幅由包产到户所引起的农村两极分化的悲惨前景：

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21）

他还谈到了单干的阶级基础：

分田到户首先拥护的是富裕中农，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22）

他又接着问道：

你是站在13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2/3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23）

他对党内支持或允许包产到户的意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60%，留40%，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以上谈的算什么矛盾，我也说不清楚。概括起来，首先要承认阶级，阶级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全部闹单干就是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这个问题要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24）

如前所述，毛泽东多次把对形势的估计与“单干”联系起来，严厉地批评了他的分歧者：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了劲了，怎么办？（25）毛泽东的确敏锐地抓住了对形势的估计和包产到户之

间的深刻联系。他的错误不在于看到这种联系，而在于对这两者性质的误解。

他对当时热心提倡包产到户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邓老，你再不管农业了，你管工业好不好。你那一套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现在搞单干，不能持久，总有一天要搞资本主义大农业。

他批评邓子恢 1953 年搞“四大自由”，1955 年就反对合作化，不赞成社会主义，说邓子恢后几年错误是恢复他那条资本主义道路。他甚至批评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邓子恢没有小集团，这是他的好处，等等。

如果说，八届十中全会就是毛泽东在几年后所说“重提阶级斗争”的起点，那么，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分歧及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尖锐批评，则是他“重提”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生于农村，熟悉农村，热爱农村；热爱农民。建国以后，他迫切地希望尽快改变中国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索。1962 年以前，他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模式已基本形成，但也发生过一些变化。1956 年前后，他初步形成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为：农民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有可能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和阶段，在仍然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基础上，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逐步地、分阶段地但又是停顿地在中国广大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在此基础上，再经过若干时间的努力，通过不断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公有化程度，增加其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份，发展农业机械化，就可以实现农业由集体所有制经济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过渡。反之，如果忽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轻视集体经济的潜力，过于强调稳妥而忽视发展速度，就会挫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导致两极分化，助长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从而严重地破坏我国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迟缓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削弱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经过三大改造的高潮，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可以比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但没有构成这种改造的障碍，反而恰恰是加速改造的天然有利条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的路线和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性具有决定的意义；农村集体化、公有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越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内那些在合作化问题上采取慎重稳妥态度的人，是右倾保守思想的代表者，客观上代表了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就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基本方面来看，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农业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要求，但也存在着忽视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要求过急、方式单一等缺憾。对于毛泽东来说，1956 年前后形成的这一模式，不论是在改造方面的，还是在建设方面的，不论是在工业方面的还是在农业方面的，也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虽然都还只是一些初步的实践，但都反映了他有关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些基本思想。与这一模式相比，1958 年的大跃进模式，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中断的一面。所谓继承的一面，是指它发展了 1956 年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夸大上层建筑、精神意志反作用等方面的内容，所谓中断，是指它中断或部分中断了诸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一些十分重要

的正确原则和思想。

但是，如果因为以上缺憾，而把大跃进中的所有错误都归咎于毛泽东，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在大跃进的全部实践中，有些是毛泽东亲自倡导或发明的，如高速度、不断革命、一大二公、供给制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他的一些深层次的基本思想；有些是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的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又得到他的认可、支持的，如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军事化等等；再有一些是在大跃进的狂热中由群众创造出来的，如“放卫星”、“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对于这一类创造，他下一定赞成，但采取了“允许试验”，“错了就改”的宽容态度，目的是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大跃进中的一些极端、粗陋的做法和形式，虽然都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心理，但有许多却并非出自毛泽东的初衷和本意，起码是没有构成毛泽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大跃进高潮出现后仅几个月，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并着手解决，才能够在调整时期一直特别强调反对诸如共产风、命令主义等各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错误做法。

调整初期，毛泽东所纠正的，不仅有这些并非出自他本意的极端行为，也有一些他自己在跃进期间头脑发热时的做法和设想，如一大二公、公共食堂、供给制、高速度、积极平衡，等等。在政治上，则有给“反右倾”扩大化中的受害者平反（彭德怀等除外），强调发扬党内民主，等等。概而言之，从总体上讲，调整初期，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退”，即从“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向较为务实，比较正确的方向“退”。

但是，这种退却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最突出地表现在，在所有制关系方面，这种退却不能越过1956年三大改造这一“最低限度”；在政治上，则是以不能触动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对彭德怀等少数几位高级领导人的处理为前提。所以，至1961年底，当调整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当毛泽东挥就“调查研究”“队为基础”和“平反错案”等得意之笔，为调整做出重大贡献以后，他实际上已经退到他所能接受的最后限度了。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模式退到三大改造时那种初始的，然而也是更基本的模式上去。不论这几年他的思想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对三大改造的认识可以说是稳定如初的。这正如他在会上发言所说。“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26）

这样，在1961年底前后，当调整的实践顺理成章地由队为基础向前发展到“责任田”、“包产到户”阶段时，也就是说，当实践的发展要求对他心目中最基本的模式加以某些“调整”时，他便再也不能忍受了。在他看来，如果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之间的差别，还只是同一体系内的差别，那么，“队为基础”与“包产到户”之间的关系，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了。如果说对前者的分歧尚属党内认识上的分歧，那么，对后者的分歧则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毛泽东不能容忍在集体化完成以后“单干风”卷土重来，不能容忍“单干”之后两极分化所带来的悲惨后果，不能容忍党内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在事关党和国家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内居然有不少人采取宽容以至支持的态度，这说明了什么？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

庐山会议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

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27)

与庐山会议相比，目前的这场分歧与斗争，在内容上更为深刻，在程度上更为尖锐，就规模来讲，涉及的人更多，面更广。在他看来，这些事实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这一理论还应根据实践加以发展。

七千人大会之后，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毛泽东严重的不安和不快，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翻案风”的甄别平反工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也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

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平反。

给 1959 年反右倾扩大化以来受到错误处分的干部、群众甄别平反，是毛泽东在 1961 年初提出来的。邓小平在主持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过程中，排除了各种阻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七千人大会以后，这项工作以更加广泛、迅速、有力的势头向前发展。

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甄别平反与“三面红旗”的关系过于敏感，所以在不能触动“三面红旗”的前提或框架内，甄别平反工作任何具有实质性的进展都将导致矛盾的激化，而在 1962 年上半年，平反工作的迅速发展实际上已经接近了这一难以避免的结局。这样的结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程度，违背了他的初衷。恰在此时，1962 年 6 月和 8 月，彭德怀给中央的两封申诉信又使矛盾更趋复杂、尖锐。在信中，彭德怀对 1959 年庐山会议，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上对他的批判、指责，据理力争，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错误批判和结论。这件恰好发生在甄别平反工作高潮时的事情更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和不安，平反已使否定“三面红旗”的思想抬头，现在居然连彭德怀这样的人也提出了平反要求，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再这样发展下去，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在会上，他坚决地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28)

对在当时出现了新的气象，但在党内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的知识分子工作，毛泽东表示了实际上不同于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意见。他说：

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29)

会议期间，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了一场并不偶然、积蓄已久{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208_1.bmp}的斗争。这一事件不仅更增加了毛泽东对“翻案风”的不满，而且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给中国的文化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会议期间，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凭着多年的经验和本能，揣摩到毛泽东在近一段时间里思想上发生的变化，摸准了会议的风向，借小说《刘志丹》发难，迫不急待地想要在新一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中争头功，抢头彩。

《刘志丹》是一部歌颂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革命业绩的历史小说。小说正式出版之前，一些原陕北根据地的老干部提出某些不同意见。康生得知此事后，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地报刊不得发表这部小说，蛮横地断定它“就是为高岗翻案”，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

政治倾向性的。”甄别平反工作和彭德怀的信已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康生的发明更使他感到，党内外的翻案风竟已严重若此，发展到要为高岗翻案的地步了。因此，会议对小说《刘志丹》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除对小说进行批判外，还对曾经审阅或支持过这部小说的原陕北老干部、当时担任中央或地方领导工作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判定为力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会议还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等进行审查。

会间，在批判小说《刘志丹》时，康生写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内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表示同意。他还由此出发得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求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0)

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所涉及的，不仅是加深了对“翻案风”的危机感，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误解、怀疑进一步加深。

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主要是通过“三风”的批判，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对调整以来，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之后调整深入发展以来党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与此同时，一种有别于1956年和1958年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发展战略也在他的思想中初步形成，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全党所接受。有关这一模式特征的论述，除了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外，还比较集中地见之于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

这种模式在经济建设问题上，采取了比较谨慎、务实的态度。它不再强调大跃进式的高速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比较牢固地确立了农轻重发展的正确比例关系。在生产关系和生产管理方面，放弃了以往急于求成、一大二公的空想。尽管对生产关系变革速度和时间的估计仍然不足，仍有一些夸大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倾向，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原理还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通过《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规章、条例具体体现和确定下来。《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高教60条》等等一系列涉及面广、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条例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这一模式最突出的是它的政治方面，这些内容集中地表现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之中，并以比较系统的方式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表达出来：

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尸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

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31)

《公报》中这一段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文字，与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一些重要论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这些论断的内容及其在1962年以后所起的作用来看，把它称作“基本路线”是贴切的，尽管它的内容是错误的。

八届十中全会所确立的这条路线，一方面反映了调整时期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突出地反映在经济关系、经济政策的调整方面。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随着调整的深入，一些深层矛盾的暴露或激化，一种错误的倾向随之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它又一次严重而又极端简单地把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一重大问题，提到全党面前，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就是“重提阶级斗争”。

自从“大跃进”受挫以来，党内许多同志逐渐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在此之前，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和绝大部分群众都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自1958年冬以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困惑了，不少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调整开始以后，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后，随着调整的发展，这种思考也不断深入，并已开始触及到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些深层的基本的问题了。这种深入的实践和思考，与一些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理论、框架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不论当时人们是否意识到，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正是在于解决这一冲突。会议以某种程度上的妥协——肯定和发扬经济调整中的某些成果以及否定或停顿政治领域中的调整——而告结束。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接受了调整以来经济领域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而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据当时毛泽东身边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在十中全会最后一天的全体大会上，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单干风”的批评，以毛泽东的调子最为温和，别人反而比他严厉些。参加会议的从中央到省市的主要负责人，都信服毛提出的意见和理论，为他的理论所掌握，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是真诚的。(32)

就毛泽东个人来说，八届十中全会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思想，是他1957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混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把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延伸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

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有关重要论断，断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而那时所估计的过渡时期为十几年。八届十中全会则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延伸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这个时期需要

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显然，把过渡时期作这样的延长，有助于突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有助于使那些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就“大吃一惊”的人猛醒过来。1958年，当毛泽东十分乐观地预言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在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巨大胜利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跃进；1962年，当他严峻地指出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时期需要几百年的时候，他的依据是激烈而长期的阶级斗争。

第二，对阶级斗争形势更为严重的估计。

与1957年、1959年的扩大化不同，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升级的原因在于对“三股风”的错误认识，以及对困难时期一些消极因素过于严重的估计。这些原因涉及到一些更深层次的矛盾，波及到党内更多的人，加之当时的确存在着阶级斗争现象有所增加的问题，且又有1957年、1959年的历史经验，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和党内一些人对阶级斗争形势更为严重的估计。也是因为这些原因，使得党内原来持有异议的人也很难对这一种估计提出不同意见。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毛泽东提出“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举座为之震惊、动容，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上所说各方面的复杂因素，人们又会感到，他提出的问题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内阶级斗争的理论。

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就其主要方面看，在于对党内分歧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因此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在此后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观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33)这一观点也直接地反映到了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之中。在1958年初批判“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时，毛泽东都曾把分歧的另一方称作右倾，而这一次他却把“右倾”直接等同于“修正主义”。这一改变不仅使“右倾”具有更为严重的性质，而且使它与当时国际上的斗争也联系起来。这一观点提出和确立以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诚恳地、迫切地要求发扬党内民主，而此论一出，实际上使他的良好愿望再一次落空。

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结束了自1961年以来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来调整的良好势头。调整第一阶段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有的得到肯定并保存下来，但以后却再没有什么发展，例如《农业六十条》等；有的却被当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遭到批判，如“包产到户”及政治领域里的某些调整。根据十中全会的精神，1962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同年11月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同年12月11日，中央批转了安徽省改正“责任田”情况的报告。此外，1962年上半年在统一战线、民族工作、侨务工作等方面的调整措施方针也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

以八届十中全会为标志，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与以后几年相比，特别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其区别还是明显的。例如，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的提法，断言阶级斗争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十中全会期间，他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严重性的估计又有重大升级，奇怪的是，他却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论及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问题。这是由于他的疏忽，还是出于当时调整工作全局的某种考虑？更值得注意的是，9月24日，他在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这次传达十中全会的精神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要与阶级斗争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

他还要求，对于彭德怀、习仲勋的问题，应通过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弄清楚，不要因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

阶级斗争已经那么严重，但与经济工作相比，还不能放在第一位，不能放在很突出的地位，至多是与经济工作平行，这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抓革命、促生产”那种独尊的地位。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是他接受了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的教训的结果，同时，这也表明，他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尽管又有所发展，但仍未达到“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程度。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了。一种新的、与1958年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发展战略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基本形成了。他坚信自己探索的正确性，他认为，今后的任务，就是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十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和方针。他赋予阶级斗争以至尊的地位和神奇的力量，而这样的阶级斗争却使他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真诚而执著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地失去了自由。

第五章 对一个老问题的新答案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初具规模，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形成并立即付诸实践，它首先面临的问题，一是三年困难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一是在调整时期所新产生的。

根据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1962年冬至1963年春，湖南、河北等地利用冬闲季节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或整风整社，与此同时，在少数城市基层逐步开展了“五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后，从1963年上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部分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

历时三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和任务经历了一个由宽泛到集中、由浅入深、由下及上的转变，在运动的准备和初始阶段，其矛头指向了当时社会上几乎一切消极、阴暗面：总是企图复辟、篡夺领导权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商业上的投机倒把，农村中的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以及宗教迷信活动，在机关和集体经济中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运动的发展，尽管其他问题依然存在并被认为是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有所扩大，有一个问题却被逐渐地突出出来甚至成为整个运动的主题，这就是领导权问题，或曰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或曰走资派问题，更宽泛一点他讲，就是干部问题，等等。不论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以什么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它都涉及到当代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引起过长期争议的问题：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怎样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与被领导、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公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一 一个老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详尽地分析了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的特征和弊端。他们指出，最能体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僚和常备军。这两种机构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应当是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而且有可能铲除和避免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些弊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兼管法和行政的工作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消灭官僚国家、官僚机构存在的条件，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其性质及其所采取的方法，不存在官僚机构复活或官僚化的问题。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同的。在《国家与革命》中，他曾写道：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出来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官吏也还会存在，官僚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改变了看法。1920年，他开始承认：“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

1921年4月，列宁比较系统地说到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

在1918年5月5日，官僚主义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十月革命才过了半年，我们自上而下地摧毁旧官僚机构才过了半年，我们还没有感觉到这个祸害。

又过了一年。在1919年3月6日至23日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说，“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又过了两年，1921年春，即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1920年12月）官僚主义问题以后，在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极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我们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列宁还进一步分析了苏维埃制度中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在于“小生产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作。”

到1923年，列宁对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现象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他又说：

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已经空忙了5年，但只不过是空忙而已，5年来已经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

他还坦率地承认：

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

为了同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清除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官僚主义，列宁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但终因为去世过早，他未能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些他所深恶痛绝的、

事关社会主义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未来社会主义的领导人。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军事大国。但是，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官僚主义也日甚一日地发展起来，暴露出来，斯大林离开这个舞台时，留给人们更多的不是与官僚现象斗争的成果与经验，而是官僚主义的突出弊端，以及围绕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而在斯大林时代之后，理论界激烈争论的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官僚、官僚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能不能消灭或遏制官僚主义等一类的问题了。

二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问题了。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考虑过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是否会重蹈旧政权覆辙，因新一轮的官僚化而变质的问题。

1945年7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和其他5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毛泽东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和谈赴延安访问。几天访问之后，毛泽东邀黄炎培等到他家里作客。谈话中，毛问黄，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但城直言：

“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听罢，毛泽东高兴地、胸有成竹地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要求全党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言论，虽然还谈不上具体和系统，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他的这些言论所表露出来的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共产党变质，克服官僚化倾向的迫切愿望和坚定信心。

建国以后，出于对执政党和人民政权建设更自觉、更迫切的考虑，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克服和清除党内、政府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现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颁布和发出过大量的指示和号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

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遵照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级党的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风。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华北局《关于逮捕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向中央的报告》。他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省市区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运动。

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

1953年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他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展开了“新三反”运动。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党要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他向全党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即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当时，他把官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11)

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高度，分析了官僚主义问题。他指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12)他甚至认为，当时在工人学生中发生的一些“闹事”事件和社员“闹社”事件，其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13)

同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革命胜利后,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使革命意志衰退的人;重新振作起来。(14)

同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强调说,我们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提醒全党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他指出,在战时,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而在平时,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就难于原谅了。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15)

同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适应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4月30日,毛泽东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讲明整风的意义,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建国以来历次整风运动经验的总结,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同时也是根据当时党内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领导发动的。但由于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同时也由于这类运动几乎没有触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内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次运动的结果,实际上远离了发动者的初衷。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对用整风这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充满了信心。他说,对共产党来说,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所以过了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16)

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和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后盾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更是使人难于识别、批评和抵制。1958年大跃进得以发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凭借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膨胀起来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从“大跃进”中那些令人惊愕的指标、那些狂热的场面,荒诞的口号及惨重的损失后面,不难看到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等泛滥的鲜明烙印,不难看到党内民主生活的萎缩与倒退。在大跃进结束时使人感到严重不安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还有党群、干群关系的败坏和党内民主生活的缺乏。

美国学者迈斯纳认为,“大跃进运动的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具有深刻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它“限制了官僚主义者的活动,缓和了官僚权力与社会相分裂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进程。”(17)这里,迈斯纳显然是被大跃进群众运动的表象及限制、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之类的口号或措施所吸引了。他没有看到在大跃进中目的与方法、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理论与实践的巨大矛盾,没有看到在运动中强迫命令的成份多于自发和自愿,盲目多于自觉,政治上

的压力更多于经济上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他也就难于准确地判断在大跃进以后的年代里一些矛盾的性质和由来。

三 大跃进的一个后果

六十年代初，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及大跃进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大量地以尖锐的形式出现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尖锐地指出：

“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18)他又说：“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19)

对于当时党内的不正常风气，刘少奇说：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他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在一些工作做得越不好，问题越多、缺点和错误越严重的地方，那种不对党说真话的现象就越加厉害。”(20)

在会上，刘少奇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概括：

“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党内生活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现象的主要表现是：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提出不同的意见，把敢于提意见的人，随便说成是有思想问题，甚至指为‘反党分子’。

有些党组织，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工作问题和政策问题，不容许党员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批评党组织领导人员的缺点。有些党组织，甚至把党员对具体工作的具体意见，错误他说成是政治问题和路线问题，把党员对党组织领导人员的批评，错误他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

有些党组织，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办法，斗争和过重地处分了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斗争和处分了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

有些党组织，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党员，进行打击报复。

有些党组织，不按照党章的规定，随意吸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党，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

有些党组织，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竟然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审判和惩罚了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党员，甚至审判和惩罚了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员。

由于有些党组织犯了党内过火斗争的错误，就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损害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话，不敢提不同意见，互相戒备，造成隔阂，心情很不舒畅。

……这几年来，一些党组织在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却把这些正确的原则置之脑后，犯了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类似的错误。……这种党内过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些领导机关在一段时间内坚持一些政策性的错误，引起了是非不明的混乱现象。”(21)

这种过火斗争有时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有的单位还自己搞拘留。搞劳改，

这是非法的，不允许的。此外，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22)

至于这些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总结说：

“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23)

邓小平也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必须指出，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24)

他又说：

“……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25)

他进一步尖锐指出：

“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当然，造成严重缺陷的原因有多种。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另外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行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26)

陈云、周恩来对此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27)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如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28)

邓子恢在1962年7月一次报告中也说到：

“现在有些干部不是党与群众的桥梁，而是党与群众的障碍，他把路堵死了，使党与群众之间有一条大鸿沟，群众对干部不敢说真话，干部脱离群众，可以说大部分干部不与群众联系。”(29)

党内外存在着的这些严重问题，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和强烈反应。他对这些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在许多方面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是一致的。

例如，他也承认，庐山会议传达到基层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犯了错误，把讲老实话的好人也整了。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现在要平反。(30)

在一次会上，他气愤地说道，纠正五风的困难和阻力，在于我们各级干部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所以，他要求要用退赔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党员，不教育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应该督促地、县教育公社干部，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31)

他仍然希望用整风的方法来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他说，总而言之，现

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要大规模地教育干部，要全心全意地教育干部，教育的方法就是整风，用延安整风的方法教育干部。他希望全党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是不行的，要教育干部，没有长期打算是不行的。(32)

至于整风教材，他也曾多次说到，就是《六十条》和有关手工业、商业的几个条例，理论上的材料，就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 1961 年上半年进行的整风整社运动中，他对教育干部、整顿作风表示了很大的决心。他说，这一次决定不分一、二、三类社普遍整，在劫难逃，欠债要还，应该坚决彻底。现在干部中有种风气，有些干部摸到一个规律，认为整风几个月就过去，一过去就平安无事。要学韩文公祭鳄鱼文驱鳄鱼的办法，三日不行则五日，五日不行则七日，一直祭下去，总之要赶走，我们一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我就整你，一直整下去。(33)

1961 年 9 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要求，在 1961 年和 1962 年冬春六个月中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他认定，只要搞好这些工作，主动权就更大了。他深情地、满怀希望地指出，干部教育好，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六十年代初期在党风、干部作风等方面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涉及的面较广，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论学术界曾经对官僚主义作出过多么宽泛和一般的解释，它都难以概括当时所出现的那些问题，但是，也应看到，不论这些问题如何复杂、多样，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都十分关注的、在当代国际共运史上曾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人民与公仆的关系问题。而就问题这一最本质的方面来看，官僚主义显然是一个概括程度较高，涉及范围较广的范畴。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的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浮夸风、捆人打人之类的问题，虽然都早已超出了官僚主义的范围，更劣于官僚主义但又无不与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相比，毛泽东当时有关党风、干部作风的言论，较少涉及诸如说假话，贪污盗窃等一些具体问题，而较多地着眼于一些更加概括的内容，例如官僚主义、不懂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等，甚至把一些内容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的诸多研究者中，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不同，有一点却是他们一致公认的，这就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以及他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巨大作用的高度评价。正是由于这一基本品格，毛泽东对于高居于人民之上，不相信群众、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欺压群众的行为特别敏感和厌恶。三年困难时期，当他冷静地思考大跃进的教训及后果时，他的着眼点除了阶级斗争以外，也较多地放在了干部作风和干部素质方面。他认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应当对大跃进的失误以及五风等的泛滥承担很大的责任。他甚至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强烈的情绪，这就是“死官僚主义分子”。

1961 年 1 月，在一次谈话中，他曾以询问的口吻提出：死官僚主义分子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他说道，这几年中央对下面的情况不摸底，而其原因就在于死官僚封锁了消息，所以中央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至同年 6 月，他的提法和态度更明确了。他说：

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下不听群众，上不听中央，只听他自己。对于这样的人，只好调动一下工作。

同时，他也表示，死官僚也可能变成活官僚，不官僚，变成共产党，我们还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但对那些经再三教育坚决抵抗的死官僚主义分子，也要处罚。

在反思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另一个、也是更为明显的区别，是毛泽东特别着意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观察、提出和分析问题。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在谈到这几年发生问题的原因时，提到了三种人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种人分别是地主阶级和反革命、死官僚主义者以及糊涂人。在这三种人中，他对第一种人尤为警惕，他说，这几年在农村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到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他并进一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凡是三类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

两个月后，他又发展了这个观点。他提出，民主革命基本成功，但尚未成功，还有20%的地方应重新夺取领导权。他认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整社，使许多地方的领导权夺回来了，这些是阶级斗争，但还有些地方地主资本家在当权。

尽管毛泽东有偏重于从阶级斗争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倾向，但是，总的说来，在1962年上半年、特别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相对来说，他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还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发展时期。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虽然也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一些消极现象，但他同时也考虑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报来的材料对他最终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例如，1960年底，河南省报来的有关信阳地区的报告就曾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影响。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三类县、社、队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他进一步推论说，全国县、社、队有30%是好的，50%是一般的，20%是坏的，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20%，有不到20%。

不久，1961年4月，他又根据湖南的一份材料得出结论：去年10月至今，整个半年，五风没有普遍整顿，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里夺过来，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同年5月，在中央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上，他又将此材料批发与会同志，并指出：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当，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已经开始与他有关“死官僚主义分子”的思想初步结合起来了。他认为，死官僚实际上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他的根据是，因为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是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34)

1961年年底，他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在一次谈话中，他说道：

我总说，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两类反革命分子的直接同盟军，而糊里糊涂的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它没有这三部分人作同盟军搞不起来。它利用死官僚主义的那种行为，利用许多人糊里糊涂，它那个事情才办得成。

尽管做了这样的联系，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分子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客

观的。他严厉、尖锐地批评了“死官僚主义分子”，但在谈到他们是反革命的同盟军时，他主要是从实际作用和客观效果的角度来说的。对于犯了此类错误的干部，他更侧重于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1961年底之前，总的来说，他所说的教育干部、整风整社等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五风的，是反对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的。关于这一点，1961年6月毛泽东的一段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搞出一套具体政策来，这就可以教育干部，干部是要重新教育的，因为这一场革命是新的革命，不重新教育是不行的，有了正确的总路线，又有正确的具体路线，而且反复他讲，最后看是平均主义见效，还是我们的总路线见效。

对于大跃进之后党风、干部作风方面滋长、发展起来的严重问题，党中央不仅作出了比较中肯的分析，而且早就着手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对全局把握上的曲折，这一过程也随之变化起伏。

1958年之后，党中央在农村领导了时断时续的整风整社运动。运动最初以退赔平调风、共产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主，同时整顿干部作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整风整社运动又加进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阶级斗争扩大化再次膨胀。与此同时，在整风运动的算账还账中，还在农村基层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60年间，清查基层干部中的官僚主义成为中央和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之一。根据对各地经验的总结，当时把官僚主义概括为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蹲在机关多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等等。但自1960年下半年起，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一些开展整风整社的地方已经比较尖锐地提出了干部的组织不纯问题，认定在农村基层政权中，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坏分子，并且认为正是由于组织不纯，有的队才成了穷队。这种看法显然是掩盖了问题的真正原因，把总结经验引上了歧途。但由于当时注意的中心仍然是纠正经济上的平调风、所有制上的急于过渡等问题，对基层干部问题上的“左”的倾向并不普遍。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紧急指示信，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文件中对基层组织责备过多，特别是把地富反坏分子与干部作风问题扯在一起，必然导致混淆两类矛盾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由于这些思想的指导，1961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左”的倾向又有所发展。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对基层存在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例如，某县的一个材料说：

全县所有的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有的公社轻一点，有的公社重一点，只是比较而言。由于干部作风不好，党群关系恶化，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增加，坏了一批干部，毁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党的政策贯彻不下去，并给唯恐天下不乱的分子造成了机会。他们从中混水摸鱼，贪污搞鬼，有些好干部也被拉下了水，有的整个基层组织都给烂掉了。(35)

还有一个地区的材料反映说：

凡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揭发的问题比原来了解的严重得多，而且越揭发越严重，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中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也都很严重。三类社队占70—80%，敌人打进来、拉出去的材料大量增加，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集团

和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一天多于一天，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十分突出。(36)

基于这样一种严重的估休，整风整社运动的扩大化倾向日益严重。一些地方不但认为三类社的比例占得很大，而且进一步认为三类社的领导权和党组织不在我们手里，因而提出了要“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一切权力归社员代表会”。有的地方提出“民主革命补课”、“夺回五权”（党权、政权、兵权、财权、吃饭权），以及“巩固地确立贫农、雇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等口号，有的地方提出，整风整社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对于三类社队要派工作组或工作队去领导运动，甚至把土改时的办法也搬了出来，提出要“扎正恨子，培养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这些做法和经验，成为1963年后社教运动的先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扩大化的做法和倾向都出现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出现在系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产生之前，所以，尽管它曾一度在一些地区蔓延，却也不难控制和纠正。1961年上半年，当这些扩大化的做法在农村中引起了混乱时，中央也及时地发现了问题。在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总结了前一阶段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对运动作了一些新的调整，纠正了一些偏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强调的侧重点仍然是反左。中央规定，“不要预先划分社队的类别和干部的类别”，“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37)之后，党中央又承认在1960年冬和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有排错队、错划成份、干部处分面过宽的失误；承认在一部分被整顿的三类社队中，把有些五风泛滥造成严重损失的，也当成民主革命不彻底来处理，以至把一些本质好而只是思想作风有毛病的干部，也当成阶级敌人或坏分子来斗争，混淆了两类矛盾的性质，造成了阶级阵营的混乱，大大挫伤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认识到彻底改变干部作风是一个相当长的、复杂的过程、不是短期突击可以解决的问题。

1962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速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加速对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实际上进一步承认和纠正了前一阶段整风整社运动中的扩大化倾向。这些纠“左”措施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形势，在相当的程度上端正了纠正大跃进以来党风、干部作风工作的方向。

从1958年冬开始至1962年上半年，内容和侧重点不断有所变化的整风整社运动，虽然一度已经带上了明显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色彩，但因比较系统的扩大化理论尚未形成，所以旋即便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总的来说，运动还是达到了整顿基层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改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目的，比较有效地改善了党风和干部作风，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四 新思路与新方法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情况大不相同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根源还是那些根源，但指导思想不同了。人们开始习惯于在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内来认识困难时期出现的一些难以避免的消极问题和阴暗面，以及由于这个框架自身所必然带来的新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黑暗风、翻案风、单于风，等等。

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这样一种思维框架内，加之当时国际上一些因素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多的阶级斗争被发现出来，越来越激烈的斗争方式应运而生，越来越系统、尖锐，严重的阶级斗争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这是一种奇怪的社会—思维结构。虽然它在理论上的失误并不难于识别，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却有着一种强大的自我膨胀的机制和功能。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的正常要求，都可以成为刺激它发展、升级的条件；它耗费着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却使整个社会不断失去生机与活力；它几乎使社会上的一切分歧、矛盾和差别都带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使下至邻里纠纷上至决策分歧都具有了阶级斗争的性质，失去了依靠正常途径和机制解决的可能，从而使社会从上至下不断积累着无数的“死结”；人们越是习惯于用这种理论观察和处理事物，也就越能发现越来越多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阶级斗争“事实”。

从1963年起，当人们开始用八届十中全会的理论来观察、思考问题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再一次升级。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到上层、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和从政治文化思想，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迹象，到处都是阶级斗争的战场。

但是，不管阶级斗争的局面如何纷繁复杂、广泛尖锐，毛泽东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几个基本的问题上。党的问题、干部问题、党内领导干部的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尽管1963年后四清、五反等运动的面铺得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但运动在外围没有停留多久，很快就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归结到了毛泽东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干部问题。于是领导班子问题、党风干部作风问题等处处都被当作突出的重点。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类问题的地位不断上升，以至最终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概念，并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

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1962年冬至1963年春，湖南、河北等一些地区，利用冬闲季节在农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或整风整社。

河北省保定地区，在整风整社中发现社员对社队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因而领导群众开展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为与以后的“四清”运动相区别，此时的四清又被称作是“小四清”），因为“小四清”的内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时在另外一些地区，也不约而同地搞了一些大同小异的“三清”、“五清”、“六清”运动。

对于研究者来说，作为以后大四清的发端，小四清的提出及其内容是很值得注意的，就小四清的内容看，它所涉及的全是经济问题，而就问题所涉及的对象看，则主要出在干部方面。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群众当时迫切要

求解决经营管理的落后与混乱，以及干部利用特权侵占群众经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它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当时干群关系中某些不正常状态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小四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群众自发的、普遍的要求，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农村中的实际情况。如前所述，整风整社运动几经反复，至1962年上半年时又趋于比较正常的发展。1962年冬至1963年春，这一运动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尚未带有明显的扩大化色彩时，还是比较直接、真实地反映出群众的某些迫切要求和一定的客观需要。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不约而同地开展了“三清”、“五清”，“六清”等运动，恰好反映了这种要求、这些问题的普遍性。

小四清中并没有“清政治”的内容，这显然不能用群众和基层干部缺乏政治觉悟来解释。这一方面说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贯彻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广大农民群众从其自身的经验和实践出发，不需要也不可能从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样的高度来看待自己身边的腐败现象，尽管它们确实很严重。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需要把他进一步发展了的有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付诸实践，指导现实。他在寻找着从理论到实践，从决策到行动的具体途径和中介。一方面，新的理论已经确立并开始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与以后几年相比，他此时的思想又还带着1960年以来调整初期时的不少观点和认识。1963年1、2月间，在一些谈话和会议发言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处于深刻发展变化中的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一些明显特点和矛盾。

在这些谈话中，他首先突出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他指出，阶级斗争还存在，原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存在，修正主义在各地都有。过去国民党统治时，国民党中有共产党，现在我们党里有国民党，这不足为奇，是一种自然现象。解决这个问题要很长时间，要几十年，几百年。关于阶级斗争的内容，他当时列举的有肃反、反修，还包括反官僚主义、反五风等。(38)

这样的概括显然比较笼统，但却反映出一种鲜明的倾向，即他希望以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反对从反革命到五风等一切他所憎恶和反对的现象，基本的框架已经有了，具体的内容和对象尚未精确地分化。确定下来，这是新的理论体系常有的现象。

他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好抓一抓，对于部和群众来说，这个东西，一抓就灵。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他这时的理解和设想也是很宽泛的。这时，他首先强调的是有关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生活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有关用《六十条》教育干部和群众的内容。但他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内部的反对修正主义，要把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分子一齐扫一下。他确信，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团结90%以上的人，是可以把牛鬼蛇神打下去的。

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中肯地指出，在农村中，大多数干部，包括生产队长，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这主要怪我们没有去教育，没有教材，没有好的方法。所以，他认为要有计划地培训干部。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培训的内容和教材方面，他认为除了原来规定的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生活方面的内容外，还应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

对社会主义教育内容这种宽泛甚至矛盾的表述，反映出当时毛泽东认识上的两重性。一方面，用《六十条》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社会主义，

反对五风，说明 1960 年以来纠左的势头犹存。另一方面，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内部反修、打牛鬼蛇神，则表明扩大化的波涛已由远而近，声浪日高。

八届十中全会及会后毛泽东认识上的这些发展，再一次拉大了他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及许多地方领导同志认识上的差距，1963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彭真就曾谈到，大家感到从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的思想，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北戴河会议后，大家认识不一致，至少是认识深浅不同，所以大家要求每两三个月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也因为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未能得到及时、有力的全面贯彻而产生一种先行者的孤独感。1963 年 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回顾自己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在一些省、市视察的经历时，对多数地区仍未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放在突出地位表示不满。他不无批评地说，我跑了这么多省，只有河北和湖南两位负责同志突出他讲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当时也确有一些下边的“先进单位”，他们对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吃得透、跟得紧、行动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出了一批体现甚至发展全会精神典型经验的。

1963 年初，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各地先后向中央写了报告，反映本地阶级斗争的状况。某省的报告中描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面：

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很快销声匿迹。

另一个省委的报告中说：

在 90 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揭发出许多阶级斗争情况。投机倒把活动有 10 万起，“千字号”的上万，“万字号”的上千；反革命集团活动有 1300 多起，地富反攻倒算有 26000 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有 8000 起，巫婆神汉、阴阳先生有 5 万多人；特别严重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带头参加了封建迷信活动。

应当说，这些材料的确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消极现象，但这些现象也的确是放在新确立的扩大化框架里加工，放大过了的，曲意迎合、无限上纲等特征随处可见。例如，当时中央批转的某省的一个材料中表明，一些地方把宗教迷信活动当成反革命会道门活动，把落后群众结拜兄弟当成反革命活动，把困难时期群众因生活无着集体到田间偷摸当成盗窃集团，等等，严重混淆了问题的性质；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指标，把已经处理过的老问题说成是当前的新问题；一些领导迫于政治压力，怕被说成是右倾而杜撰捏造，有的则是道听途说，猜测估计，如此等等。

但是，那些显然是被夸大的材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 1963 年 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他的推荐，会议印发了几个省委关于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多次引用了这些报告的内容和结论，督促全国各地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农村社教运动不论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在迅速发展。后进的要努力赶上先进，先进的要更加先进。许多省、市先后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训练干部，开展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并根据试点中揭发出

来的问题陆续向中央写了报告。在这些报告中，客观的报道、冷静的分析已不多见，慎重的政策规定不仅少见而且缺乏可操作性。一种争相报告本地区阶级斗争严重、阶级敌人猖狂，以及“一抓就灵”的攀比之风在滋长、蔓延。

五 两个“十条”

1963年5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彭真、柯庆施、陶铸、李井泉、江华等大区及省委负责人开会。会议议题是研究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社教的统一指导性文件，统一规划和部署全国的社教，批发一批有关农村社教的文件，几天后，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胡耀邦、陈伯达等也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后期的会议，刘少奇因在国外访问而未能与会。

5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同与会者谈了四次话，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根据他的讲话精神，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作为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反映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思考，在他的思想中所形成的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有关社教运动的一些更为成熟、系统的认识，而在这些认识的深处，又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主义事业中一些基本的、普遍的问题的看法。

在会议初期的讲话中，他回顾了十中全会以来全国社教运动的发展情况，对运动现状和许多省的领导方法表示不满。他批评说：

河南去年10月到今年2月，5个月没有抓社会主义教育。我去了11个省，只有XX、XX滔滔不绝对我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省就不讲。三干会也开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

使他感到欣慰的是，2月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省、地、县三级是否都抓住了，还是一个问题。他指出，试点很要紧，要求各地都要试点，希望通过试点，使省、地、县三级对十中全会公报有个真正的了解。

谈话中，当有人提出在运动中抓不住要点时，他对此的回答是：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包括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五反、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要点未免过于宽泛，但他的基本思想还是明了的，这就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统摄一切，贯穿一切，其中也包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干部参加劳动这样的内容。概念和表述上的宽泛、矛盾并没有妨碍中心思想的突出和鲜明。这一特点在他的发言中还时有所见。

关于四清运动的内容、对象及方法，他的看法是，四清就是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他又说，四清主要又是清帐、清工分，至于四清的方法，他提出，就是要用现在的这种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使多数人有敌情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他反复强调要发动群众，指出大贪污分子要发动群众才能搞出来。

在这里，他把四清的内容讲得很具体。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内容也使人难于把握和实施。如果考虑到困难时期一些群众在饥饿的驱使下所发生的一些小偷小摸行为，一些干部因管理混乱和没有监督的特权所发生的贪污，以及在农村经济有所好转时商业活动的活跃和农民买卖活动的增加往往被当成投机倒把，而所有这些现象在当时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表现时，我们就会感到，在这里，敌我矛盾的界限是模糊不清、游移不定、难于准确把握和具体操作的。事实上，毛泽东对此也有所感觉，所以，在谈到运动的方法时，他又强调了对多数人只是洗手洗澡、轻装上阵。

在这里，他所列举的敌情、所强调的运动性质与他所说的运动方法之间

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协调。分析这种不协调，我们起码可以确认：第一，毛泽东显然夸大了阶级斗争存在的范围和现象，在他列举的那些问题中，有许多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第二，他深信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有利于解决社会上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即使是那些从政治上看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从思想上看还是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所以阶级斗争的方法仍然是适用的。

在谈到进行四清的方法时，他肯定了一些地方的试点经验。他说，生产队搞四清，就是要发动贫下中农，搞扎根串联这一套。可能是由于他特别着眼于四清的阶级斗争性质，所以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一些做法对于四清照样是适用的。

在5月7日的会议上，他在发言时提出，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50%—70%，但只有组织起来了，才有中心。他设问道：依靠谁，总得有个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他认为，1961年搞60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依靠谁的问题。言下之意，现在提出和确认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进步。他批评了当时在农村干部中流行的一句话：地主听话，中农好办，贫农糊涂。他说，我看一万年以后，还是有个依靠问题，因为还有先进和落后，总有左、中、右，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这里，毛泽东忽视了一个问题，即贫下中农、富农、地主等等这些在上改时期、根据土改以前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划定的阶级成分，在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之后，是否还能成为划分政治派别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在绝大多数农民都已成为人民公社社员的情况下，贫下中农、富裕中农之类的划分的着眼点强调的是成份、出身，还是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和表现？是回归以往以过去规定现在，还是以现实力依据借鉴以往？是以生产方式、经济地位为依据，还是以思想、意志为依据？毛泽东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依靠贫下中农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即相信群众，特别是相信基本群众。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他确定了并继续规划着社教、四清运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例如，在5月的会议上，他就明确表示：

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地、县、社的广大干部，要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要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的这些话，谈的主要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而从实质上看，这些话实际上同时涉及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如何对待干部，如何看待和解决干群关系的问题。不管毛泽东的认识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这一基本思想始终未变。不论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党内发生了什么，干群关系发生了什么，都应当而且可以依靠群众来解决。而且，问题越严重，越需要广泛、直接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当人们着手解决官僚主义的弊端时，依靠党政系统的各级组织和各种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地在既定秩序范围内进行工作已成为人们不假思索的选择。而毛泽东此时已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这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这些话和这些思想，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但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正是这一新的思路，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分歧。

5月杭州会议期间，尽管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但在主观上，他仍然警惕着运动可能产生的扩大化后果。他不希望看到运动可能对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产生的冲击，不愿看到运动伤人太多，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扩大化倾向，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并提出了一些防范措施。

会议期间，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他又几次谈到，在运动中不要伤人，要伤只能伤少数人，5%—6%也多了，最后还要缩小。根据他的估计，这次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1%。对于有错误的干部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针对当时运动中的一些急躁情绪，他在讲话中一再泼了冷水。他说，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内解决，恐怕有困难。所以，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它一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对于一些在运动中已经“落后”的省分，他主张不要责备。原因是，你一批评他就要搞急了，就不好。

为了防止运动中再出乱子，他在会上要求，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为此，他要求事先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动。他要求各地，要讲清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一力争上游，就会一轰而起。会上，当有人说运动主要是怕走过场时，他当即说道：那有什么要紧，走过场再搞嘛，就怕伤人。他指出，压力是要一点的，但压力太大不行。他要求对于95%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他估计到，乱子是要出一些的，但只要 we 分期分批，经过试验，认真对待，不要一轰而起，是可以避免的。

在运动中，如何处理阶级斗争与生产的关系，这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问题。会议中，当有人说到有的省只提生产不提阶级斗争时，毛泽东谈了当时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生产也要搞，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这些言论表明，尽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已开始发展，但在1963年5月制订“前十条”时，毛泽东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要求运动不要太急，不要出乱子，不要伤人太多，运动要有利于生产，要注意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等等。这些观点与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观点相比，虽然也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话及有关批示中还突出地谈到了一个他认为与四清同等重要的问题——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这些言论及一些经典性的批示，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他对当时的运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干群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政府建设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

会议之前，1963年2月，毛泽东就曾对山西省昔阳县有关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材料表示了由衷的赞赏。他说，参加劳动问题，昔阳材料很好，县级干部每年劳动至少60天，他希望每个省都要搞一批干部参加劳动。

会议期间，5月9日，毛泽东又为浙江省七个有关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一段重要批语。在批语中，他肯定了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建议将这些材料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阅读，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他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的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要有自己的好范例。他写道：

“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39)

接着，他有一段相当经典的论述。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他接着写道：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 and 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哲学上看，都具有经典的意义，成为以后十多年里中国经济、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这段批语中，除了他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对社教运动性质的规定，以及对运动主要内容相互关系的论述外，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他对于部参加劳动的高度评价。

这是一个集中反映毛泽东哲学思维和政治思维特点的结论。重视实践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当然，在这里，他所关注的重点还是在这些哲学原理的政治意义方面。他所强调的是，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途径，积极地投身到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去，对于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深远意义。

不难想象，马克思当年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有关社会主人与社会公仆的论述，列宁十月革命后遏制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尝试，都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后，为解决这一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过多次探索。他根据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出于对一种平等的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通过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

训和国际共运中的有关经验，在社教运动中，他认为已经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清除官僚主义，使社会公仆永远名副其实的成功经验。

让脑力劳动者、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解放区，在建国初期及在大跃进中，毛泽东都多次发出过类似的号召。这一思想既凝聚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华，又反映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政治本色；既包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又体现了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毛泽东以突出的地位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除了有利于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这些共同的、一般的意义外，又赋予它某些具体的、特殊的意义。例如，可以使干部更直接地了解下情，特别是阶级斗争的下情，从而更好地指导运动。又例如，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教育干部，使干部得到群众直接有效的监督，减少以至消灭多吃多占、贪污等四不清之类的问题。再例如，有利于农村社教中的整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反之，如果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不劳动了，就慢慢地变为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了基础。他希望党支部要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总而言之，毛泽东希望和相信，干部参加劳动，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干部脱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四清所要解决的少数几个重要问题之一。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毛泽东把这场“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复地强调着运动的“教育”功能。

所以，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把干部参加劳动与阶级斗争并列都当作社教的基本内容，因而感受到干部参加劳动在整个社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时，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社教运动对于他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官僚主义、只有公仆与主人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意义。

毛泽东对这次社教运动，对这种用阶级斗争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方法进行的社教运动充满了信心，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在那个著名的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最后写道，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他在这里所说的“国际主义贡献”，显然不只是限于物质方面，甚至主要不是指物质方面。他更着意的是在政治方面，在精神方面，在于用这些方法为当代国际共运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官僚化、防止共产党干部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成功道路。

但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能够解决“反修防修”的任务吗？能够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曾十分关注，当代国际主义运动中十分突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官僚主义的问题吗？或者，即使用这样的方法能够消灭官僚主义，真正使干部成为人民公仆，而这样的干部还会去进行一场“严重的”、“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吗？还有，已经发动起来的运动能在既定的轨道上走多远，它将如何发展？在当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未能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思索。

就今天社会主义实践所达到的高度来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限制以至消灭官僚主义的途径大致可以概括为：制度和体制的不断完善与改革；广大劳动群众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广泛参与；人民群众对

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监督的制度化、法律化，以及他们真正获得了对干部任免升降的权力；党内及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等等，以上这些因素中，不少已被毛泽东注意到了，而且得到他的高度重视。例如，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广泛参与，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干部参加劳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消灭特权，等等。但是，他却明显地忽视了体制上的问题，他也没有进一步地探究他所提出的一些正确方法的可操作性问题，特别是当他把这些良好的愿望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后，他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与他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5月杭州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及会议讨论情况，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作出了非常严重的估计。例如，剥削阶级、地主富农千方百计地企图复辟、反攻倒算，篡夺领导权，进行反革命活动，投机倒把很严重。雇工剥削，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等等。根据这样一种严重估计，“前十条”还专门写了“依靠谁的问题”和“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提出依靠贫下中农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要坚持的阶级路线，要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等等。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指示，文件还专门写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一条，指出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前十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毛泽东有关四清的指导思想，肯定了干部参加劳动在四清中、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地位和意义。

“前十条”发布以后，各地即按照文件精神，大批培训干部，开展社教试点工作，与此同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规律不顾人们的种种限制和良好愿望，也开始发挥作用。试点中，普遍发生了打击面过宽，混淆政策界限等“左”的偏向。

有鉴于此，1963年9月6日至27日，在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由刘少奇等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从总的方面来看，“后十条”与“前十条”一样，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但是，起草这个文件的目的，还是在于限制和防止当时已经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力求缩小打击面，减轻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

为此，“后十条”强调了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的重要性，指出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后十条”还提出要注意团结上中农，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要具体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后十条”还对当时一些敏感的、已经导致扩大化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性规定。例如，要求把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那些一时糊涂的落后群众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加以区别；划清贪污盗窃同超支挪用、多吃多占的界限，腐化堕落同一般生活作风的界限，等等。“后十条”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口号，提出“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等一套神秘化的工作方法的同时，也提出了运动要与生产紧密结合、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在当时起了有益作用的规定。

尽管当时党内就有人对“后十条”提出异议，认为它“右”了，而毛泽东在以后也曾对它表示过不满，但在当时，他还是对“后十条”采取了肯定的态度，9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即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在全国宣讲两个“十条”的指示。1963年冬至1964年春，社教运动就在部分县、社开展起来。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深有感受，都迫切地希望在恢复经济的同时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共同认识和出发点。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整体把握上的差异，以及在如何进行运动问题上的不同，在社教运动大规模地展开以后，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在运动的重点，方法等问题上的分歧逐渐加深。

当时，刘少奇等更注重的是基层，特别是基层干部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他们更注重的是政治上的蜕化变质，腐化堕落以及经济上的贪污、多吃多占等行为。而对经济中“投机倒把”、“弃农经商”一类问题，他们看得不是那么严重。对于农村经济恢复中出现的商业活动的活跃、农民买卖行为的增加，刘少奇等都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认为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所以，在刘少奇等参与制定的“后十条”中，就强调过要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和临时性的肩挑运销及小量贩运活动加以区别，等等。在进行运动的方法上，刘少奇等人照例沿用了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方法，即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敌情再严重一点，如这次社教运动——因其政治意义已可以和土改相提并论，那么，其方法也就应当与土改等运动相似，由党的上级组织派出工作队，解决基层及下级组织的问题。所以，“后十条”规定要训练和组织工作队，深入基层，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的办法，河北省唐山专区桃园大队的四清试点，便是根据以上指导思想开展运动的典型之一。由上级机关派出的工作队，基于大队的领导权不知是否掌握在搞复辟的阶级敌人手里的考虑，进村便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做起，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几乎都被“靠边站”，受到不同程度的揭发批判。

而毛泽东的思路却与此有所不同，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不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刻。对于当时城乡阶级斗争过于严重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基本上是共同的。他们之间的分歧首先表现在对运动的主要对象的认识上。在刘少奇看来，问题主要出在基层，主要集中在基层干部身上。刘少奇也不否认，“基层出了问题，根子主要在上面”，这个“上面”，可以是县、地、省甚至中央的一些部门。至于再往上面，刘少奇没有想过，因为他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别也正在这里。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毛泽东也曾把当时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归因于基层干部未能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或在基层有“坏人当权”。而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他主要是根据来自“上面”的“三股风”确立了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框架后，他对基层出现的这些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除了继续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外，他更注重的是“下面”的问题与“上面”的联系，而这个“上面”是可以“上”至中央领导层的。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又派生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另一个重要分歧。因为更注重“上面”的问题，所以在四清运动正式开始以后，毛泽东对沿用以

往的工作方式，对派工作组来领导运动的方式并没有表现出像刘少奇等人那样的热心，更不赞成把工作队大量地集中在一个点上的做法，既然根子主要在上面，又焉能保证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比基层干部更正确？焉能保证他们不执行“上面”的错误路线？而一旦他们执行了上面的错误路线，这才是最危险的。

1964年8月，刘少奇要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同他一起去南方修改“后十条”（草案）。行前，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修改文件有什么意见，毛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似乎并未引起刘少奇更多的注意。在刘少奇主持修订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中，除了对形势更为严重的估计外，还增加了一些显然与毛泽东意见不同的内容——尽管刘对此可能还未觉察。

“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最重要的一处修改和补充是，“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联，调查研究以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这一修改和补充，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开展运动的规定，从而把整个运动都置于工作队的领导之下。

这个文件下发之后，很快使大部分进行社教运动地区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靠边站”，由工作组取而代之，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打击过重、混淆敌我的“左”的错误。与此同时，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在一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也在不少地区推行开来。这些做法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造成了四清运动开展以来一次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

在刘少奇等制订“后十条”，修订“后十条”的时候，毛泽东根据他对社会主义一些根本问题的理解，根据他对正在进行着的社教运动实践的观察，同时也是根据对当时苏联等国家现实的反复思考，正在形成和发展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

一方面，基层的问题仍然是他关注的重点。通过对运动的观察，他对敌情的估计进一步升级。1963年6月14日，他在同河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认定：

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那里被篡权的基层单位）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实行他们的一套。（40）

同年6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41）

同年8月4日，他在同一位外宾谈话时说：

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42）

在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开展了社教运动，其结果反过来推动着毛泽东发展了以往的扩大化思想。问题还不仅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基层问题的分析，逐渐把警惕的目光投向了“上层”，而且是党中央一级的上层。

在1964年6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当时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中两个突出的夺权典型经验。这两个典型，一个是甘肃省白银

有色金属公司的夺权经验，一个是天津市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

甘肃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又称白银厂，是一个拥有二万余员工的大型铜硫生产联合企业，自 1963 年 3 月开展“五反”运动以来，由上面派来的工作组很快就发现了严重的“敌情”。工作组认为，这个公司“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使无产阶级的国营企业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企业，使国家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全民所有制的财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领导集团成员生活极端腐化”，“社会风气败坏”，“反革命活动猖獗”。结论是：这里“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的世界”，而且，这个厂的领导班子还与“高岗手下的红人挂钩”，与原省委领导人有联系，等等。工作组夺权的结果，是 1 名原党委书记、1 名党委第一书记，2 名党委副书记及其他一些人，分别受到党内的严重处分以至刑事处分。

党中央在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一个刚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大型联合企业——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这样一个严重事件，很值得大家深思。”白银厂的问题，“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死不甘休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隐蔽的方式，打入社会主义企业，企图篡夺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它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而这是同党内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分不开的”。批语指出，白银厂经过五反运动这样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把企业的领导权从阶级敌人的手里夺了回来，这说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天津市小站地区的社教运动开始于 1964 年 1 月。由于陈伯达参与蹲点，很快就出了“典型经验”。天津市委 1964 年 9 月向中央的报告中称，四清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小站地区揭发出了个“反革命集团”，“上边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保护人”。(43)

中共中央在转发天津市委报告时，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时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指示”指出：“小站地区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所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有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指示”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

白银厂和小站地区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在 1964 年 6 月中

央工作会议上，他在讲话中指出，白银厂、天津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由此，他又重申了以前的一个重要判断：我们国家我看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在坏人手里。在这里，当他把这两个地方的问题用“修正主义”来概括时，实际上已经把上面的问题与下面的问题、国内的问题与国际上的问题用“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把这两个地方性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广阔、更严重的背景之下，从而使问题具有了更严重的性质。这两个样板中的一些重要经验，如地主资产阶级通过篡夺领导权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开展夺权斗争，等等，都进一步发展了八届十中全会的理论。

循着这一思路，1964年间，毛泽东还批发了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等文件。这些夺权的样板经验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而诸如此类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着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党内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以及“夺权斗争”等认识。这些认识与刘少奇认可的大兵团作战、着重解决基层干部问题的分歧，也更加明显。

到1964年底，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已经基本成熟了。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有关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中作出如下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44)

他还写道：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况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45)

同日，他还在另一份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46)

还是在同一天，他在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夫妇宴请罗政府代表团的情况报告上又批示了几乎是相同的内容：

他们看我们的干群关系不准确，我们国内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感觉，我们的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47)

在一天之内写出三个重要的、内容和概念都大体相同的批示，标志着毛泽东有关社教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的又一次新的飞跃。这个飞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对象中，他把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放到了一个更优先考虑的地位，这一考虑的出发点，是因为他已经把官僚主义者当成了一个阶级，而且是一个与工农处于尖锐对立中的阶级，而在1960年至1962年间，他虽然也激烈地抨击过官僚主义分子。称之为“死官僚”，甚至把它当成是反革命分子的同盟军，但却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阶级。第二个突出特点是，他进一步发展了有关干部参加劳动的思想，他把工厂企业管理管理人员是否能通过“三同”搞好与工人的关系，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那些因不搞“三同”而脱离群众的管理人员等同于资产阶级，等同于革命对象。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把对生产的管理等同于社教，也就是等同于阶级斗争。这一论点反映了他对改善管理的重视，以及他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

认识。在这一认识中，就他对人的重视，对教育人的重视，对积极主动地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而言，的确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本质的一些深远的甚至是超前的设想，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当他把管理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时，他显然是把现代管理过分简单化了。当他把官僚主义当成阶级斗争或归结于阶级斗争时，也是把原因更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1963年上半年，在刚刚开始发动五反四清运动时，曾经对敌情作出了十分严重的估计，运动的对象也十分宽泛，从贪污盗窃到多吃多占，从投机倒把到弃农经商，从单干风到雇工剥削，买卖土地，从腐化堕落到官僚主义，从宗教迷信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如此等等。运动进行一年多以后，所发现的敌情更多，也更严重，所不同的是，这些运动的对象已经成为一个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甚至因重点过分突出而趋于单一、简化——的体系。在毛泽东看来，在这个体系中，“党内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这些不同概念所反映的基本相同的内容，在运动中已处于“中心”或“第一”的位置，而其他诸如地主、富农、反革命、贪污盗窃分子，腐化堕落分子等等，都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而放在次要或很次要的位置。

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几个批语表明，经过一年多的四清运动，经过一个由繁到简、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过程，他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主要对象的思想已经基本成熟了。当他把这一对象定名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自建国以来就一直苦苦思索的一个老问题上，这就是：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官僚主义，实现真正的平等。当然，这个老问题是被放在一个新的框架里来认识和提出的，因而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六 “引起警觉”

为研究和总结社教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

在会议进行的第一阶段,即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着重讨论了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等问题。12月20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运动中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讨论中,在议及运动的主要矛盾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经表面化了。发言中,毛泽东批评了前一阶段运动中“左”的错误。他指出,运动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至8%,人数不能超过10%,否则就太多了。他批评说,有那么多的地方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7亿人口划成20%,有多少人?可能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强调,运动主要整“当权派”,要“整党”。他说:

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群众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

他又说:

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12月27日,毛泽东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二个资本主义派。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有一些刘少奇是赞成的。例如,要整当权派,中心是整党,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等等。但有一些内容,刘是不赞成或不甚明了的。例如,整共产党的当权派,这里有没有个限度或极限?中心是整党,应该依靠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整?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但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派?如果说已经形成派,人数是不是太多了?共产党内又出现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这在理论上是不是讲得通?

在会议上,刘少奇没有正面对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异议,而是肯定了当时运动中一种比较流行的提法,即“两类矛盾交叉”。他认为,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刘少奇的这些不同意见,毛泽东是不赞同的。而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见解,也未能引起刘少奇的充分注意。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反映到这一阶段会议的结果中。

12月底,会议讨论制订出《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

《纪要》对运动的性质统一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于运动的名称,《纪要》统一规定城乡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与1963年上半年的“小四清”已相去甚远。关于运动的时间,《纪要》规定在7年内全国搞完,3年内搞完1/3的地区。

毛泽东对这一阶段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认为,会议对前一阶段已经发生的“左”的错误没有认识和研究,特别是没有反映1964年下半年以来他所形成的一些新的、重要的思想。根据他的意见,1965年1月初至1月14日,会议继续举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社教运动只靠工作队,脱离群众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问题。这些批评显然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1965年1

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谈，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县，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

1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

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议上，对“后十条”提出了批评。他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10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会议重新讨论了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在作了一些重要修正后，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重申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区别对待犯了错误但还可以教育的同志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对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快一点解放出来。“二十三条”改变了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由工作队单独领导运动的做法，提出“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领导运动的原则，反对工作队搞神秘化、冷冷清清，只在少数人中扎根串连；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严禁打人和变相体罚，等等。“二十三条”还要求把“四清”落实到建设上，运动自始至终要抓生产、抓分配（群众生活），等等，“二十三条”的这些规定，对于解脱大批基层干部，在一段时间里遏制“左”的错误，稳定农村形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270_1.bmp}

但是，“二十三条”又在理论上，在指导思想发展了“左”的错误。它强调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断言“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二十三条”批评了党内对社教运动的不同看法，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走资派”的，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原稿中，“中央”后面并无“部门”二字，锋芒实际上已经指向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周恩来在修改文件时，提出在“中央”后面加上“部门”二字，削弱了文件的锋芒和冲击力。当然，这种修改没有也不可能触动毛泽东已经形成的认识。

不论是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对晚年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这次会议都具有一种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毛泽东已经形成了诸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类在他晚年扩大化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概念，并正式写进了党的文件，还在于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再次升级，毛泽东也因此开始失去了对刘少奇的信任。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曾有一段评说，他说，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一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自此之后，这两位来自湖南的个性鲜明、性格倔强的革命伟人之间的裂痕再没有愈合过，分歧在令人忧虑地发展着。党中央一线的工作虽然还是由

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却是由江青等人背着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另外的渠道和方法进行。一年半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二十三条”下发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城乡社教运动重新作了部署。前一阶段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差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大批基层干部得到解脱，工作队也改变了过去包办一切、神秘主义等错误，农村的形势很快又有所好转。但是，由于“走资派”理论的提出，运动的重点转向追查“走资派”及其在县、地以至省和中央的“后台”，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在当代社会主义思想家和领袖中，能像毛泽东那样始终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表现出极端厌恶并保持高度警惕的人并不多，而能像他那样对这些社会弊端采取那种尖锐、激烈手段的人则更少。

但是，与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坚强的意志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官僚特权现象等认识上的明显失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没有认识到这些他所深恶痛绝的弊端同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之间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企业对经济过程的决定权越小，与经济毫无关系的国家官员对经济过程的干预越多，整个经济的官僚主义化便越厉害”（48）没有认识到，在没有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企业管理机构作出的决定往往是主观的，而且报酬同现实的市场效果是脱节的，而这就意味着内在的“反”官僚主义因素也被排除了；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特殊形态及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在联系……。建国以来，几乎是一个接一个的包含有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固然反映出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愿望和决心，但又何尝不是说明了，对于这些问题来说，这些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为解决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提出了一些永远值得后人记取和借鉴的原则和方法。例如，群众路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经常地、普遍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传统教育，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和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两参一改三结合，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养，等等。毛泽东的坚决态度和他的这些原则、方法、措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有力地遏制了官僚主义的发展，莫里斯·迈斯纳在分析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后得出结论说：在苏联等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成为统治力量，这种现象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使人吃惊的只有一点，即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和冲突相对说来也没有那样尖锐和严重。人民共和国产生了新官僚机构，但从一开始。这个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独立性就受到一定的限制。这里存在着两个限制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巨大权威和声望。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尖锐化和制度化。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传统。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艰苦斗争中，形成了中国革命深深的平均主义精神和价值观念，而群众路线的指导原则又要求在干部和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和保持普遍的团结。（49）

在与官僚、特权的顽强斗争中，在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的不懈探索中，毛泽东取得过成就，也发生过失误，他的成就，得益于他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

信仰，他强烈的平等观以及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他的失误，主要在于他对现代社会一些基本特征的隔膜。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误，他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在一段谈话中说，过去，我们进行过一些在农村、工厂和文艺界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他的意思是说，相对于社教运动的目的、任务来说，社教运动的方法仍未解决问题，所以要再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完成社教运动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当毛泽东把社教运动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以后，社教运动中原有的一些积极内容——包括反对官僚、特权等，不是不复存在，便是被大大地打了折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修正主义”之类的内容要比官僚、特权严重的得多。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敌情，官僚主义又算得了什么？而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党内外民主生活的严重破坏和人人自危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了官僚主义者的地位和官僚主义行为。这种依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膨胀、强化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后果，要比一般的官僚主义严重得多。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的社教运动。其结果非但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反而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这种危机感的支配下，在社教运动还未全面展开的时候，他便又亲自领导和发动了较之社教运动更为激烈、广泛的“文化大革命”。

第六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 “四海翻腾云水怒”

近百年来，在近现代工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强劲推动下，整个世界舞台风雷激荡，高潮迭起，扰攘巨变。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长征。

中国的成就震撼了世界。风云际会的世界舞台上的矛盾、冲突、缓和、战争、和平，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的政治生活和精神世界。

建国之初，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确决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及其称霸世界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建设热情。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迫使法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通过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阴谋在亚洲扩大战争的企图。日内瓦会议之后，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为突出事件的战后国际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世界和平、进步力量又一次挫败了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法等老的殖民地宗主国受到严重削弱。在这一背景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蓬勃兴起，广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迫切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团结起来互相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并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这是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下，独立地讨论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所倡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友好、团结和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鼓舞着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万隆会议成为亚非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转折点。自此，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崛起，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4年底，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56年摩洛哥、突尼斯从法国统治下先后宣告独立。这些斗争给西亚、北非以至撒哈拉以南广大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重大影响。

1956年11月爆发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以英、法等老殖民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英法在中东的势力已如“强弩之末”。

1958年7月，伊拉克人民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并挫败了美英等国的战争威胁。

1958年4、5月间，在美国副总统访问期间，拉丁美洲人民掀起了强大的抗议运动。它向世人昭告，拉丁美洲再也不是美国平静的“后院”。

1959年1月，古巴人民反对美国和本国独裁统治的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宣告了拉丁美洲继非洲之后，也走到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运动的

前列。

1957年和1958年，加纳和几内亚先后独立，这是非洲进入国家独立高潮的序曲。1960年，非洲有15个国家宣告独立，该年由此得到了“非洲独立年”之称。至60年代末，非洲独立国家已增加至41个，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1963年5月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和人民在团结合作、共同反帝、反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61年9月，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这是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的又一个新阶段。不结盟运动是万隆精神的进一步发扬，是广大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开始在印度支那逐渐取代了法国昔日的地位，露骨地侵略越南南方，干涉、破坏南北越南的和平统一。从1959年起，美国开始从军事上直接干预南越内部事务，在南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逐步升级的侵略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武装侵略老挝和柬埔寨。在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决抗击下，美国的“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失败。

1964年，巴拿马人民为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所进行的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巴拿马人民多次举行要求收回运河主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美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美国被迫同意为达成一项关于巴拿马运河的“公正与平等的协定”与巴拿马举行谈判。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斗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面对着这股声势浩大、迅猛发展的革命潮流，与亚非拉人民有着共同经历和使命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作为一个具有全球眼光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家，毛泽东心潮澎湃，豪情满怀。他在一首词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感受和豪情：“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除了溢于言表的兴奋和满腔热忱的支持外，毛泽东还从战略上对这一斗争的发展规律、策略方针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概括，并根据对世界形势的判断，筹划安排国内的各项工

作。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各项工作之前，首先分析指出：“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过去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

1956年7月，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历史规律的高度，谈到了当时世界上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都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会由大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他重申了十年前他在延安时的一个著名论断：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接着，他以哲学家的深邃和革命家的激情指出：

“整个人类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作为一个英明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他又指出：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在1956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谈到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帝。斗争与中国的关系。他说：

“……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那些自恃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最尖端的杀人武器而在全世界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者不会知道，在毛泽东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一伙“教员”，当然，是反面教员，是以血和火教育世界人民的教员，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发展自己、提高自己所不可缺少的反面教员。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他说：“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

1961年，正当美国入侵古巴的危险日益逼近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会上，毛泽东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毛泽东还对美国国内黑人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寄与了深厚的同情，给予了坚决的支持。1963年8月3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他指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二十几天后，毛泽东又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他在《声明》中严正指出：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的这些文字，不仅是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谴责，也是对当时苏联领导人鼓吹“和平过渡”，“戴维营精神”的批判。他从来不相信各式各样的“和平条约”对于帝国主义有什么约束作用，他认为当时越南南方正在开展的武装斗争对于当代世界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于那些鼓吹“议会道路”的人，毛泽东认为不是心存欺骗就是十分天真。 {ewc MV IMAGE, MV IMAGE, !09100690_0284_1.bmp}

1964年10月，阿尔及利亚抗法武装起义十周年前夕，毛泽东给阿尔及利亚总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说：“我一直注视着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你们打了七年多仗，经过了种种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你们的胜利是对中国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巨大支持”，“我们支持你们，你们支持我们”。

1970年5月20日，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侵略斗争，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声明》中，他把他的历史观、战争观发挥到了极致。他说：

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败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同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西哈努克亲王说：“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一百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又

说：“现在是大国败于小国之手。”

在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曾经谈到，建国初期，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曾经有一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但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老挝的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埃及独立……

这样一种认识的形成和发展，使他更加坚信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使他难以接受“议会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也使他与苏共领导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在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根据对当代反帝斗争的深刻观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例如：关于人民战争、武装斗争的思想，关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关于美帝国主义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的思想，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各国人民、各种进步力量广泛联合、互相支持的思想，关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等等，等等。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民主斗争中，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以及一切进步，和平力量，不论他们的国别、肤色和信仰如何，也不论他们是否能够完全接受毛泽东的信仰和理论，他们都会把毛泽东看作是他们的忠实朋友，看作是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藐视一切战争威胁和政治高压的无畏战士，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一个热烈向往和追求和平、平等、进步事业的中国伟人。

二 裂 痕

中国革命曾经得到过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对中国具体情况的隔阂和大国、大党主义的影响，斯大林和苏共也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一些干扰和损失。对于这一点，中苏两党都心中有数。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也曾对自己的这些错误作过一些自我批评。

可以说，在中国党内，对于斯大林和苏共老子党、瞎指挥的作风，毛泽东的体会比谁都强烈。建国后，作为胜利了的中国气的领导人，毛泽东曾很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作一深谈。倾诉内心的感受和积郁，但都未能如愿。1956年20大以后，虽然苏并入事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毛泽东的这种愿望却更强烈了。

毛泽东想向苏共说什么呢？

1956年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八大结束前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与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带着不满的口气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党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接着，他说：

这些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一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批评了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之后，毛泽东又批评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他说：

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顽和刚慢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只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不切实际而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我国革命有用与否，不分青红皂白，他们都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行，却不管其后果如何。这种盲从行为的责任当然不能由别人来负，而应由我们自己负责。但对这种盲从、盲目听信别人所造成的后果，却不能不说清楚，讲明白。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盲目听信和服从别人，这确实是幼稚无知的表现。

毛泽东指出，现在人们已开始懂得认真总结历史上的这些宝贵经验了。他说：

当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这些弱点，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就可以显示出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也是在实践中付出了高昂代价而后获得的宝贵经验，但更可贵的是现在人们开始懂得

了这点，重视了这点。这真是用血汗换来的，用无数的牺牲换来的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收获。固然，要革命就难免有牺牲。但是由于自己的愚蠢、无知和主观上的种种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即本来可以避免，而仅仅由于自己的疏忽、盲目轻信而使革命蒙受的重大牺牲，是最令人痛心的。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心里感到特别沉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历史上的这些沉痛教训、曲折经历以及两党关系中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使毛泽东心潮起伏。他再也难以压抑对苏联党和斯大林“老子党”、“瞎指挥”的愤懑之情：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一吐积郁，显然是受了苏共 20 大正式开始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国际共运内部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影响。他希望通过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进一步肃清大国大党主义在国际共运中的恶劣影响。然而，历史不久就证明，以批判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很快便又重新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老路，并因此与中共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这次经过深思熟虑的谈话，不仅是对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实际上也勾勒出中苏两党、两国未来关系的轮廓。

1956 年 2 月，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和整个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实际上，对斯大林一些严重错误的批判，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在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从原则上讲，中国共产党对批判斯大林的一些严重错误是赞成的。1956 年 4 月，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指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错误所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同年 9 月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中也指出：“苏联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又感到某种不安和忧虑。

1958 年 3 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1956 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

苏共 20 大之后两个月，毛泽东在他的那个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成熟的意见。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言人跟着转，中央认力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之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乍了一些错事。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毛泽东不能理解和容忍的是，作为曾经几次受到苏共和斯大林错误干扰和严重压力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对斯大林做出“三七开”的客观评论，为什么苏联党内那些曾经把斯大林捧到天上去的人，现在竟这样来对待斯大林！

在苏共20大之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共高潮，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彼匈事件发生之后，严峻的现实证明了毛泽东和中国党的意思是正确的。这时，毛泽东对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195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表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11月30日，他在接见尤金时又表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除了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对苏共20大另一个突出的不满之处，是苏共提出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以正义战争制止了美国在亚洲东方所进行和所支持的非正义战争，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与此同时，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由于苏联在欧洲主动作出的让步而趋于缓和。这种缓和局势在1955年7月间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议期间达到了高潮。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之后，在国际缓和的声浪中，苏共20大提出并通过了通过议会道路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缓和也罢，和平过渡也罢，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都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把它们作为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则不免失之片面。特别是，如果某大国大党在把它们作为一种唯一的选择以后，又要别党别国都加以服从，则显然更是不妥的。不难想象，对于靠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于建国之初就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严重战争威胁，其神圣领土台湾还处于美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之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对于面对着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侵略扩张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来说，这一观点是很难被接受的。

由苏共20大所引发的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使毛泽东对苏共正在发生的变化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祥的预感。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苏共20大时，毛泽东表达了一种更深的忧虑。

“关于苏共20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出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否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11）

如果可以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那么，列宁当年对帝国主义的结论是不是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十月革命道路还有没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比斯大林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坚持列宁主义的问题。

尽管如此，苏共 20 大在中苏两党间所造成的分歧，毕竟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带有一种局部的性质。苏共 20 大后，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而且面临着国际（如波匈事件）和国内（如 1957 年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等许多重大难题，特别需要有崇高威望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因而对中共的意见、批评采取了尊重、虚心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帮助苏共领导渡过难关，对苏共的某些观点采取了不公开争论或互相妥协的态度。一方面在内部批评他们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又对他们处理国际、国内一些问题的立场予以支持。

苏共 20 大引起的风波暂时过去了。但这次风波在毛泽东内心深处造成的震荡却无法平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后出赫鲁晓夫，已经成为毛泽东内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几年之后，这个问题甚至成为他考虑重大问题时的几个基本点之一。

三 冲 突

1957年11月2日到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11月16日至19日，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这次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的盛会，加强了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会议期间，虽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战略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出于维护团结的共同愿望，两党在各自作了一些妥协、让步之后，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通过。

毛泽东显然是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共运的空前团结所鼓舞。会议期间，他曾热情而又自信地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其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热切地希望，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在国内也取得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也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修改审定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

但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兴奋情绪，不久就又被赫鲁晓夫的无理举措所激起的愤怒所取代。

莫斯科会议的举行不仅表明国际共运经受了反共浪潮的冲击，也表明了苏共领导已经渡过困难阶段。赫鲁晓夫在克服了内外危机、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那些曾经在斯大林身上发生过作用的规律，又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他曾经严厉地批判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却又开始欣赏甚至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批判过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但稍一站稳脚跟、便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他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已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当时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中国在外交军事上受制于苏联。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0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在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情中还具体提出，建设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等等。在中国领土上合资共建军事通讯设施，资金、技术大部分来自苏联，这就很敏感地涉及到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党和政府，对此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但是，苏方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苏方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

是要求把电台作为中苏两国所共有。中方不能接受苏方的协议草案。在中方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明确建议电台由中方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使技术协定的性质变为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实际上只是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

就在中苏在共建“长波电台”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1958年6月28日。根据苏方建议，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尤金大使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苏方的这两个建议，使毛泽东感到突然和愤怒。赫鲁晓夫不能理解，对于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经过长期流血斗争才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对于一个把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有着长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传统，并曾与大国沙文主义进行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敏感并必然导致强烈反应的问题。

就在7月21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建议三九天后，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

毛泽东从苏方建议中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影子，而这却是来自刚刚倚重中国党的支持渡过危机、靠大批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那里。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继续同尤金谈话。谈话中，他明确地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建造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他气愤他说：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界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

最后，毛泽东要求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

尤金的报告使赫鲁晓夫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个粗鲁、轻率的政治家开始领悟到国家主权在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赶到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自己提出的。至于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一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

会议中，毛泽东很清楚地把问题的性质提到赫鲁晓夫面前：

我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毛泽东的谈话，使赫鲁晓夫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决态

度。他一改初衷，同意由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长波电台的建设。

在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放弃了他们原先的建议，但却无法弥补这次争执在两党之间所造成的裂痕。毛泽东加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由“长波电台”、“共同舰队”引起的涉及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1959年，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议公报。这个后来被赫鲁晓夫和苏联舆论界吹捧为“历史的转折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热衷于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

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由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继续对中国采取封锁的亚洲冷战体制，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为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不顾美国到处干涉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事实，也不顾其他国家对美关系的不同具体情况，硬要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加深了。

当时，对于苏联提出的一些有益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中国是支持的，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毛泽东还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后，1960年初，毛泽东在批评他访美时为美帝国主义擦粉的同时，也曾指出，赫鲁晓夫访美，开高级会议是做了很好的事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同意的，是苏联领导人粉饰美帝国主义种种倒行逆施，以及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主张。

问题还在于，赫鲁晓夫访美前后，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力图使中国的外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严惩蒋介石集团的挑衅行为，打破了美国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事先，中国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赫鲁晓夫虽然声明支持中国在台湾海峡同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但又深恐此举会影响美苏合作的气氛，甚至可能导致美苏冲突。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访华。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在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之后，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事实上，赫鲁晓夫一直对炮击金门、马祖妨碍了美苏合作的气氛而耿耿于怀。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担心西方国家因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为由，提出中断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

定。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境发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的访美之行带来不利影响，因而不顾中方的多次解释和劝阻，迫不急待地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偏袒印度、公开暴露中苏分歧的塔斯社声明，是赫鲁晓夫追求实现美苏合作，为即将举行的美苏会谈向美国献上的两份见面礼，是他以突出中苏分歧来取信、取悦于美国的拙劣之举。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又赶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9月30日的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吹捧“戴维营精神”，宣传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并用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中国不要希望“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10月2日，赫鲁晓夫等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会谈。会谈中，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他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提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等等。在谈及中印边境冲突时，他继续采取偏袒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显然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戴维营会谈给他带来的巨大兴奋和优越感之中，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美苏合作的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党的内外方针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要求或者暗示中国牺牲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去实现苏联的外交利益，甚至发泄以往中国领导人对他们批评的不满。

毛泽东抽着烟，静静地听着。他望着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回想着自苏共20大以来两党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争论，赫鲁晓夫对我党“双百方针”的批评，对“大跃进”的嘲讽，在台湾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下公正立场，在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上的无理要求，撕毁中苏新技术协定，以及庄戴维营会谈后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毛泽东感到，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正在迅速扩大。他已经预感到今后国际共运中将会出现更多的曲折和风浪。毛泽东讲话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立场，断然拒绝了苏方存台湾问题上的建议，拒绝了苏方为取悦美国而希望中国立即释放5名美国特务的要求。他表示，将来可以放，现在不行。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不欢而散。

会后，赫鲁晓夫一方面是由于和解的愿望，一方面也是有感于苏方在一些问题上的鲁莽，曾提议将10月2日中苏会谈记录烧毁。这个鲁莽的政治家有时又幼稚得惊人：如果不放弃自己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立场，烧毁一纸记录又有什么用处？！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回顾这次争论时，曾说：去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该拿武装去试验资产阶级政权是否稳固，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他采取中立，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共产党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自己兄弟。他还给我戴了两顶帽子，说我是冒险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也还了他一顶帽子——迁就主义，半修正主义。他不骂修正主义，骂教条主义，所以跟他的指挥棒走很难。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指出，赫鲁晓夫是善变的，对他要再看几年，对苏共要照顾，估计他会变的。总的来说，应当估计联共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他伯我

们戴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

自 1960 年起，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缓和的不多，冲突却一直在发展。较之 50 年代，双方分歧和争论的内容涉及到国际共运中一些更为广泛。深入的问题。1956 年至 1957 年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反对个人崇拜和平过渡两个问题上。1958 年至 1959 年间，斗争主要涉及到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进入 60 年代后，双方的争论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中的了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凭借其大国大党地位，把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 年 4 月，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之际，中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文章。这些文章针对赫鲁晓夫违背 1957 年《莫斯科宣言》、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鼓吹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言行，引证列宁的论断和 1957 年莫斯科宣言，一一进行了批判。文章就帝国主义本性是否改变、马列主义学说是否过时、现在究竟是什么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观点，批评了国际共运中其他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文章在批判苏共大国沙文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的同时，也表露出我党当时一些“左”的思想倾向。

在毛泽东看来，在与苏共的分歧中，除了对个人崇拜、大国沙文主义等老问题外，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这个根本问题上。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列宁主义还灵不灵？

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60 年代初，毛泽东发展了八大前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他认为，虽然还不能说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已经形成体系，但这一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因为：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斗争”也不讲了。有些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思想相当混乱，《莫斯科宣言》丢到脑后去了。人们反对教条主义，把列宁主义的对立斗争和对立统一说成是教条。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主义，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灵的，现代是不灵了。现时代不灵了，阶级消灭了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还是资产阶级在一个晚上就变成无产阶级了？因此就可以和平过渡了？因此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连根铲除了？

在此之前，尽管存在着分歧，毛泽东和中国党仍然希望在两党内部，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这些分歧，而不主张把这些分歧公之于众，特别是暴露在帝国主义面前，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但是，在苏共在中印边境冲突时用发表声明的办法把两党分歧公诸于众之后，中国党开始在报刊上批评苏共的一些做法。即便如此，中国党仍然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内部的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与争论，求得认识上的接近和一致。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

但是，中共的这些良好愿望并没有使赫鲁晓夫等稍有收敛。苏共在分裂、甚至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0 年 6 月，在有 5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策划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国共产党

表示它“宁可被碾得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又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施加更大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国家关系的步骤。

1960年7月6日，即布加勒斯特会后第10天，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

7月16日，苏方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是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

7、8月间，苏方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边境纠纷，如此等等。

苏共领导的一系列背信弃义行为，给当时正处于严重困难中的中国人民又增加了巨大压力，但它却不可能使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屈服。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赫鲁晓夫又一次低估了中国党，低估了毛泽东。面对着苏方的施压、挑衅和刁难，中国党和毛泽东处变不惊，从容坚定，又做了一篇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大文章。早在1960年初，毛泽东在谈及当时世界上出现的一股反华逆流时曾说：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1960年初，苏方撕毁经济技术协议后，他们不会想到，毛泽东对这一背信弃义行为的回答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几年后，当中国已经战胜经济困难，突破了一些尖端技术时，毛泽东又以幽默的口吻说及此事：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毛泽东的坚定、从容、自信，来自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信仰。和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自如。1961年底，他有一段话：

我常说天是垮不下来的。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但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但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但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历史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赋予毛泽东一种巨大、深沉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毛泽东几乎是本能地藐视苏共领导趁人之危给我们造成的种种困难。

1960年11月，第二次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苏双方在相互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也作了一些妥协。在此基础上，会议一致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会议使中苏两党自

1959年10月起激化了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他又指出苏共“病根未治”，估计到还会有反复。

1961年10月，苏共22大举行，会议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重要观点，并再一次掀起了大反斯大林的浪潮。会议攻击了当时与我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阿党领导人，在国际共运史上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先例。与此同时，会议还多处影射反华，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做法，重申了中国党希望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愿望。

苏共22大加深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会后不久，苏联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国党则发表了阿党反击苏联的材料，苏共对此进行指责，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国党戴上了“反对列宁主义”，“特殊立场”、“特殊路线”等帽子。1962年4、5月间，苏联在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制造了伊宁事件，引诱、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1962年8月，中印边境再次发生边境争端。苏联公然采取支持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立场，在外交上为尼赫鲁政府辩护，并从军事装备上给印度以支持。

随着赫鲁晓夫在大国主义、分裂、反华的道路越走越远，毛泽东对赫氏、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根据这些思考，他得出自己的结论。

60年代初，毛泽东曾作出苏联主要领导人是“半修正主义”的结论。他认为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代表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批变质了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考虑到赫鲁晓夫其人变化无常，他的一些主张也不算系统，毛泽东又表示，对他还要再看一看。

1961年9月，苏共22大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几个月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根据对苏共领导不断加深的认识，毛泽东对国际共运的前途及我们党的对策也作了几种考虑。60年代初，他曾提出，解决分歧有两个或三个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经过比较短的时间就获得解决。第二种可能是，时间需要相当长，但不是很长。第三种可能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他又指出，我们要准备最坏的情况，准备他们采取1948年对待南斯拉夫的那一套办法，因为现在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修正主义这种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它要泛滥一个时期。

在苏共领导的共运纲领中，毛泽东最不能同意的是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暴力工具，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使它和平地转入人民手中，改变它的性质。这不仅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实践。他认为，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不过渡。鼓吹和平过渡，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武装到牙齿、在世界各国到处进行侵略、颠覆和干涉的帝国主义面前放下武装，放

弃暴力革命，这实际上是背叛革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苏两党的斗争是世界人民革命的问题。

对于苏共等早已酝酿、而在 22 大终于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毛泽东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党是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既然是“全民”的，还要它们干什么？这是一个连形式逻辑都不顾的悖论。在政治上，它对社会主义各国，对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危害极大。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

尽管毛泽东已经明确了苏共领导的性质，并对赫鲁晓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仍然认为，不管人家怎样，我们对苏联要采取团结的方针，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团结。1963 年 9 月，他还重申了中央对苏联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

面对着日益加深的中苏分歧和国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反华浪潮，面对着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没有丝毫的沮丧与惊慌。他坚信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坚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反华不得人心，坚信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满怀信心他说：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他又说：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他坚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的经验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习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他表示：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最后，毛泽东从容、坚定他说：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与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彼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民还孤立吗？（笑声）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可能是愤愤不平于自己当年在政治角逐中的毁灭，也可能是出于对当年论战中左支右拙窘境的耿耿于怀，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罗列了一大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材料”后，对毛泽东发了一通充满怨恨刻毒的议论。但是，如果他看过毛泽东当年这些文字和言论，那么，不管他曾有多深的成见，也不论毛泽东当年在理论上曾有的一些错误，赫鲁晓夫都难以否认，不论是在哲学素养、政治智慧和信仰力量方面，还是在从容镇定、挥洒自如的气质、风度方面，他们都不处于同一个层次上。毛泽东的冷静、坚定、深刻、机智、从容、乐观与赫鲁晓夫的鲁莽、游移、轻率、偏狭、粗俗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 大论战

1962年底至1963年初，苏共及受其影响、控制的一些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的攻击。我党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希望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但分歧已发展至此，这些努力已无济于事。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7篇答辩文章。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这些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对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有一些限制。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对国际共运中一些基本问题的总看法。同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于6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为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复信就诸如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概括、当前时代及其基本矛盾、怎样对待社会主义阵营、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怎样认识和对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反对个人崇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经过频繁磋商和尖锐的争论，中苏两党于1963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了高级会谈。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会议进行期间，苏共中央违背双方达成的协议，破坏会议气氛，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和攻击。7月2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并声明“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苏联又掀起了一次反华宣传高潮。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些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革命与建设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这场空前规模的公开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党对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批判，反映了当时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愿望，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捍卫了中国和中国党独立自主的地位。这一斗争产生了深远的积极意义，这在东欧巨变和苏联瓦解之后，看得更为清楚。对于争论的这一方面，邓小平后来曾总结说，“一个党和由他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¹²⁾但是，在涉及国际共运的理论和战略策略等问题时，两党都有不少错误。对于争论的这一方面，邓小平后来也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

是他们。(13)

回顾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也有过一个总的看法：

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14)

中苏分歧和论战不仅震动了世界，而且也多方面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

早在 1956 年苏共 20 大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就已浮现了“出赫鲁晓夫”的阴影。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时，就曾认为这股“右倾风”与国际上修正主义相呼应。

自 60 年代初起，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在批评苏共的错误时，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随着大论战的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也不断发展。他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观察苏联；反过来，他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六十年代后，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他对国内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等国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背景。

1960 年下半年，毛泽东在论及当时农村整风整社的重要性时，就曾指出，不每年整风，将会出中国的赫鲁晓夫。1961 年初，他在说到莫斯科 81 国党的会议“病根未除”后，接着指出：病恨在我们国内也有，不仅党外有阶级，我们党内组织也不纯，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所以，我们也应纯洁党的组织，办法就是整风和整顿组织。

经过不断的思索，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国内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基础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在他认定赫鲁晓夫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高薪阶层后，对国内的高薪阶层、干部特权也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说以前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例外的话，那么，在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之后，就不能这么说了。他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更多，所以更应提高警惕。(15)

1962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泽东开始对“三股风”进行严厉批评时，曾尖锐地提出：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

他还提到：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个难想象，1961 年 11 月苏共 22 大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加深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正是用这种警惕的目光，反过来审视 1962 年上

半年国内调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内形势的忧虑和不安。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实际上已开始把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所以，1963年2月，在说到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时，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把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分子一齐扫一下。到1963年下半年，他的提法更明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国内的反修打下基础，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到1964年，他已经把“四清”中的那些“典型”如天津小站、甘肃白银厂直接等同于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了。

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那些已经变修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归根到底，是党和政府的蜕变，是党、政、国营企业及其他部门中产生出大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结果；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特权阶层的代表，这些新形成的概念和思路，马上又被用来分析国内的问题和形势。所以，“四清”运动中很快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等概念，得出了“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样的结论。(16)

中苏大论战加深、加重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存在着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者“相互呼应”的问题，更是因为他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与国内“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之间的逐渐重合，以及由于“反修”、“防修”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有力的放大、催化作用。

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迅速发展，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五 备战备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甚至战争威胁。但是，在六十年代以前，由于中苏友好同盟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即使是发生了台湾海峡危机那样的事件，毛泽东并不认为美帝国主义敢于入侵我国。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情况大不相同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以至中苏同盟关系的解体，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也大不同于五十年代了。1962年印度政府再次挑起中印边境冲突，蒋介石集团趁中苏关系破裂和大陆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1963年起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美国与亚洲一些国家及台湾签订了各种军个或准军事的条约和协议，对我国构成军事包围，日本国内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也日渐猖獗。

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局面，毛泽东在研究、指导国内四清运动及国际反修的同时，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心血。

毛泽东戎马半生，用兵如神，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上，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他坚信人民战争的伟力，坚信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能够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坚信正义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杰出的军事家来说，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的确是愚拙可笑的。

问题的另一面是，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并没有掉以轻心。用他自己的活来说，这就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面对着不断严峻的局面，毛泽东精心研究了我国国家安全的形势和任务，亲自指导了我国一系列重大的战备活动。

1962年，正当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时，毛泽东要求利用对付蒋介石进攻的战备行动，把军工搞起来，对原来的常规武器生产储备方针作了相应的调整。1963年初，在一次听取中印边界反击战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你们都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要注意军事，只搞文化、不搞武化是不行的。

自1964年起，毛泽东对我国遭受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危险性估计得更为严重。在1964年5、6月间进行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并不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毛泽东低估或轻视了核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性。实际上，曾经枪林弹雨，在血与火中指挥雄兵百万的毛泽东对现代战争、现代武器并不陌生。他估计到，一旦大战来临，敌人会在全面进攻之前，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空袭轰炸，并有可能占领一线。所以，他认为，我们的国防工业要摆在三线，要经得起敌人头一轮大轰炸，不要把我们多少心血、多少时间搞起来的老家当一下子就打掉了，不要在战争初期就把我们的力量，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和破坏掉，要把国防工业建在三线，建成能抗飞机轰炸、抗原子弹袭击的巩固的战略后方。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很重要、很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

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与会人员，把这些事做好了，我就放心了。为了引起全党的重视，同年8月他提出，现在再不建设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还估计到，一旦战争爆发，北京可能被轰炸，各省被割断。他认为，应付这种情况的最好办法，是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兵工厂。这样，即使各省被隔断，也不至于垮掉，仍有能力生产武器与敌展开持久战。他提出，中央主要生产、研制尖端武器，重武器，各省主要生产轻武器。因此，他要求各省都要建设自己的小三线，抓常规武器生产。他曾敦促一些地方领导，要有准备，赶在和平时期搞点枪，否则战时割断了就搞不到了，针对当时人们的一种顾虑，他说，有人说搞了敌人不来用不上不是浪费？那不对，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这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一定要搞。他责成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抓武器生产，这样，不管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

在三线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不但认为我们要有战略大后方，而且战略大后方要建设得适应战时需要，要保证在敌大轰炸的条件下，仍能保持正常生产。为此，在三线工业造点布局问题上，毛泽东主张靠山、近水、扎大营。考虑到战时可能被敌人封锁割断，以及我国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薄弱，他主张国防工业在结构上要“小而全”。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上，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以及现代战争的特点，发展了他以往的战略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人侵，在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敌进攻我防御，敌主动我被动。如果排成一条线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则会使战线拉得太长，敌人到处可以突破。所以，只有大胆地、主动地、彻底地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才能有理有利，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敌人拉长战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背上包袱。而我方则有把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和地点歼灭敌人。基于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就扑空，我打你准能消灭你。打得赢就打，不打，总是跑，是机会主义。而打不赢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敌人来了，修点工事顶一下，使后方有所准备，让敌人进来，陷得越深越好。在确定诱敌深入的同时，毛泽东也强调在战争初期第一线要顶的精神。1965年，毛泽东说，不管怎样，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要搞几道防线，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他强调，在反侵略战争中，作战的根本方针是运动战，攻的时候用，防御时也用。

民兵建设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考虑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时，始终把民兵的作用和建设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1962年6月，毛泽东发出了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即“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他在解释这“三落实”的方针时说：

组织落实，就是搞多少民兵，搞多少普通民兵，有兵有官，有强的干部，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一有情况能召之即来。政治落实，就是对民兵要做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要设政治委员、指导员，做人的工作，分清

好坏人，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军事落实，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各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要搞些训练。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甚至于帝国主义把大规模战争强加于我们，怎样对付，都要有办法。

1965年3月，美国派出地面部队进入南越参战，并出动飞机对北越进行轰炸，越南战争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军政要员和舆论工具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升级行为，中国党和政府立即作出了坚决、强硬的反应。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从6月起，中国先后向越南北方派出了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

与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同时，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以1966年3月苏共23次代表大会为标志，中苏两党断绝了两党之间的关系。此后，中苏边境冲突日益增多，苏方也开始向中国发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毛泽东进一步加重了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1965年10月，他再一次要求全党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17)他要求，全军应以临战的姿态搞战备。同年年底，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准备早打，准备大打，准备它突然袭击，准备它摔原子弹，准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各国反动派一齐来。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提出了要把国防放在第一位的思想。

在1965年9至10月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由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毛泽东重视人的作用，重视政治思想、觉悟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轻视武器装备、尖端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在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之后，毛泽东曾气愤他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他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尖端武器，加强国防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根据毛泽东的决心和指示，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从六十年代起，应以跃进的姿态加快国防工业，特别是尖端技术的基本建设速度。六十年代初，尽管我国的国民经济遇到极大困难，国家许多重点工程下马，围绕着国防工业中一些重点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中央内部还有不同意见。但由于毛泽东的坚决态度，别的项目都处于压缩、下马的状况，而尖端武器的研究、制造则处于大建设、大发展的时期。1964年，毛泽东提出，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管他什么国家，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就在这一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在毛泽东大力发展尖端武器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导弹、核武器研制工作，以超出常规的速度发展着。1964年不仅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1966年10月，我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一系列使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产物，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结果。

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备战距今已近30年了。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战争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战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也的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三线”建设也由于要求过急而存在着粗糙、浪费、质量低等缺陷。现在的人们有理由对这些缺陷提出批评。但是，人们

不应忘记，当时的中国的确存在着强敌入侵的危险，人们不应当忘记，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所说的“共产党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中国和遏制中国的倾向，是自由世界最大的问题”，以及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设想动用原子武器以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设想，或者是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人们只要不忘记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昨天的事实，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正是因为中国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使得蒋介石集团不敢妄动，使得美军即便是在侵越高峰时其地面部队也未敢越过 17 度线，使得美国在越南战争时期始终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的反应和动向，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贸然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孙子兵法》有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大规模备战和紧张对峙的结果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遏制住了强敌入侵中国的企图，尽管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七章 文化批判

一 “东风要占优势”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各地巡视。12月他到了上海，21日，他同正在这里开会的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谈话，其中说到：

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泊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

不到半年，毛泽东两次强调了意识形态问题。八届十中全会上，居心险恶、善于奉迎的康生抓住小说《刘志丹》，作为“翻案风”的例子，证明毛泽东所说“翻案风”的存在。

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毛泽东并不因为小说《刘志丹》已被批判而放心。相反，他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敏感异常，在他看来，意识形态领域绝不只是小说《刘志丹》的问题，而是问题很多。所以他才作出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的估计。

毛泽东如此关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是没有来由的。

5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提出并倡导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开放”、“百家争鸣”，后来又把它们作为文艺工作的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是，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毛泽东的思维框架又带有某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色彩。在这一思维框架里，文艺创作、学术研究成了政治的附属物，文艺作品，学术见解的主要评价标准是政治标准，文艺批评、学术争论也往往变为政治批判。毛泽东领导甚至直接指导了文艺界几次大规模的错误的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就能证明这一点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对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担心、非但没有消除或减弱，反而加重了。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部门，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共产党的领导；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没有改造好，在思想上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范畴。从上述估计出发，他提出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思想战线一个重要的乃至头等的大事。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和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全面贯彻，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则受到来自“左”的错误方面的极大影响，难以真正实行。从反右派运动到三年“大跃进”，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是图解政治的现象日甚一日，搞了诸如“新诗歌运动”、“教育革命”、“文化大跃进”之类的违背自身客观规律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大批判此起彼伏，相继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右派”、批判“新人口论”、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西方文艺和学术思想等一系列运动，其结果，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取得真正的健康的进步与成绩。

60年代初期，国家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对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也进行调整。对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一是为了调整

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动员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共渡难关；二是为了复苏和繁荣文化。

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是从多方面进行的。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自“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文艺工作，并着重总结了教训。会议指出了“大跃进”以来文艺作品宣传了“五风”、文艺工作未能很好地执行“双百”方针、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狭窄及主题思想与生活真实关系等问题。与此同时，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也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两个会议上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阐述了在文艺工作中发扬民主作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与创造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周恩来指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头了，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他说，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周恩来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它是精神生产，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在这个问题上，要解决好数量和质量，原料和加工，思想和业务，批评和讨论等问题。他还说，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在中外关系上，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周恩来特别指出，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批评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周恩来指出，这是从主观主义、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出发。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这次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讲了10个方面的问题，故简称《文艺十条》。后来，这个文件几经修改，变成8个方面的问题，称《文艺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以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的名义下发全国。

《文艺八条》是文艺工作进行调整的重要文件。它是多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它强调要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文艺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鼓励文艺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文艺八条》提出要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文艺八条》专门阐述了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的内容，指出文艺批评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文艺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的不同观点，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要克服文艺批评中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要容许多种多样的批评。《文艺八条》要求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指出不要简单地把钻研业务同脱离政治、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文艺八条》提出要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领导，党组织不应该代替行政领导机构去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应该充分发挥文联和各协会等文艺团体的作用。

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也同时作了调整。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

作会议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高教六十条》针对 1958 年以来学校生产劳动过多的情况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力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它指出，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必须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即重视理论，重视书本知识，切实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的教学，又要重视通过生产劳动，以及实验、实习、社会调查等，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对学生参加劳动要有适当安排，不能过多。《高教六十条》还要求在科研工作中要贯彻“双百”方针，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倡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在社会学方面，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成分。

同年，中共中央还通过了由聂荣臻主持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科研十四条》提出，不断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培养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科学机构的根本任务，因此，《科研十四条》针对几年来政治运动冲击科研业务的情况，要求科研机构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根本任务来展开，必须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反对轻率上马下马，任意打乱和中断科研工作；保证科研人员以主要精力从事业务工作，不得以政治学习、社会活动等冲击业务工作时间，聂荣臻在为这个文件而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还建议废除“白专”的用语，认为这个口号挫伤了一部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报告认为，“红”必须落实，不能空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报告和《科研十四条》都重申了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双百”方针，反对轻率地把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提到哲学的高度，简单地扣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帽子；要鼓励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不戴帽子，不贴标语，不以多数压服少数。

文艺、教育、科学政策的调整，都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估计知识分子，1962 年 2 至 3 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3 月，文化部、全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专程赴会，周恩来在两个会议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他认为：“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周恩来特别说明，他在 1956 年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对知识分子的分析，都不改变。稍后，3 月 28 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在这两次会议上，陈毅也作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他说，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表示向大家行“脱帽礼”。他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陈毅还严厉批评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随便打击人的现象：“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的结论，明天做那个的结论，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工夫就否定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不

可！又是那个给你的权？”他指出，一个领导人，随便打击别人，这种作法是封建的东西。

广州会议的精神象春天的雨露滋润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田。有的人提出要把广州会议的精神刻在石碑上，永远不忘。

经过调整，意识形态领域逐步走上正轨，并开始恢复生机。文艺创作逐渐重新活跃起来，一批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戏剧作品出现在银幕和舞台上。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健全，前些年受到轻视和压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得到加强，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科学技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得以加强，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科学技术问题得到解决，一些新兴学科如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取得进展。社会科学研究上逐渐出现了活跃气氛。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毛泽东没有像他重视农业那样关注，更没有像他管农业那样直接抓。但是，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事情并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触及到毛泽东以往的认识和主张。比如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留恋旧世界，对新世界格格不入。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又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列入剥削阶级的范畴。又比如关于学校教育，毛泽东过多强调学生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忽视课堂教学和正规的教学进程和制度。还比如对于文艺创作，毛泽东过分强调政治标准，又按政治标准简单地把作品分为“香花”与“毒草”两类；“毒草”是作为对立面允许存在，归根结底是消灭的对象。他在1957年说过：“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东西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在毛泽东看来，意识形态领域调整的一些重要政策，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与判断。对此，毛泽东当然是敏感的。所以，当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抓住小说《刘志丹》大做文章时，毛泽东立即提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点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在他眼里，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样甚至更严重地存在这些问题。

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分歧愈来愈大，这种分歧伴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变得更加复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股来势汹汹的修正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间泛滥，而且也波及到中国国内。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出现，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因此，他强调意识形态领域要大力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1960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国际修正主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报告特别批判了修正主义和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艺及“人性论”、人道主义。毛泽东评价很高，批示道：“文件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修正主义“神往”，反过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也格外警觉。

二 “大写十三年”

毛泽东同华东各省市第一书记一番谈话之后，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颇是琢磨了一番。这位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市委第一书记，从1958年以来却特别好讲文化问题，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的发言是专门讲“文化大跃进”的，这个发言描绘了15年后中国的文化状况图景：

到那时，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而且，不但是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我们的人民，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成普通人的常识。

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每个生产队、组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柯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当时进入中共政治局的两名省级领导人之一（另一人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这位在“大跃进”期间颇得毛泽东欣赏的人物，现在又琢磨毛泽东这番谈话的意思。他看出毛泽东对文艺界演旧戏的厌恶和对现代戏的喜好，便提出了一个“写十三年”的口号。“十三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三年。1963年1月，在上海文艺界新年联欢会上，柯庆施说：“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开始树立。”柯庆施说：“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334_1.bmp}

柯庆施的智囊人物、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对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又作了这样的解释：“只有先有社会主义的生活，才会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有了社会主义思想，才会有社会主义文学。”

“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及理由是荒唐的。按照这个逻辑，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民主革命年代的左翼文学都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有其来由，他是针对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关于文艺创作可以而且应该由作家自由选择题材的讲话来的。他不仅不准上海市传达广州会议的精神，而且以“大写十三年”来抵制广州会议。

“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意味着文艺创作的题材限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样一个圈子之内，人为地把多样化的题材变得单一，把本来可以广泛选择的题材范围变得狭窄。因此，受到文艺界许多人士的批评和反对。196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又一次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一些与会者对“大写十三年”提出了不同意见。

然而，有人对“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备加欣赏。这就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空名的江青。

说“空名”也不完全，这位有着“毛泽东夫人”这样一种特殊身份的人物，平时并不过问文艺工作，但是50年代前期曾两次管过文艺界的事情：一次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次是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两次文艺界的大批判运动都与江青的推波助澜有着直接关系。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可以在毛泽东那里传递或获知许多信息，因而来头很大。她喜好搞大批判，也长于搞大批判。从1955年到1962年，江青没有再过问文艺界的事情，但是1962年夏天起，江青忽然又“关心”起文艺工作来，而且管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1962年9月，江青约见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几位正、副部长。仗着她的特殊身份，江青到中宣部从来是发号施令，她召的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陆定一部长、周扬副部长都不好顶她。这回她竟以文艺处长的身份约见两个部的正、副部长，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有“严重问题”。刚刚开完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主要讲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江青清楚，这是一个机会，她可以通过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获得在政治舞台上的出人头地。中宣部、文化部的部长们对江青的意见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叫“充耳不闻”。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日号，与她不谋而合。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2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姿势。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是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擅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其实，文化部对于毛泽东及江青提到的文艺界的“问题”并非无动于衷。1963年3月16日，文化部党组给中央宣传部并中央呈送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本又恢复了原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也重新搬上舞台。《报告》特别点了昆曲《李慧娘》的名，说该戏“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的报告。

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下发后，江青果然借助上海这个“基地”，抡起“批判”的大棒。展开了一场对昆曲《李慧娘》的围剿。昆曲《李慧娘》是剧作家孟超创作的剧本，于1961年第7、8期《剧本》杂志上发表。剧本写的是南宋时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宰相贾似道和他的妃子李慧娘的故事，李慧娘被贾似道杀害以后，变成鬼，用头撞死贾似道。该剧演出后，受到好评，廖沫沙曾在《北京晚报》发表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肯定这出戏。这出戏之所以后来受到指责与批判，并不在它有鬼魂形象，而在于被牵强附会地认为对“大跃进”以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有影射。5月6日，江青组织的点名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蛮横地指责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说贾似道是共产党国家的总理，李慧娘反对贾似道意味着人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戏剧界由此开始对“鬼戏”的批判。

整个文艺界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起来。4月，全国文联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批判修正主义，5月2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一种新颖独到的见解》，对音乐出版社出版法国著名作曲家德彪西的论文集《克罗士先生》提出质问：一、介绍的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在音乐界挑起了批判。9月，康生把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红河激浪》打成“反党影片”。

刚刚好转的意识形态领域又笼罩上一层不祥的阴云。

文艺界批判浪潮的复起，既证明了八届十中全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又适合反修斗争的需要。因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抓意识形态的问题。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道：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斗争，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意识形态也要抓，包括文化、

艺术、电影。如有都要抓一下。要推陈出新。老的尽是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都成了。水袖也不能表现我们的生活。要改变形式和内容。推陈出新，陈是封建主义，新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不是推陈出修，推陈出资。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尽是刘关张那一套，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二十年、三十年、

四十年以后，就不会有多少人看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两次谈话相比较，毛泽东这次的讲话有两点比过去明确：一是明确提出要抓意识形态的问题；二是明确地把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作为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明白地告诉了全党，要把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作为全党的一个任务来对待。可以认为，毛泽东这番话实质上既是对前一阶段文艺界批判的肯定，又是对以后继续进行这类批判的动员。

三 “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愈来愈不满意，对文艺部门的批评也愈加辞严色厉。1963年11月，他指责说：

一个时期《戏剧报》属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番批评比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言词还要尖锐，它点明了文艺界“牛鬼蛇神”出现的责任在文化工作的管理部门，而不是一般地批评文艺界。它表明了毛泽东要首先从文化工作部门抓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意图。

1963年12月12日，一份《文艺情况汇报》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这种《文艺情况汇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反映文艺界动向的简报，一般送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各协会的负责人参阅。为了便于毛泽东、周恩来了解文艺界情况，也分送江青和总理办公室。这一期的《文艺情况汇报》，报道了柯庆施在上海市抓革命故事会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见是说柯庆施好话的简报，江青主即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简报，对柯庆施之举未作评价，却批写了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前一段对文艺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所讲的问题主要也是戏剧界演古戏的问题。这个批示则把包括戏剧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艺术形式都视为“问题不少”，这表明文艺界各个方面的工作都令毛泽东不满。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收效甚微”，并认为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等于否定了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改造和建设的成就，甚至对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性质都发生了疑问。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毛泽东不是把这个批语批给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而批给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这一举动实际上把文艺界的问题提到了更大范围和更高的层次

上。

彭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深感震动，立即召见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彭真说：“这个问题要认真处理，要向政治局写报告，请少奇同志来抓。”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周扬在会上传达和阐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总结了建国以来文化工作的情况。他肯定了文化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问题。他认为，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少数人是不赞成这个方向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认识问题，彭真在会上说：“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方面有责任。拿我来讲……在整个文艺

上我没有注意。……我看，你们要振作精神，深入地搞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可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刘少奇也在会上作了讲话，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统一认识，坚决走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并整顿文艺队伍。

事实上，对毛泽东的批示，从中央领导人到文艺界都震动极大，而且并不理解，许多人想不通。自1957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以来，文艺界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强调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并且连绵不断地展开了大、小一系列的批判运动，而这一系列的批判运动绝大多数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扭曲了正常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因此，文艺界的问题不是右的问题，而是“左”的问题。这是大多数人对于文艺界现状的共同感受。可是，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文艺界的问题不是“左”了而是右了，文艺界的主要任务不是纠“左”而是反右，这个判断同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受大相径庭，当然人们难以理解。

但是，由于是毛泽东的批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人们都得贯彻和执行，甚至于是真诚地贯彻和执行。1964年春天开始，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开展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林默涵写了一个报告。周扬觉得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报告因此被暂时压下。不久，江青责问林默涵：主席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林默涵告知文联及各协会已经根据批示进行了整风学习，并写了一个总结报告草稿。江青又向林默涵追要这份报告。同前一次一样，江青又把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送交了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又作了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番批示更令人震动。前次批示只说到“问题不少”，这次则点明这些问题是“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应该说是特别含意的。如前所述，从1960年底开始，文艺界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调整，这些调整的政策同毛泽东的认识和主张有种内在的矛盾，因而并不为毛泽东所满意。在他看来，这些调整给修正主义的滋生和泛滥打开了绿灯，所以他才认为文艺界在“最近几年”“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正因为这样，文艺界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调整停滞下来，不能再深入展开，甚至已经取得的调整进展还发生了再次倒退的情况。

根据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告一段落的文艺界整风重新开始，一直持续到1965年后。同前一阶段的整风不同，这一阶段的整风着重对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进行检查和批判。因为当时估计文艺部门的某些单位已经被资产阶级夺了权。1964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一个汇报时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

半？还是大部不在我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这次整风点名批判了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文化部负责人。整风结束后，中共中央改组了文化部领导班子，免去了齐燕铭、夏衍担任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与文艺界整风的同时，文艺界对一批文艺作品和文艺界人士的批判也如火如荼，自称是文艺界“哨兵”的江青，颐指气使，指责舞台上尽是牛鬼蛇神，诬蔑中央美术学院“烂透了”，并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球迷》、《两家人》、《兵临城下》、《聂耳》等影片统统打成毒草。没有一部理论著作的“理论顾问”康生也点名攻击影片《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为“大毒草”。

对文艺界的大批判，毛泽东自然是关注的。1964年8月14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随后，一大批电影故事片和戏剧被公开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它们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李慧娘》、《谢瑶环》、《三家巷》、《苦斗》等。

毛泽东既重视“破”，也关注“立”。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之后，为大力创作和表演现代戏而召开的，周恩来亲自抓了这件事，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直接组织。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参加大会，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毛泽东在此期间观看了《智取威虎山》等戏，并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如果说两个批示表明了毛泽东的对演旧戏的强烈不满，那么观看《智取威虎山》则向人们表明了他对创作和演出现代戏的肯定与支持。

旧戏之所以为毛泽东所不满，并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其内容。他对旧戏表现“上层人物”，表现才子文人十分厌恶，他希望戏剧多反映“下层人物”，反映种田的、做工的和打仗的，多反映“大老粗”。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这一文艺创作的主张，是他政治观念在这个领域的延伸。在“官”与“民”、“智”与“愚”这两对范畴中，他历来鄙视前者而看重后者，他多次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种鄙官贵民、轻智重“愚”观念，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也有其片面的地方。这一思想在他早年思想中已有表现，而在晚年已逐步形成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并渗透到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这种观念的原因，既有毛泽东本人社会生活经历方面的，也有他后来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当然，这种理论方面的原因既有毛泽东在理解上的失误，也有理论上的某些个别的局限性）。毛泽东这种观念或许也可以做两方面的分析和评价，但是它对其晚年文艺思想的影响，却

是消极方面超过积极方面。这种负面的影响表现在：大大限制了创作题材的选择范围，创作和表演上形成固定的公式与概念，文艺创作和表演成为对政治的图解而缺乏艺术魅力和艺术感染力，等等。

四 山雨欲来

1964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项晴”的文章，题目是《“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当天，康生请江青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看。过了三天，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在毛泽东面前提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合二而一”的文章。毛泽东说道：“看了。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就是讲阶级调和吧。”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从这时起，文艺界的批判之火开始向学术界蔓延，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

“项晴”的文章是康生指示写的，作者是由关锋等人组成的“反修哲学小组”。这是康生搞的一个阴谋。

“合二而一”的观点是哲学家杨献珍提出来的，他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曾长期在高级党校从事领导和教学工作。他认为，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后来，他注意到明朝方以智的著作《东西均》里有“合二而一”的提法，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的说法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达，“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说法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达。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讲述了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既讲了“一分为二”的表述，也提到“合二而一”的说法。

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员艾恒武、林青山根据对杨献珍观点的理解，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文章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文章认为：“事物是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事物本来是‘合二而一’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事物。”文章说：“用什么方法来分析。研究‘合二而一’的事物呢？这个方法就是‘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正因为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一分为二’，这是普遍的。”文章说：“我们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事物，认识了‘合二而一’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就要根据客观事物本来的规律来制定改造世界、办理一切事业、处理一切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等等，贯彻到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去，推动事物转化、发展。”艾、林的文章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

艾、林的文章在哲学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是一个可以探讨和争论的学术问题。但是在对毛泽东个人迷信日甚一日的年代里，“合二而一”的提出无疑被作是对领袖尊严的触犯，甚至被视作是对领袖思想的歪曲与抵触。还要看到，60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中国共产党正在尖锐地批判苏共的一系列主张和观点。特别是批判苏共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所谓“阶级调和”的观点，而“合二而一”似乎正是强调“调和”，因而被认为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有思想上的沟通与联系。事情的微妙还在于，当时“一分为二”被人们当作“斗争哲学”来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化，“合二而一”则有同“一分为二”

相对抗的嫌疑。

因此，“合二而一”的观点一提出来，马上受到一些人所指责。而最善于在阴暗角落里“观察”阶级斗争“动向”的康生，更像是瞄准了“猎物”一般。他很快就组织了前述的反对“合二而一”观点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颇有用心他说：“‘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当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摸清了毛泽东对“合二而一”的态度之后，先是玩弄“引蛇出洞”的阴谋，在报上登一些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然后大打出手，掀起一场对“合二而一”的观点及其提出者的围剿。一时间，报纸杂志批判“合二而一”连篇累牍。这一完全属于学术探讨而且本来应该成为学术争鸣的争论，从一开始便被康生导演成一场政治批判。由康生组织人写的、在1964年第16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说得非常直露：

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文章说：

为了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相适应，我们党在报刊上加强了关于“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

可是，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

这场哲学上的论战是由杨献珍同志这样挑起来的。文章还说：

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

1965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杨献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等职务。

学术界的批判还不止是在哲学领域。

1964年下半年，经济学界搞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思想的批判。50年代末60年代初，孙冶方针对当时经济管理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要重视计划经济中的价值规律；提高经济效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经营管理的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要提高国有资产折旧率，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等等。孙冶方的这些经济观点，是正确分析中国经济体制运行中的弊病的结果，它对于改进经济工作、改革管理体制。纠正“大跃进”以来忽视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康生对孙冶方的经济观点大加挞伐。1961年，正当国内经济学界就价值、利润、奖金、企业自主权等问题进行讨论时，康生曾对孙冶方说：“听说你在经济学上有许多新的观点，可以打报告嘛！我负责给你转上去。”当康生得到报告之后，又像是抓到了批判“靶子”。当1964年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之后，又在这年下半年掉转枪口，把火力对准了孙冶方和他的经济学观点。60年代初，苏联理论界进行了关于商品生产、利润以及物

质利益等问题的大讨论，利别尔曼等经济学家主张强调利润的作用。因此，孙冶方的观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康生说孙冶方“比苏联的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并将其报告给了毛泽东。

1965年，历史学界批判了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历史观点。60年初，翦伯赞针对当时历史学研究中的某些片面观点，指出这几年“史学革命”的后果“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他主张，历史研究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合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翦伯赞还就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发表了见解。他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些主张，应该说是正确的，值得重视的，而一些关于具体历史问题的见解，完全属于学术探讨的范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进行学术争鸣。

但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也遭到了批判。1965年底到1966年春，戚本禹连续发表文章，批判翦伯赞。戚本禹说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现实阶级斗争在史学界的反映”。翦伯赞同杨献珍一样，实际上也是被看作触犯了当时盛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当时被奉为“经典”，谁触犯了就难逃被讨伐的厄运。而这一点在毛泽东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无怪乎，当1965年12月戚本禹第一篇没指名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的确，对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的风风雨雨，毛泽东是肯定和支持的。从1962年以后，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了阶级斗争方面。当然，他仍未满足于意识形态领域所抓的阶级斗争，他在继续思考。一场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更大的“阶级斗争”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第八章 哲人睿思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对哲学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偏好。他刻苦学习、勤于实践，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主观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后，他更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指导，去观察、思考他所遇到的革命、战争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随时把各种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从青年到成年，尽管哲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却始终保持着对哲学高度重视、精心研究和自觉运动的习惯。

一 “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

建国之初，面对着艰巨、繁重、紧张的革命、恢复、建设以及抗美援朝等项任务，毛泽东没有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各项工作的关注。他认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建立在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才能是巩固的；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尽快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适应和推动社会所发生的极大变革。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又是他所特别注重和强调的一个方面。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让他们（指知识分子——作者注）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认为，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而这项工作以往做得太少了。经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和具体指导，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论的热潮。

1951年5月和1954年10月，毛泽东还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胡适思想的批判。尽管这两次批判出现了一些偏颇，造成了明显的消极作用，但就毛泽东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通过这种讨论和批判，在知识分子中进一步开展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树立和普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他所提出的这些任务和目的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任务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了。

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促使更多的干部、党员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处理问题，党中央于1955年3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要求：“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从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矛盾，而在于矛盾性质的根本不同并由此决定的解决矛盾方式的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能由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还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特征。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

根据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中肯地批评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此外，毛泽东同年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的讲话中，也多次提到了这一观点。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突破了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模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还在于他进一步研究、确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和发展规律。这一认识成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已经不止一次地明确地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矛盾问题。例如，在他亲自主持讨论和起草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已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一些思想。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的这一思想迅速发展、成熟。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之后，他写道：“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论述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各自不同的内涵、外延及某些特点之后，他又分析了解决两类矛盾的方法。“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他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对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是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毛泽东又把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早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提出来的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他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1)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用正确方法解决两类矛盾的重要性。“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12)但是，“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13)

在当时，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发展水平来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的理论都处于领先地位。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整个国际共运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及时地把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他在

经过一番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所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他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次成功的尝试。

在经济建设方面，他用辩证法分析了国民经济中的四种关系，重工业、轻工业及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及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对于这四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关系，毛泽东不仅明确了它们之中各自的重点，而且特别论述了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转化以及通过辩证的转化来突出重点的方针、方法。例如，毛泽东不仅肯定了“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14)而且进一步指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想稳定地发展重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从而“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一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15)这种方针、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几种关系。例如，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如果你真想要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就得降低军政费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如此等等。《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揭示了经济建设中的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论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指出，必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16)他还谈到：“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7)在论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他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的。”(18)这几种关系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19)对哲学的精通和偏爱。使毛泽东举重若轻地把经济建设中这些复杂、微妙的关系概括为哲学上简捷明了的本质联系。此外，《论十大关系》还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诸如汉族与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与非、中国和外国等一系列关系，在分析这些关系时，毛泽东一般都没有进行多少细节上的、技术性的论证，而主要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宏观上揭示了这些因素和关系间的辩证联系。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断，对于全党在具体上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初次成功的运用和重大的发展，它不是一本哲学专著，但其中对哲学原理的阐述特别是高超的运用，使它当之无愧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当时国内外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针对苏联理论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需要革命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甚至是在全世界都消灭阶级之后，仍然存在革命的思想。“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20)这里，毛泽东已明确意识到，他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他甚至已把这种革命理解为改革。尽管如此，他还是更喜欢使用革命这个字眼，因为革命所蕴含着的爆发、飞跃，发展、进取、消灭、创建等精神和意境，鲜明、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的一些本质特征。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仍然存在革命的思想，反对了在国际共运中曾一度

广泛流行的否认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仍然需要革命或改革的形而上学观点，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一思想仍是初步的，不完善的，还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例如，或是把革命理解为社会主义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的改革，或是把革命理解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进行革命的思想不久就产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苗头。

在毛泽东上述讲话三个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谈到，虽然所有制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进一步指出：“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1)二十多天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2)由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革命发展到断定在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没有真正解决，这反映了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当然，这种发展趋势还只是初步的。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在探索社会主义矛盾体系时，毛泽东虽然冲破了一些禁区，探索、研究了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重大的、具有非常直接现实意义的问题，他却没有明确和肯定的论述和判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已经提到了“向自然开战”，提到了我们目前的根本任务已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某种方式正确地表达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对于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这样的表达还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在党的八大上已对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种表述的不足就更为明显了。这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曾对主要矛盾原理有过相当出色的论证，并早已习惯于用这一范畴来分析各种事物的人来说，很难说是一种偶然的疏忽。从以后的发展看，毛泽东对八大和当时苏联理论界有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看法并不满意，而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没有形成，1957年右派运动之后，他初步形成了另一种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到60年代初，他最终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除了以上诸方面的内容外，毛泽东还阐述发挥了唯物辩证法中的另一些规律和范畴。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对社会主义矛盾体系探索及对苏联理论界一些形而上学的观点批判的需要，由于毛泽东非常重视从哲学上统一全党的认识，也由于他对哲学的重视和偏爱，他对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几乎是逢会必讲辩证法，著述不离对立统一。在这些讲话和著述中，毛泽东根据实践的需要，反复阐述了唯物辩证法中的一些重要规律和范畴，在阐述中还多有发挥。其中，他讲得最多的是对立统一规律。

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23)在列举了自然界中的一些例子后，他又说：“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24)接着，毛泽

东话锋一转，指出：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有很多不同，对苏联的一些做法，我们是不赞成的；而我们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不少，其实中国和苏联的东西都是可以分析的，都是两点，不难看出，毛泽东这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目的在于从哲学世界观上提高党内外各级干部的水平，用辩证的思想看待苏联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发展对立统一学说的问题。他说：“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单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25)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且要补学一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为不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他反对禁止人们跟谬论、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认为这会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他批评了斯大林的一些哲学思想，认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26)他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27)

在这里，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这样集中的论述和发挥，有着十分现实和重要的目的——为“双百”方针提供理论依据。“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内一些人感到不解，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示怀疑。认为是“右”了。为了解除这些疑虑，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用了很大篇幅专门论述列宁有关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明确指出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28)出于这样一种目的，他在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中，着重强调了事物总是存在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真理与谬误，香花与毒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都是如此。所以，“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改革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的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29)不论是从哲学本身的角度看，还是从用哲学观点论证具体方针的可行性来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都是成功的，正确的。

毛泽东不仅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性和普遍意义，而且在论证中实现了列宁的遗教：解释和发挥辩证法的核心。从创立体系的角度来看，他在这里的贡献或许并不突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的背景，考虑到他在这里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视、强调和精辟论述，特别是考虑到他把这一规律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那我们就应当承认，对于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有出色的解释，也有精彩的发挥。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and 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

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30)接着，毛泽东由此引出了他所要论述的重点。“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31)

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时，毛泽东强调要研究、宣传和普及辩证法；在辩证法中，他又特别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核心。这种做法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准，为探索社会主义时期一系列新矛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也为依据社会实践丰富发展唯物辩证法开辟了正确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出发，毛泽东还研究和论述了关于矛盾转化的原理，关于调查研究中的认识论原则以及平衡与不平衡、相对与绝对、波浪式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容及关系、斗争的绝对性、民主问题等。由于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开始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认识和处理在这一转折关头国内以至国际上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所以毛泽东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探索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辩证法。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对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如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以及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强调与发挥。但他也有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及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上。

三 破除迷信与不断革命

1957年整风反右之后，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该而且可能把党的工作重心及时地转到经济建设上去，向自然开战，在不长的时间里把我国经济搞上去。适应发动和指导“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哲学思维的重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特别重视和强调的一个思想，他用以作为发动和指导“大跃进”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是有关反作用的思想，关于反作用的思想，其中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意识形态对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反作用。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和全党都认为，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阶级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它不仅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大大地改进了党的作风，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和建设热情。1958年：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比过去八年都看出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他又说，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现在做到了，也有信心了。同月31日，他在一篇文章中讲了同样的内容。“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又取得基本的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力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2)1958年4月15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兴奋地写道：“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33)毛泽东不切实际地估计了整风反右的结果和影响，轻信了反右运动后由于党内外民主受到严重损害而产生的假象。然后，他又根据广大人民群众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和生产热情，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反作用的原理，预料必然会有一个生产高潮出现于革命高潮之后。用他的话来说，大跃进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34)

中国革命是在许多物质因素非常薄弱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为取得革命的胜利，全党和毛泽东都非常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精神力量的作用，这些成功的经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有关主观能动性、精神反作用的理论又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过极大的、积极的影响。三大改造期间，毛泽东又进一步运用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是，也应看到，与此同时，他在对“反作用”的认识中已出现了一些绝对化、片面性的苗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基本方面，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整个社会的改造具有最终的、决定性意义。1958年前后，他进一步认为，可以通过提高人民的觉悟，先改造生产关系的方法，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人们的觉悟越高，生产关系越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这种认识会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如它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重视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但是这些合理的因素也因被过分地强调而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偏颇。根据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原理，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即“思想统帅”。毛泽东认

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项具体工作很多，但作为党的各级领导，首先应当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好了，就能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1958年初，在一次会议上，当听到发言中有人说对双轮双铧犁能不能用有争议时，毛泽东插话说，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他反复要求全党凡是讲问题首先都要讲思想，指出以政治思想工作带动业务工作是党政军普遍适应的方法。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对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表示不满。他反问说，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他认为，全面的提法应当是又红又专，政治应当是各项工作的统帅和灵魂。他反复要求全体党员、知识分子要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共产主义觉悟，专就是科学技术。怎样做才能红，才能保证思想的统帅作用呢？他认为首要的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有共产主义理想，要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强调先进思想的统帅作用，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巨大优势。毛泽东把这些传统和优势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这是他对当代国际共运的伟大贡献。在我们运用和坚持这一重要思想时，也应注意到，首先我们必须保证作为统帅的思想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的思想只能在全党集体的实践中形成并受到检验。其次，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也有一个合理的实践界限，也有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它必须与物质利益、经济要求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融为一体，才能实现。而正是这些方面，却多少被毛泽东忽视了。

在1958年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破除迷信和解放思想”的问题。既然思想是统帅，那么，发动“大跃进”首先就应解决思想问题，在当时，他认为这些思想问题主要是保守思想、教条主义、精神不振、迷信权威等等。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和同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用了很大篇幅，援引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事例论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他批评党内一些同志精神不振作、思想不解放，像贾桂一样。他要求全党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要有活跃的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

破除迷信的范围很广，按照他当时的说法，主要是破除对苏联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产阶级教授、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老年人、权威、名人、洋人、古人的迷信，等等。例如，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会，实际上我们做的已经超过了马克思。对科学家不要迷信，要相信又不要相信，对工业机械化也不要那样迷信。不要怕资产阶级教授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怕老年人和名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古今中外这种例子多得很。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对苏联的迷信要妨碍贯彻正确的建设路线、如此等等。

毛泽东这样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意义，直接原因是他有感于党内许多人思想上还有不少框框，对“大跃进”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和保留。而在思想深处，这反映了他哲学思维层次上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等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力量，有了先进的思想和高度的觉悟，就能顺利地解决各种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产生伟大的物质力量，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向自然开战，掀起生产和技术革命高潮之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因为它是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前提。

毛泽东关于反作用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根

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验，他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同样予以高度重视。三大改造时期，我们已经很明显地看出他对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视。当时，他所关注的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大跃进”期间，我们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他对生产关系反作用的重视，但这时他所强调的顺序变为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所有制和分配关系。1957年年底至1958年初，毛泽东在一些讲话和著作中谈到，1956年的三大改造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但在相互关系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这主要是指干部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现在问题发生在相互关系上，所以要抓住两头带中间，整风就是要整这些关系；如果整好了，人民就会心情舒畅。他希望通过整风使干部去掉官气，反掉官僚主义，使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他认为整风基本上解决了相互关系，使工人觉得真正解放了，因而生产情绪大增。而如果不经过整风，不解决相互关系，则国民党的作风和老爷气还会大量存在。要想“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因为渴望实现平等民主的社会理想，在那段时间里，他对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认为资产阶级法权造成了上下级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引发了人们的名利思想，地位思想。所以，破除法权，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完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他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出比较激烈的态度。但很快，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认为在现阶段法权还“不能完全破除”，所以要破除一部分，保留一部分。

在所有制问题上，在三大改造时期，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谈到了大社的优越性。他认为合作化的规模大一些，公有制的程度高一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他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建设和规模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创举。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曾说过，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社增产，农业牧业都如此。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对高级社的规模和性质也不满足了，纷纷要求向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过渡。毛泽东根据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根据他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理论的理解，对这些要求曾一度采取了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尽管他还有所保留且时间也不长。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而大就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力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对于人民公社的这些特点，他还进一步发挥说，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渔盐林牧副，人民公社都有，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搞掉了自留地，是逐步去掉资本主义残余，等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批评党内一些主张应增加社员自留地，耕畜要以私养为主，主张大社应变小社的人是向富裕中农让步。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特点的概括和评价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他当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他说，在理论上，他肯定了“共产主义，一个条件产品要多，一个条件思想要提高”。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公有制的程度越高，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因素越多，就越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公有制产生的主要原因和根据，则是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群众性的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公社是自发的……我们只是提倡破除迷信，敢想敢做，人民就自发搞起来了。”(35)他还谈到，由于1957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及1958年相继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了大跃进(36)。总之，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是意识精神的产物。至于这种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赖以产生的生产力水平，则往往被忽视。

在分配关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他对工资级别多、差别大表示不满，认为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以及争地位、争取要加班费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37)他希望逐步增加分配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如在农村公社中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以至逐步过渡到全部供给制。他认为进城以后，以薪水制取代供给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一种倒退，导致党内外一些人争待遇，比地位，追求享受，发展了个人主义，破坏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培养出来的民主传统和作风。他对重新实行供给制寄予很大希望，认为这样将大有利人们相互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有利于干群打成一片，有利于消除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但他也有比较冷静的一面。就在他对供给制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他也指出：“不要马上提出废除工资制度”，“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38)等等。总之，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希望更多地增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素，他相信这样将会提高人们的觉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全党、全国人民经过整风反右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又为这些因素的增加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及三大改造迅速完成的实践，根据自己目睹的“大跃进”高潮迅速出现的现实，进一步发展了他以往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他认为，依靠先进的思想和革命热情，可以在短时间里迅速有力地推动生产关系改善和发展，使之增加更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生产关系的这种变革，又将有力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这里，我们感觉到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反作用的强大力量，相形之下，生产力本身具有的那种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就逊色了。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达到顶点。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解放思想的号召迅速变成全国人民狂热的行动，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过火过急现象的出现，他对自己上半年的某一些过头的提法也有了一些警觉。在此之后，在一些具体问题和提法上，他又对以前的一些观点作了一些重要修正。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突出强调的另一个思想，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毛泽东毕生理论与实践活动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方面，而群众运动则是他整个革命生涯中经常使用的工作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是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反映，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场面和成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和印象。“大跃进”期间，他又把这种观点和方法直接用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大跃进”的实践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有关理论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谈到“大跃进”时指出：“方针就是

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群众。”(39)在同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强调“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40)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而这正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依据和保证。他说：“我们要先跟人民，人民的干劲，人民的多快好省，人民的许多发明创造，人民的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等等；工业方面的突破定额、发明创造……。尊重唯物论就要先跟人民。比较正确、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的要求……”(41)。他认为，要贯彻群众路线，就必须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各项事业，而1957年出现的大鸣大放正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它为群众广泛地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创造了一种新形式，使他们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他对比了中苏两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认为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我们中国的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他对苏联建设中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说：“那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42)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不重视群众，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而这正是他们在理论上忽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结果。

为了把群众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改进干部作风，建立于群之间平等的相互关系，要革除一些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结合1956年的“反冒进”，多次提到不要给群众泼冷水，不要反冒进。他对各地在“大跃进”中发生的许多过急过火的做法及其所带来的严重损失，都采取了相当宽容和谅解的态度，担心严厉的批评会挫伤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例如，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高指标，他表示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数、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而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观潮派、稳妥派和秋后算帐派，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时发出一些严厉的批评。

在“大跃进”的发动和高潮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是毛泽东讲话最多的问题之一。虽然这些言论并不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但却无不反映了他有关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和思考，无不反映了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和贯彻这些理论的努力和愿望。无论是在哲学思维的层次上，还是在一般工作路线方法上，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的思想，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大跃进”期间，毛泽东还多次阐发和强调了关于趁热打铁，不断革命的思想。

不断革命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速度和状态及发展动力等观点的总和。其基本思想在于，不论是一件具体工作，还是一项规模巨大、历时长久的社会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其间断性、阶级性，更要注重其连续性、不间断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处理各革命阶段、各战役、各项工作之间时间上的联系时，就已体现出这一思想的某些内容。解放后，在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的过程中，不断革命、趁热打铁的思想成为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并受到高度评价。“大跃进”期

间，结合着对三大改造经验的总结和对整风反右、“大跃进”实践的思考，毛泽东有关不断革命的思想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1958年1月，毛泽东比较系统、集中地谈到了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他谈到，建国以来我们所完成的一系列任务，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夺取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土地革命，再接着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革命，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特别指出，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气力去破坏，如果在这几个过程中“断了气”，在间隔，就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扎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他提出了新的不断革命的任务：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紧接着又进行了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虽然不可能一次完成，在今后仍然要经常进行，但今后的重点要放在技术革命上去了。这就是说：“从1958年起，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43)这样一个不断革命的思路，虽然从时间上看是太快了，但从其内容看，从其所反映的发展趋势看，却是正确的。

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上，他从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都是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如在合作化问题上，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这里，他侧重于不断革命中的革命一面，他主张快，主张高速度。这是他对迅速完成的所有制改造经验的总结。在三大改造的后遗症尚未暴露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些经验总结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从更普遍的意义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工作应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行，今后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44)1958年1月底，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专门从工作方法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革命和打仗一样，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的任务的问题上去了。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把这种方法上升到思想方法和理论的高度。他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45)他又以建国后的实践为例论证这种不断革命。“……1949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就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接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46)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谈到了他所理解的不断革命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湖南人常说的：“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这就是说，在这种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只要大方向有了，其他诸如方法、政策及一些阶段性目标可以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不断加以解决，关键是要首先干起来了，不能停顿。这里，他对不断革命的论述，已超出了具体工作方法、策略的范围，进入了一种哲学思想的境界。它具有更加普遍的性质，因而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对不断革命的根据和原因，当时他也曾多次提及。其主要之点在于，如果放慢了革命的步伐，在两个革命阶级之间停顿过长，有可能给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等敌对势力的发展以可乘之机。如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在解放后，革命有所停顿，搞了七八年民主主义秩序，结果出了富农。而在国内，也有类似问题存在。如在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社会主义改造的干劲不如新区，

其原因就在于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化，群众还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而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出来的。(47)这里所说的一些现象，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而毛泽东对这些现象原因的分析，虽然有一些片面性，但也有一些合理的见解。

在这一段时间里，在不断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论述的侧重点，一是论证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不断革命的必要性、正确性；二是用这种观点和建国后的实践，说明在整风反右之后，全党应不停顿地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这与他以后的继续革命思想有两个很明显的不同点：第一，在内容上，后者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而前者是强调要不停顿地从社会革命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的技术革命上去。第二，在速度上，当毛泽东讲到由社会革命转到技术革命时，他强调的是生产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高速度；而当他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内容时，他强调的是这种革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如果这种长期性估计不足就会导致右倾的错误。

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辩证法的重视和浓厚兴趣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期间的诸多讲话中，他几乎是凡事必讲辩证法，逢会就讲对立统一。他不仅自己讲，而且反复要求全党都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辩证法。尽管每次谈的内容都算不得系统，但因谈论的次数多，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因而也就比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辩证法的许多方面。可以说，这是继《矛盾论》之后，对辩证法又一次比较集中、系统的论述。

在辩证法诸多方面中，他谈得最多、强调得最多的一个内容，是对立统一规律。1956年至1957年间，毛泽东也曾多次谈到了对立统一，发表了许多见解。“大跃进”期间他依然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则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更侧重于辩证法在各项具体工作中的运用。

毛泽东自觉地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和处理“大跃进”中的各种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又从不同方面对这一规律本身发表了不少议论，这些议论有些是相当深刻、精彩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指出，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可以促使落后赶上先进。接着，他指出了这种比较的哲学依据——对立统一规律。“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他还说：“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48)

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是他当时谈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他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之一。他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49)当然，在这个对立统一体中也有主次，即“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把政治放在第一位。”(50)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谈到矛盾问题和对立统一关系时，常常讲到矛盾双方的关系是“一个吃掉一个，一方消灭一方”，这是战争年代经常遇到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种类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开始注意到这种关系中的另一些类型。例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农轻重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方吃掉一方的排斥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也

是如此，这两者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其特点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与技术结婚就产生共产主义。”(51)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个重要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的优越性、全面性，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但是，如果把政治的统帅作用无限制地加以夸大，或者，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为纲”，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还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急与缓、劳与逸、多快与好省等诸多关系。如果只从具体事物本身来看，他的这些论述无疑是精彩的、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大跃进”在全局上急于求成的失误，那么，他在这些具体问题上的正确观点便不能程度不等地被打折扣。

在对立统一规律中，毛泽东讲得最多、用得最多，而且是最能反映他个性和领导风格的，是有关暴露对立面以至树立对立面的思想方法。

早在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52)1958年3月，他又谈到，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意见的，这样做可以把问题提出来，暴露对立面，从而给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53)通过争论，暴露事物自身矛盾。这是一种按照辩证法规律积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关于揭露对立面的思想还不止于此。当时他还经常谈到要通过设置对立面和对立面的斗争，从而推动人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他表示他自己历来是主张对立面的，认为不论做什么事，四平八稳不行，要通过对立面逼一下，才能使人们在认识上警醒，下决心解决问题，这就是有个对立面，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54)他还举例说，技术革命是逼出来的，世界上好多东西是逼出来的，整风是逼出来的，有了对立面就逼出来了；你看拷红，用家法打红娘逼出一篇道理，红娘压倒了老夫人。”(55)既然对立面能起到这样积极的作用，所以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设置对立面这样一种方法。

1958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各部设政治委员时谈到了这一方法。他说，设政治委员是设置对立面，逼部长进步。(56)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到，所谓比较法，实际上也就是设置对立面。(57)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对这一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说：“要设置对立面，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右派在社会上是存在的，他们想说话，我们就让他们讲，让他们大鸣大放。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设立对立面。”大概他也感到了“设置”一词可能引起的争议，所以他特别强调了对立面的客观性。“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随意地设置和建立的。”(58)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即原来没有对立面，是人为设置的，如水库、水坝，这些东西原来是没有的，是人为的，人造卫星也是人为的，这也是设置对立面。当然，这类对立面必须是按照自然规律才能设置起来。显然，他这里所说的人为设置的对立面是指经过人类加工创造的与自然物相对立的物质存在。

从重视对立面到暴露对立面再到设置对立面，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刻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他相信对立统一关系是认识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关键。他在对立的关系中认识事物，并自觉地把这种关系当作解决矛盾的有利条件。对他来说，对立面不仅是一个认识不认识、

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积极主动地加以发现并利用的有利因素。设置对立面的思想是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具体问题、使之具体化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发展，是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主动的工作方法的哲学依据。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好，这种提法也隐含着另外一种可能：在设置对立面的方法中，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是不是也能得到相应的重视？是不是会导致把对立和斗争在认识事物、改造事物中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特别是“设置”一词，可以因人，因事产生多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在实践中导致极不相同的结果。

与毛泽东关于对立面思想同样生动、深刻突出的，还有他有关转化的思想。关于转化，他在《矛盾论》中曾有过经典的表述，即“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他的对立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而且，在矛盾的同一性中，这是较矛盾相互依存更为重要的一面。“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59)民主革命时期，他曾成功地将这一规律运用到军事指挥艺术、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他对转化理论的重视和运用也就更为突出。如前所述，《论十大关系》就是他运用转化理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次成功的、杰出的尝试。这次尝试反过来又使他更加重视对转化理论的研究与运用。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判了苏联《简明哲学辞典》中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它只看到了对立面的对立和排斥，而不承认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和转化。他以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为例，论证这些对立的事物通过斗争而相互转化。在这里，他对转化理论的阐述与发挥，目的在于为“双百”方针提供理论依据，说明“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60)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用了专门一节来研究一个只有用转化理论才能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他认为，当时在国内外出现的一些乱子这类坏事有两重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是因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61)他不仅论证了转化的普遍性，而且指出：“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具体他说，就是“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他又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一切乱子。”联系到当时“多事之秋”的具体背景，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解释和发挥，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可能在国内外发生的各种动荡和事件面前，处变不惊，应对裕如，积极引导事态向有利方向发展。

在此之前，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一件与此相适应的转化类型。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要想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吗？那就请多研究一点它的对立面，把研究和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当作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条件。毛泽东转化理论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他对坏事变为好事可能性的肯定，还在于他把坏事本身当成向好事转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认识是他哲学思想中一个很具特色的内容，集中地反映着他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能动性、进取性。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兴趣更浓，应用的范围也更广。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他从当时引起普遍注意的一个问题入手，谈到了转化问题。他说，苦战与休战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互相转化的。由此他引申说，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团结，搞一搞就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他还说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在列举一些相互转化的例子以后，他们觉得意犹未尽，提出：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这样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这样强调转化问题呢？他接着作了说明：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可见，毛泽东对转化理论的重视与宣传，是他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反对拘泥于本本的教条主义和对“大跃进”心怀顾虑的“右倾保守主义”。应当说，转化理论的确有助于克服形而上学僵死的思维方式，有利于解放思想。如果当时毛泽东对党内思想倾向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党内当时确实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潮，那么，用转化理论来活跃思想的思路就是对症下药。但如果对当时党内思想倾向的判断是不准确的，那么，这种主要是为了“破除迷信”、针对着“右倾保守”而强调的转化理论，其所起的作用就另当别论了。

1956年至1958年间，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他的转化理论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在许多场合都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即矛盾转化的最好时机、最有利的条件，是在矛盾双方的对立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或者是矛盾的一方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如让右派充分暴露、表演，这样才能教育人民，粉碎其进攻；错误犯多了，其后果和原因也就清楚了，向成功和正确转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存在严重问题的单位或地区，让它烂透了反而更易于解决矛盾，如此等等。这些思想和方法蕴含着辩证法的深刻精髓，在实践中也往往是行之有效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意识，使毛泽东始终具有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巨人气魄和风格。但是这种转化类型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些矛盾是不宜用这种“激化——解决”的方法来处理。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全党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曾多次谈到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础——认识论问题，值得深思的是，尽管他那样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调查研究，但在实践中，他却在某些问题和某些时间里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这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早在1958年初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谈到，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客观世界的

反映。在 1958 年 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指出，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赋的，不是生下来就有的，而是生下来观察了许多事物，才形成了概念，我们的思想只能是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来的，感觉材料是从客观世界来的，根据感觉材料又形成判断。

毛泽东很重视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指导实践，他在这次会议上又说，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先是理论来源于实践，以后理论才为实践服务，开头是没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才反映到人民的头脑中间，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头脑里面，才有了理论性的总结，客观规律才能反映到主观世界里来，我们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发展理论，指导实际，只能从实践中得来，不能从别的地方得来；老是不出门，闭上眼睛，离开了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体系来。接着，他又从理论领域转到具体的工作方法。他说，不论什么人，不管官多大，地位多高，怎样有名气，只要半年时间不向人民学习，不去接触人民，不去同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接触，也就不知道什么事了，就贫乏了。所以我们规定每年要出去四个月，去接触人民，接触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事，他们做的什么事，他们做的事情的过程如何，经过了哪些艰苦……。

他不仅论述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实践，而且谈到了人的思想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和测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和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是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会用不会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即使是对于他高度评价的总路线，他也认为应由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出，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已被实践证明了，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也谈到了同样的内容。他指出，这次大会制定的路线还要拿到实践中去证明。尽管当时他对形势的估计已很不冷静，但在理论上，他还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权威性。

他反复论述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意在从理论上武装全党，深入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他在谈论认识论时，更多地谈到了调查研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经常说，北京这个地方不产生任何东西，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也不出思想；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原材料产生自工人、农民，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他又说，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回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规，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64)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五条中，他要求“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则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为了解决干部深入实际的问题，他还根据当时湖北省委的创造，多次号

召党的各级干部要有各自的“试验田”。“试验用”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性的说法，实际上是指领导干部的试点，这种试点集调查研究、具体指导、解决问题、改造世界观等功能于一身，因而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工作。”

自1958年至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和纠正“大跃进”错误这两段在内容上很不相同的时间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习、宣传，都十分强调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他的这种努力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启示。“大跃进”期间，当毛泽东已经脱离实际的时候，他却又十分重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殷切地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这种十分矛盾的现象固然有认识条件限制等方面的原因，但它也说明，认识论问题、哲学问题，有时并不是只靠哲学本身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是只靠真诚的愿望就能实现的，希望实事求是和能够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回事，认识论的实现还必须借助于认识论之外的许多条件。包括许多具体科学、新兴科学的学习和运用。

如前所述，在这一段时间里，适应发动“大跃进”的需要，毛泽东广泛而又深入地阐述发挥了哲学领域里的许多重要规律和范畴。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在有关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另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态度，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

毛泽东不同意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经过整风反右，他终于在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确定为我国的主要矛盾。较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只谈两类矛盾、基本矛盾而没有明确指示主要矛盾的情况来看，他关于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的理论发生了明显失误。但从理论形式上看，却是较为系统、完整了，因为他明确指出了这个理论体系所不应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主要矛盾的提出，解决了一个矛盾，但又带来了一个新的、同样重要的矛盾，即主要矛盾与中心工作的分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已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在三大改造后，全党应将工作中心转到“向自然开战”方面去。反右后，他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对全党工作中心的看法却未改变。从1958年初起（特别是在1958年1月），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他曾多次谈到不断革命——即从社会革命向技术革命转变——的问题，多次谈到工作中心、重点的转移问题，但却极少提及他刚刚明确并非常重视的主要矛盾问题，两者恰成鲜明对比。

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在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说，我们不能老整风，目标是转向技术革命。在这次会上，他还说，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在整风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技术革命上来。在同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要求“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又说：“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经贸。”

这些言论表明，在当时，毛泽东明确地认为，在整风反右之后，全党的

工作中心应转到技术革命和生产建设上去。这是当时他所理解的不断革命的内在逻辑。他正是依据这样的认识发动了“大跃进”。不论“大跃进”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失误，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思想却是正确的、富于远见的。他当时还没有发现自己所确认的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之间的矛盾。他已经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但却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1958年4月，他曾谈到，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中心，带动其他工作。这里，他没有提出那个本来自然而然就应提出的问题：中心和纲是什么关系？我们曾经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未提主要矛盾而奇怪，现在又为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的关系而困惑。这种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产生了以后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可能。

理论上的这种不彻底性，成为导致1959年庐山会议上那场严重的错误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场错误的斗争反过来又发展了错误的理论。

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中断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错误地发动了对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1959年7月至1959年底一段时间里。在此期间，毛泽东改变了他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一些过火做法的看法。他不再说要当“右倾机会主义”，不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而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反右倾、鼓干劲”方面。这次急剧的、大幅度的变化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所提出的“斗争哲学”。

关于斗争性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已经作了经典的论述。在此之后，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斗争性占有比同一性等范畴更为突出的地位。当然，在他哲学的成熟期里，他并没有因对斗争性的注意而忽视同一性。这与斯大林只注意前者而轻视或否认后者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1957年前后，在毛泽东对斗争性的理解中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他非常注意斗争的绝对性、永恒性，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论述的同一性的相对性、暂时性却似乎没有加以进一步的探究，他注意到，在一般的意义上，唯物辩证法总是肯定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但却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这对范畴的相互关系又有其特殊的一面。例如，在以阶级对抗为主的社会中，矛盾的斗争性往往起着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以非对抗性矛盾为主的社会中，矛盾的统一性、同一性的作用就明显突出。而且，即使是斗争性，其内容和形式也与以往很不相同了。不是说他笼统地忽视同一性（例如他对同一性中的转化就特别重视），而是说他忽视的是矛盾双方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对平衡、相对静止这一方面，而这正与他对斗争性的理解密切相关。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把彭德怀等提出的不同意见当做一场“阶级斗争”，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这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五年社会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接着，他又把这一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看法上升到哲学高度。“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65)从字面上看，他这里使用的不是规范的哲学思维语言，但却很明确地表达出一个当时在他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

想——斗争哲学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直接实践来源是庐山会议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其理论根源，则是在矛盾斗争性的问题上，他由重视、强调发展到夸大。他使真理向前迈出了不应有的一步，从而使自己偏离了原来哲学的正确轨道。斗争哲学混淆了哲学意义上斗争范畴与社会政治生活甚至军事实践中斗争概念的界限，不适当地夸大了斗争性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或作用，而对矛盾同一性，统一性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相对稳定、平衡、互相渗透等范畴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忽视。斗争哲学的提出，也反映了毛泽东60年代以后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他更侧重于政治斗争，党内斗争，从被夸大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中汲取哲学发展的养料。他从错误的党内斗争中提升出来的这一哲学观点，反过来又成为更为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哲学依据。

毛泽东虽然发动了庐山会议上那场严重的党内斗争，并在会后开展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但他却没有因此再次全盘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与庐山会议之前仍有一定的连续性。例如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仍然对高指标持批评态度，表示对商品形式暂时还可保留，提到政治工作同必要的按劳取酬相结合，等等。

四 读书与沉思

有感于“大跃进”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毛泽东深感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理论准备的欠缺。1959年下半年，他建议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学习，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统一认识，总结经验。

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照例身先士卒，带头认真学习。1959年至1960年初，毛泽东与身边的几位理论工作者认真地阅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结合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边读边议，议论风生。使我们感到熟悉和折服的是，他读的是经济学方面的书。但在他的谈话中，哲学问题仍然占有相当比重。这位哲学大师一出手便把着眼点较多地放在了方法论方面。

谈话中，他比较冷静、全面地整理了建国以后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思想，其中涉及经济、哲学、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谈话使我们有可能看到，经过初步的反复和沉淀之后，毛泽东以比较系统、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基本思想。两次谈话均涉及到许多哲学问题，其中既有许多精当的论述，也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当时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轮廓。

关于哲学的功能，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哲学为政治服务。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660）哲学当然要为政治服务，特别是在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但它又不只是为政治服务。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它还要为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服务。

对于由于“大跃进”而引发的有关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争论。毛泽东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指出，思维与存在不能划等号，两者不能等同。“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它“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他主要地不是从本体论，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及这个问题的。他说：“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转化为事物。”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精辟地阐明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

对于唯物辩证法，他又特别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与此密切相关的，他还谈到：“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他批评了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谈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倾向。他指出：“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又说：“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又由此谈到：“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67）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主要是 在重复他以往的一些基本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唯物辩证法时，他并没有重申几个月

前在庐山会议上有关“斗争哲学”的观点，关于“斗争”的问题，他只是在一个地方一般性的谈了一下，这是他的疏忽，还是说明当时斗争哲学的思想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还没有最终确立？

结合着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感于“大跃进”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他还多次谈到了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似乎是有感于“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实践，他说：“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68)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不仅给人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也使人们感到特别亲切。虽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但当他比较冷静、比较系统地钻研社会主义经济学时，他还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到社会实践的限制。可惜的是，或许是理论上的不彻底，或许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并没有把这种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彻底地运用于对“大跃进”的分析与反思之中。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比较集中地谈到了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在社会发展中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认为，“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为什么生产力发展，反而不容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他解释说：“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去了”；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69)在这里，他已经很明确地表明，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和进行来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并不具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强调的那样重要的意义。生产力越落后，人越穷，才越能产生出革命的动力。而生产力越发达，资本主义影响就越深，革命就越困难。

穷则革命富则修的理论，是毛泽东对本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总结。这种总结有其科学的、合理的一面，如本世纪绝大多数建立过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原来都不是发达甚至是很落后的国度，贫穷所造成的尖锐、广泛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危机的确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这一思想就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和实践的正确概括。但是，这一观点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它把社会历史某一阶段，某一部分的经验绝对化，因而一方面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社会中的决定意义，另外一方面则不适当的提高了精神、道德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因为穷和富都是通过他们所由产生的精神、道德来作用于社会的。在此之前，他也曾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表述过这样的思想，例如在他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著作中。但在这次谈话中，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突出、明确，下面这段话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法国《快报》评论中说：‘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好。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

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70)

在谈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总结和发挥了他以往的思想，把突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为重点。在谈话中，他多次谈到：“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他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71)作为对中国革命、苏联革命的总结，他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深刻的。但如果因此忽视了从最终的意义上说，革命形势的造成以及革命的胜利，仍然是生产力一定程度发展的产物；如果因为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入社会主义，而忽视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那就片面了。在这里，他忽视了明确地区分在革命进程中的先后和在理论上谁最终决定谁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总之，毛泽东正确概括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如果把这种概括所抽象出来的先意识形态再政权再生产关系再生产力的顺序，当作应使意识形态比生产力更重要的根据，那就值得推敲了。

整个谈话显示了毛泽东一个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即对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精神反作用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应特别重视政治思想、阶级觉悟，在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如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72)这个正确的结论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在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注重人们物质利益的条件下，毛泽东重视政治思想、革命精神反作用的思想，对于我国社会长期、全面、稳定地发展，更显示出其深刻、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谈话中，他多次批评了教科书只讲物质刺激、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偏向，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广大劳动者，强调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强调政治挂帅的思想。这些有创造性的思想包含有许多正确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因素，指出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现现代化的优势和特点，特别是在他所说的“政治”还不具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时，更是如此。

当然，从当时毛泽东整个思想来看，他对反作用的强调已经出现了一些偏颇，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有些时候，把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例如在“大跃进”中。第二，把思想的作用与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当地对立起来。他批评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认为“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只靠机器不靠觉悟当然不行，但是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贬低人的觉悟的作用。第三，把政治思想工作与物质利益原则不适当地对立起来。他对教科书有一个突出的不满：“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的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他还说：“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只是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73)教科书中是否存在把物质

利益绝对化的错误姑且不论，但是结合“大跃进”的实践及他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将物质利益与政治思想对立起来了。

除了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外，毛泽东还多次谈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且显然，在一些谈话中，他的这种强调是有些“过”了。例如，他说：“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作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某一阶段的描述，他的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但因为当时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偏差缺乏了解，忽视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依赖关系，并因此进一步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绝对化，希望通过进一步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制水平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对人民公社化运动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到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他对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问题有了一定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初步的。在谈话中，他还认为“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这段话表明，经过1958年“大跃进”之后，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生产关系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关系在他的眼中，还是一个有些抽象的、带有一些道德色彩的概念。只要有了共产主义精神，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较高级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越先进，对生产力的作用就越大越积极。而私有制或农村合作化组织中的个体成份，还是被当作消极的、必须引起警惕的因素。“苏联集体农庄中，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这说明，他们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阅读教科书时，他也发现，苏联的农民比我国农民富裕，但他们那里个人副业却相当强。“比较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公有化程度却比他们那里高。”(74)他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但他却循着另外一条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结果，这个对比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苏联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

根据自己对生产关系的理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所不可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如个人副业），或强制解决但必须会以其他形式重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如包产到户），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认为是单干、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造不彻底的表现。在谈话中，他就把庐山会议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当作富裕中农私有观念对公社化的抵制。他有关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根源，一部分就是来自他思想深处对生产关系这种抽象的、道德化的理解。

在社会发展阶段及发展速度的问题上，毛泽东仍然坚持以往的观点。他对教科书中所说“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提法表示不满。“‘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又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的巩固下去。”对于东欧一些国家合作化搞得慢的原因，他的看法是，“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而我国则不然，“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的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75)

除了强调社会历史这种不间断的发展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这种发展

所具有的一种革命的意义。他指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批评道：“教科书中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76)从这些谈话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种性质和规模的革命；第二，但是还存在着革命，这种革命主要是指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的飞跃。他赋予这种飞跃以革命的意义，同时赋予革命以非常广泛的内涵，这反映了他对革命所包括的飞跃、发展、转化、质变等内容的向往。在谈话中，他曾多次表示对书的写法不满意，认为写得沉闷。但有时，当他看到书中出现“革命”一词时，便精神为之一振，用他的话来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对“革命”的这种偏爱，反映了他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一种积极进取，反对保守、停滞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断革命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当时，不断革命的思想并不具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我国当时所处发展阶段，谈话中，结合教科书中的论述，毛泽东的认识又有了一些发展。他说：“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但这个转变时期与过渡时期的关系如何，两者如何衔接，他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尽管“大跃进”已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但在此时，他却对“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很有文章可做”，起码说明满意的文章尚未做出，在过渡时期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审慎的、科学的态度。“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77)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他也曾谈到过“建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等问题，但却未对他们做出相应的解释。而在“大跃进”的急于求成的狂热稍稍降温以后，他开始谨慎地考虑这些问题了。他坦率地承认，对于他来说，这些问题也是有待研究和解决的。这种谨慎和探索的态度反映出经过“大跃进”的高潮之后，他在社会主义社会理论认识上的深化。当然，这种探索和研究还只是初步的，它们可能导致怎样的结论和结果，当时还是难以预料的。

在谈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反右派运动以后的观点，批评了教科书“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的缺点。教科书中有一处说，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他对此很不以为然，指出“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他还说：“教科书说，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完全不对。”在谈到我国的情况时，他重复了1957年的一些观点。“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他进一步指出：“1957年的斗争，1959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鉴于1957年特别是1959年的经验，他更明确地表示：“八大第一次会议的

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实际上，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就已改变了八大前后一段时间里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看法，但当时他的这种变化还只是初步的，还不太稳固。所以在1958年上半年发动“大跃进”时，全党的工作重点就放在技术革命和生产建设方面去了。他当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之间的巨大矛盾，而在庐山会议之后，当他再次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时，他的认识显然比1957年更深入、更明确了。这不仅在于他重申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而且在于他已经初步地把主要矛盾与工作中心联系起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推动各项工作的思想萌芽。例如，他说：“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78)

五 前进与曲折

——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从1960年起，“大跃进”与庐山会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严峻的困难局面使人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首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时期开始了。从这时起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随着调整方针的执行、实施，困难局面开始好转，党和国家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像以往一样，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哲学的指导作用。因为所要解决的问题人与以往已很不相同，为了从理论上指导这次深刻的转变，同时作为对这种转变的理论认识和反映，他的哲学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哲学思维的重点上。如果说1957年他哲学思维的重点是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对立统一和转化等问题，1958年强调的是反作用和不断革命的话，那么在调整时期，他哲学思维的重点则是实事求是。认识论，与此密切相联的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在此期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几乎在所有谈到纠“左”，的场合，毛泽东都谈到了认识论中的问题。例如，1960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上，他对形势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会上所作的《十年总结》的报告中，在批评了高指标后说：“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79)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他还谈到，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机械唯物论就是一次完成真理。他还特地谈到写作《十年总结》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主动是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要主动，就要对客观实际认识准确，要盲目性少一点，自由多一点，就是主动多一点，被动少一点。在这次以解决高指标、高速度为主要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在理论上的重点始终放在认识论方面。除了以上所引的外，他在会上的一个批语中还说：“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80)如果考虑到他这样集中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背景，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鲜明的印象，即在他再次着手纠正“大跃进”错误之初，就已十分明确、突出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当作这次纠“左”的主要理论依

据。这一对症下药的科学选择，是调整时期各项工作顺利展开的理论保证，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把纠“左”与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联系起来不是偶然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不仅使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急于求成的想法，也促使他进一步思索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及克服困难的正确途径。这种思考的初步结果，是他痛感到几年来失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全党（包括他本人在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忽视了调查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1961年1月中央的一次会议外，他指出，过去打仗，心里有底，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靠各方面的情报；而现在死官僚封锁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他还说，这些年来，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们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他痛切地感到，1960年春季就应该纠正“共产风”，但因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总之，在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时，他首先强烈感觉到的就是，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认定，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克服困难，必须恢复我党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好作风。而要在全党普及这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就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前一段时间里不大作调查研究工作的缺点的同时，多次谈到了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他强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发出了那个著名的号召：“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说，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不大摸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之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了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

在此次会议稍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谈论的主要问题还是调查研究。他从党的历史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会上，结合纠正人民公社体制中的问题，毛泽东又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和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他指出，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他坦率地承认，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他要求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自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所以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为搞好调查研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即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在调查研究中，也要坚持实践标准；即不要怕听不同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

推翻，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态度和方法，这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在 1962 年 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他经过几年的观察与思索，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次比较系统的总结。讲话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但其中又以“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为题，以比较多的篇幅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系统地论述了几年来他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结果。

他一开始便写道：“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无疑，与 1958 年比较起来，承认和强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飞跃。他以党的历史为例，说明在民主革命时期，全党经过艰难曲折才逐渐认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制定了正确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和一套具体的政策。接着，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和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经过几年来的思考，他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谈到，在调查研究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 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在结束这段讲话时，他总结说：“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81)

可以认为，以上毛泽东的那些论述，不仅是他几年来对“大跃进”经验教训认真思考的总结，也是他对一年多来由他大力倡导而在全党出现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果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谈话中，除了有关认识论方面的重要论述外，他还着重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并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思考“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一系列问题。这表明此时他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认识又深了一大步。

但是，由于毛泽东是在没有触及到党的领导体制、没有认识到 1957 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等这些带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上来谈论民主集中制和认识论等问题的，所以，从 1960 年以来，他对“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总结仍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提倡调查研究、号召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他却发现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

例如，在 1961 年 1 月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又一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谈到，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了；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地给他们挂上这笔帐，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在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与反革命有关系，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显然有些过份。在当时，阶级斗争的问题的确存在。一些地方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支流的问题。只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思广益，全党不难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认识。但由于党的领导体制上的弊端，党内民主欠缺，以及毛泽东正在形成的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不切实际的认识，使全党正在广泛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产生了不少不实事求是的结论。在各地报送来的调查研究报告中，一些阶级斗争现象或一些被严重夸大的阶级斗争现象，以及一此根本不是阶级斗争的现象（如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对当时经济形势比较客观的估计等），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和高度警觉。他的重视和鼓励又促使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更多地报送此类的调查报告。显然，这种调查研究是很难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了。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而在全党范围内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有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调整方针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是发展了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而且越到后来，后者的比重也就越大。

在 1962 年 8 月至 9 月举行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令人不解的是，他在这两次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同时，对他自 1960 年下半年以来反复强调的调查研究却很少谈及。在此之后，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多次地、突出地谈论调查研究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了。当然，谈得不多，不是不谈。而且，重要的变化还不在次数方面，而在于他所强调的调查研究，已经是阶级斗争这个纲为中心了。例如在 1963 年 5 月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谈到某省各地委都下去搞调查研究，但只有一个地委发现了“四不清”问题，并着手搞“四清”。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其他地委都是主观主义的。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是真正的调查研究，没有发现的则是主观主义，这种只是为了证明已有观点和认识的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而它一旦提出，调查研究也就越来越流于形式了。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增写了一段文字，后来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题单独发表。在这篇著名文章中，他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如认识的产生，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各阶段的特点、实践在认识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他强调指出：“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这是从实践标准的角度强调第二次飞跃的意义。文章还反映了他一贯重视认识的能动性、人的能动性的思想。“……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

目的。”他还谈到了认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82)

从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这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一些基本原理的阐述都是正确的、深刻的，这是他几年来集中探索、倡导、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续。但是，这篇重要的、科学的认识论文献，却是作为一个已经表现出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文件的“前言”出现的。在文件的第二条中，发挥了他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论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段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以“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为题的第三条中，罗列了九条当时社会上严重阶级斗争的表现。文件第十条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不难看出，这时所要求的调查研究，主要的已不再是纠正高指标，浮夸风和急于过渡等错误，而是为了“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的尖锐阶级斗争服务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违背，这一矛盾的现象又一次说明，从正确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到正确的实践之间，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中间环节，如果在这些环节上出了问题，良好的愿望和某些正确的理论方法，并不能导致正确的实践。

自1960年下半年起，以总结和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为出发点，经毛泽东倡导而在全党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活动，有力地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深化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这是毛泽东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在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同时，在政治领域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却发展起来，而这恰恰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贯彻到底的结果。

六 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把实践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三者的功能和意义。即它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83)从这样的角度来分析实践的结构和功能，在马克思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批示全文看，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实践的反修功能，突出的是实践结构中的阶级斗争方面，关于实践结构与功能的新论述，主要在于论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84)虽然这里他强调的是实践的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但他同时也谈到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谈到了要使干部在这样的实践中同群众打成一片，又红又专，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内容，而正是这后一方面的内容，直到现在仍然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对于实践在整个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也有一些重要的贡献。例如，1963年11月18日他在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85)，这是他一贯坚持实践标准的又一发展，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客观实践活动的信心。他还强调了实践对改造客观世界的意义。他指出，以往所说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理解，这话还不完全，只讲了问题的一半。只有理解还不能得到自由，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对自然的改造的产物(86)，而不论是理解还是改造，都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实现。毛泽东的这一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有关自由与必然的学说。

从这样的实践观出发，毛泽东还多次论述了包括哲学在内的理性认识对实践的依赖性。除了散见于一些讲话和文章中的论述外，在1964年至1965年三次有关哲学的谈话中比较集中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几次谈话中，毛泽东都强调，不论是学习哲学还是研究哲学，都要从实际出发。他认为书本里面不能出哲学，只有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接触实际，到阶级斗争的太学校中参加实践，才有可能学好哲学。他批评当时我国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他希望哲学家和文科大学生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增加感性认识，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他从对哲学脱离现实的不满出发，提出“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他尖锐地指出：“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系搞不了哲学，文学系写不了不小说，历史系搞不了历史……”(87)毛泽东一贯重视实践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的决定性意义，所以，在他谈到哲学问题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使哲学联系实际，从三大实践中吸取发展哲学的养料。在这一层次上，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在应当联

系和反映什么样的实际这个层次上，当时他侧重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

在毛泽东有关哲学对实践依赖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直接经验的强调和重视。

1958年前后，在毛泽东的言论中，已明确地表示过对不接触实际，关起门来读死书的不满。60年代以后，当他已经把三大实践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把脱离实际与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又进一步发展，有关言论也更加尖锐、激烈。在他当时的著作和言论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的推崇，对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理论体系的不满。

在1964年的春节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讲了我国的教育改革问题，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都直接反映了他在认识论上的基本观点。例如，他明确表示，现在学校里书念得那么多，书念多了害死人。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孔子、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王实甫、曹雪芹等人为例，说明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他以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为便，谈到明朝有两个较能干的皇帝——明太祖是个文盲，明成祖是个半文盲，到嘉靖成了知识分子，就出了问题；梁武帝、李后主文化程度那么高，但却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的。他反复强调了在实践中学习的意义，指出明朝的李时珍就是下乡跑来跑去，祖冲之完全是自己学出来的，孔夫子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他什么都干过。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如高尔基只念过二年小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是个工人，古今中外许多有名的学者，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功的。”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又重申：念书也不能念得太多，就是马列主义的书也不能念得太多，读它几本就行，念多了就要走向反面。就会成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肯定在实践中自学成才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但如果因此而低估或轻视学校系统学习和理论学习的意义，那就未免片面了。实际上，学校学习与在实践中学习并不必然对立，书读多了走向反面也不是普遍、必然的规律。

1965年3月，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战争实践时，又表示了类似的思想。他说，我打仗从来不看书，指挥作战时，书少看一点，看多了不好。他认为，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陆、海、空学校，不怎么高明；有些现代化武器的研制需要的时间长一些，而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

415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1965年6月，他在一个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把问题提得更为明确。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书读得越多越蠢，等等。

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在几次关于哲学的谈话中，突出地强调了实践和直接经验对认识的意义。他谈到，书本里面不能出哲学，所以文科学生都应到工厂、农村去一段时间，得到点感性知识；阶级斗争是个大学校，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他对当时中国教育表示不满：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所以，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他进一步设想，高中毕业以后，就要先做

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这些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他在认识论上的一些基本思想。他认为，书是应该读的，但读多了却会走向反面，最好的办法是在实践中学习。而他所理解的在实践中学习，主要指的又是直接的经验 and 感受，他认为这些经验和感受能给人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书本知识。他当时所强调的实践，也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数十年革命实践活动的一些经验，有其合理的、正确的一面，比如他所强调的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要联系实际学习书本知识，等等。但是，当他过分强调直接经验的意义、过分强调在实践中学习，而对学校学习书本知识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轻视时，就失之片面了。而当他把实践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实践时，这种片面性就更明显了。

1964年到1965年间，在一些谈话中，毛泽东通过教育革命这个中介，比较明确地把认识论中的一些问题与反修防修问题联系起来。1964年6月，在一次会议上他谈到，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很多，“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很危险；不读书不行，读书大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他对我党历史的总结，也是他重视实践的认识论的结果。可以想见，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一定又想起了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以及他个人主要是依靠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的成功经验。

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将来就是“三门”干部这些人会出修正主义，他又说，现在学生马、牛、羊、鸡、犬、豕都不分，怎么不出修正主义？在这里，毛泽东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其主要精神是很有见地的。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学校教育，必然造成学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缺乏对社会的了解，缺乏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感情，缺乏对理论知识的真知。这样的学生，很难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时至今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大量培养和使用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能深入实际，并在实践中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又红又专的干部，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方针，它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具有深远意义。显然，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和预见得益于他重视实践的认识论。

但是，也应看到，学校教育固然应当联系实际，但如果学校教育不以课堂教授、书本教育为主，而以生产劳动或实际操作为主，这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知识发展和传授的规律。

七 对无限发展和进步可能性的向往和追求

1964年8月18日和25日,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就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同有关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进行了三次谈话。谈话内容有对日本科学家板田昌一有关基本粒子的文章的评价,有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和范畴的独特见解,有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建议,也有对当时我国哲学界一些缺点的方法的批评,三次谈话中,有不少独到、精辟的议论和见解,也有一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结论。贯穿于其中的一个共同思想,即事物发展,进步的无限性及人类思维发展的无限性。

在1964年8月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动物和人类的进化时说:人至少经过100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们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他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

他认为,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汉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了。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他表示,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

接着,他指出:“辩证法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他总结说:“事物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说:“总要提出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88)毛泽东这篇讲话,通篇充满着一种强烈的进取、发展精神,充满着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总要提出新东西”,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在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坂田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世界在时间、空间上无限性的思想,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谈话中,他指出,世界是无限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不仅从大的、宏观的角度来看宇宙是无限的,从小的,微观的方面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电子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会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那么,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他指出,一切个别的、特殊的東西都有它产生、发展与死亡,人类、地球都会灭亡,但这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的更高阶段;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说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就不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

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他由此总结说，世界上 everything 都在变，物理学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在这些谈话中，集中地、强烈地表现出毛泽东唯物辩证法中一个突出的、一以贯之的特点，即发展的观点、进取的观点。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哲学观点曾发生过一些明显的变化，但这种发展、进取的观点却始终如一，而且似乎越到晚年越力强烈。这种精神和气质是唯物辩证法所特有的，是理解、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所必须的。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都是在谈论自然科学时所总结出来的，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当时他仍然注意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发展哲学的养料，并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 1965 年 12 月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发展问题谈得不多，但他却谈到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说，历史过程就是矛盾的统一，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这段话是毛泽东对他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补充。他在强调了发展的无限性以后，又论述了发展的动力和状态，即“不断地斗”。虽然他这里具体谈的是社会历史发展，但他所说的这一原则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段话里，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分为二”等同于“斗争”。即把他所一贯强调的辩证法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半年之后，毛泽东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421_1.bmp}

1964 年至 1965 年间，在其他一些场合，毛泽东还对他的发展观发表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例如，1964 年 12 月 13 日，他在修改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写了一段话。他写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肯定，和对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信心，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突出的、鲜明的特征，是他乐观、进取、不满现状，不畏困难、开拓、创新的人生态度哲学基础。如果在这一两年中，当他特别着意于论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时，他对阶级斗争问题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或者，当他强调斗争性是矛盾的动力时，同样注意到矛盾同一性的重要性，那么，中国现代史可能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第九章 动乱岁月

1966年5月，正当我国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胜利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是自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错误不断发展的结果，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

1957年以来，特别是1962年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为了反对被他严重夸大的阶级敌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维护党的路线和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发动、领导了一系列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运动。从庐山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从四清运动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等等。虽然这些运动已经产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后果，但它们却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似乎这些运动已经或正在证明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必要性；这种阶级斗争不仅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基层，而且越到上层越严重，甚至党中央也出了修正主义，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加之当时国际上“反修”斗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使毛泽东越来越担心“堡垒可能从内部被攻破”。在一种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毛泽东认为以往的政治运动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用一种全面的、公开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领导权再夺回来。

1966年6月1日，当毛泽东批发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通过电台、报纸在全国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时，他意识到这种反修防修的形式终于被发现了。

一 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在当时批判不断升温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不小的震动。但是，即使如此，人们也绝不会意识到，这一批判竟然成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在1965年初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姚文元等人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背着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这样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文章不经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和认可，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吴晗于1960年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成的。姚文元的文章却蛮横无阻地把该剧中所写海瑞“退田”、“平冤狱”等故事，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单于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从而使问题具有了特别严重的性质。

姚文元的文章说：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于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新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案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案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姚文元的文章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当时火药味已经很浓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以文艺批判的形式，直接地、严重地提出了一些在党内、特别是在党中央领导层内非常敏感的重大问题。

六十年代初期经济、政治上的调整，发展到1962年上半年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出现了健康、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却被当作“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去批判和纠正。“风”虽然被暂时压下去了，但问题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姚文元的文章借批《海瑞罢官》，旧事重提，以“退田”影射“单干风”（即“包产到户”），以“罢官”影射“翻案风”（即平反冤假错案），而以上两者又都与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密切相关。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的高潮中，以文化批判为突破口，以尖锐的形式，直接触及到大跃进以来，中经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内一些仍然很敏感的分歧。

“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导火线，实际上这已经明确地暗示出“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以来党内分歧的渊源。同时，它也告诉人们，这场“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以文化领域里的批判开始的，是以文化批判为突破口、导火线发动起来的。

毛泽东支持了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和发表，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谈到了这一过程，他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

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后头我说印小册子……。文章发表以后1个多月，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时表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一评论，更增加了这次文艺批判的政治分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中央一线领导态度冷淡。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批评上海市不经中央批准就点名批判像吴晗这样的党内外著名人物。中央报刊迟迟没有转载姚文。直到半个多月后，迫于压力，《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才开始转载，但其所加的编者按（系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起草、修改）及版面安排，实际上又把姚文当成了一般的学术批判文章，限制了它的政治分量。此后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等不得已发表的一些批判文章，也是按照彭真、陆定一等人“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的意见，多是从学术角度进行批判。关锋、戚本禹等“左派”的一些批“要害”的文章，都被中宣部扣下。{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429_1.bmp}

1966年2月，彭真召集“文化革命小组”扩大会议，会后起草了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极左思潮加以约束，把运动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以内，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赞成把它变为严肃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经在京政治局常委同意通过后，也向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于2月12日转发全党。《二月提纲》发出后，抑制了极左思潮的发展，束缚了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等“左派”的手脚，使运动又逐渐向学术批判的方向靠近。这正如张春桥后来所说：《二月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很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围绕着《二月提纲》，中宣部、北京市委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矛盾急剧发展。

毛泽东听信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诬告。3月底，他在与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以及《二月提纲》。他说：

《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种文化大革命。

由姚文元文章及《二月提纲》引发的斗争，使毛泽东很快地，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几年来他一直关注着的“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毛泽东表态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张春桥等“左派”开始批判《二月提纲》，他们有关批“要害”的文章也分别在中央的一些刊物上发表，中宣部被撇在一边，彭真等人被批判。在4月9日至12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决定起

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5.16通知），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书记处于4月停止了彭真的工作。同月，报刊上开始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等著的《燕山夜话》的批判，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

1966年初，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的抵制时，江青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江青表示，“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时候了”。她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根据这个座谈会整理出来的《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断言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纪要》中提出的严重政治责任不仅是对着文艺界和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也是对着中央一线领导的。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由林彪发难并一手策划，在军队中制造了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196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提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的不信任。此后不久，罗瑞卿即遭到揭发批判，被隔离审查。

在罗瑞卿受到批判的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因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因受到诬陷，被停止工作。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以往中央领导层内分歧的产物；而围绕着对《海》剧的批判，中央领导层内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在批判中的消极态度感到明显不快。这种情绪又由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挑拨、诬陷更为强烈。与此同时接连发生的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重大冤案。进一步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形成了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在毛泽东看来，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说明，“中央出修正主义”已不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或是将来的可能，而已经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前的危机感、紧迫感已变为今天的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他下决心要立即采取行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修防修的群众运动，清除中央内部出现的修正主义。

如果说这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立即采取行动来“大破”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么，与此同时，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毛泽东又直接表露了他希望在“大破”之后“大立”的理想社会的蓝图。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就总后勤部的一份有关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

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上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可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可学工、学农、学军，也可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

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发展罢了。”

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评价和发挥，勾勒出他所向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廓。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时起，毛泽东就立志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实践，根据他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观察，逐步地形成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1949年以后，经过三大改造、大跃进、调整时期以及中苏论战，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不断发展。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中，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对平等、公正、纯洁的理想社会的热烈向往，不断观察和思考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努力追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可贵的预见，又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既有对未来的热烈向往，也有囿于以往经验的执著；既有大胆的创见，也有拘泥于本本的烙印；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也有使人惋惜的滞后。《五·七指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社会主义观的这些特点。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社会通过社会全体成员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以及批判资产阶级的实践，逐步实现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这种社会不强调按劳分配的物质和利益，在经济上要求实现一种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通过这样的社会组织有利于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多方面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的人；通过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从根本上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通过亦文亦武学军事的方法使全民皆兵，形成抵御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毛泽东的这些独特的构想中，有对马克思列宁当年一些设想的发展，也有他对中国革命斗争时期军事共产主义的依恋。他把革命战争时期某些成功的经验绝对化，当他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和弊病时，就把目光投向了以往战

争年代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更加怀念当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单纯健康朝气蓬勃的生活与实践。在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种关于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大学校”的雏型，《五·七指示》实际上是他在 1958 年时一些构想的继续和发展。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并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9 周年》。社论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高度评价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可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央一些主要报刊曾多次发表社论、文章，从各方面解释、发挥《五·七指示》，报道各行各业贯彻落实《五·七指示》的经验和形式。《五·七指示》的确成为“大立新世界”的纲领和指南。

毛泽东的一些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曾经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这在 1958 年之后的调整已经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对此也有所认识，也曾对大跃进中的一些设想进行过一些修正。但由于认识速度、程度的差距所导致的认识上的滞后，他越来越难以容忍调整时期那些实质上是否定“大跃进”。错误的措施和思想。他认为在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时，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而这些人正是党内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实现理想社会，必须通过一场大的运动，扫除这些障碍。

“文化大革命”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严重政治事件，使人们了解到毛泽东是在怎样一种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面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五·七指示》的发表，特别是就这两件事与 1958 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之间微妙而又密切的关系，则使人们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到毛泽东与中央一些领导人之间分歧的由来及发展。

二 “炮打司令部”

1966年5月1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

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他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但整个会议的基调是由他4月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定下的。

会议集中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揭发批判，其中尤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表现得格外突出。他们气势汹汹，捏造事实、揭发历史，上挂下联，总结概括，传达指示，使到会者受到很大震动。5月18日，林彪的发言更是把会议的紧张气氛推向高潮，林彪在发言中援引古今中外大量政变事例，证明毛泽东提出防止政变问题的重要性，诬称彭罗陆杨要搞政变。他煞有介事地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危险就出在上层”。他还在会上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他说：“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他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这些把个人崇拜鼓吹到极端的话，在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对会议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D》）。这个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传达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当时的一些基本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五·一六通知》的多次修改和大段补充之中。

例如，在批判《二月提纲》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时，他写道：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说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

在批判《二月提纲》中所说：“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警

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时，他写道：

“真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他批评《二月提纲》的作者：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他提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批评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在《五·一六通知》的结尾处，毛泽东写道：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区、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集中地反映了1962年以来，特别是1965年初在制订《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发生明显分歧，以及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重大变化，以及他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内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而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现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毛泽东对自己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受到重重阻挠、无法推行而愤怒和警惕，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深。而当他把这些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时，他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了更深的忧虑。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曾谈到：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的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心情和愿望。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罗、陆、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停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加之江青的特殊身份，所以从一开始它的工作就撇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此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日益膨胀，成为制造动乱的中心，其基本成员逐步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班底。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说此时毛泽东已经设计、规划好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方法，那也是不确实的，上述毛泽东同胡志明的谈话中，毛泽东曾估计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显然，这个估计与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结果大相径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未及的。但又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社论等把它的内容公布到社会，“文化大革命”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

1966年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示，中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揭发、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张具有尖锐政治性质的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

同日，已经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夺权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6月2日，经毛泽东同意，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攻北大，“代行党委的职权”。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这一系列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从6月上旬起，北京和各地部分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学校和文化部门的党组织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打倒”的目标，许多学校和一些机关、工厂发生混乱现象，纷纷要求上级派人指导，加强领导。

6月上旬，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依据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传统作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先例，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许多省、市、地相继向本地区的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此外，为控制局势，制止混乱，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还发出一些指示，通知，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这些措施曾一度使混乱的局势有所缓和。

各地工作组进驻学校等单位后，难以完全超脱于运动一开始就形成的两派斗争之外。他们一般都得到了“多数派”（即“保守派”）的支持和拥护，但却遭到“少数派”（即“造反派”）的抵制。一些单位的工作组批斗了一

些带头造反或与工作组对抗的学生，并加以“反党分子”、“右派学生”、“假左派”等罪名，从而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康生、江青等借机对此大加渲染，给工作组戴上了“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等帽子，使形势更趋紧张、复杂。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在烟波浩渺的滔滔长江中，在两岸群众的欢呼声中，他像以往临江下海时一样，从容自信，击水中流。他在长江中畅游1小时零5分，游程近15公里。游毕，他又在快艇上向江中和两岸的群众挥手致意。这时，他已73岁高龄。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人们从他在快艇上挥手致意的照片中，似乎又可以隐约感觉到一丝他内心的沉重。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京的当天即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一些大学反工作组的材料。他对前一阶段的运动表示不满。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他批评“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是方向错误，要赶快扭转。

在听取了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汇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工作组的看法。7月24日上午，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时，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他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大专学校的工作组很快被撤销。接着，工作组被说成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党内围绕着派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和争论，实质上是对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对“乱”的不同看法，党中央的多数人及党的各级领导人，是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况下被动地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对这场运动的目的，方法的理解很肤浅，更不能理解和听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和纵容的那些狂暴。极端的言行。他们希望能保持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对运动中已经出现的混乱表示忧虑，要求对如此广度和烈度的运动有一定的约束，因此，派工作组被认为是一种最为可行的选择。

毛泽东原先是同意派工作组的。但当他看到由上级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压制”了“造反派”，部分地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和党的正常领导，致使运动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对“文化大革命”和“乱”的独特见解。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谈到过他的见解。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原因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1967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他又谈到，过去我们是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农村、工厂的斗争。但是，“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基于他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根据他要自下而上地扫除阴暗面，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天下大乱”来广泛地、深入地发动广大群众投入运动，以便冲决阻力，横扫阴暗面，进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且，这种“乱”的程度是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严重程度成正比的。这种“大乱”的实现，又以排除正常的组织领导和秩序的前提。围绕着这样一种运动和进行运动的方式，毛泽东与中央多数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重要的是，这种分歧反过来又更加重了他有关“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感觉，更坚定了他要采取“天下大乱”的方法。

林彪、江青等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急剧膨胀起来的野心使他们急于通过动乱攫取更多的权力。他们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并进一步把这些错误推向极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频频召集会议，到处发表讲话，煽动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干部，冲击党、政各级领导机关，制造社会动乱，以便实现“乱中夺权”的政治目的。8月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公然宣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出于对前一阶段运动的不满，为制定进一步开展运动的方针、政策，排除运动的阻力，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他对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工作组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在8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全会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他在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

这张大字报从工作组问题及前一阶段运动形势入手，进而联系到1962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内的一些重大分歧，提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外，另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此处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大字报大致勾划出中央领导层内分歧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制定《五·一六通知》直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现在终于达到了顶点。大字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进军的号角。”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446_1.bmp}

全会于8月8日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之后，从全局上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按照《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

《十六条》中虽然也提到了党的领导，也有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诸如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等等要求，但是，既然形势已经那样严重，既然已经确定了“大乱大治”的方针，确定了自下而上地炮打司令部的方向，那么，这些附带提到的规定则实在是太软弱无力了，它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恶性发展，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约束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刘少奇在常委的名次排列由原来的第2位被降至第8位，林彪的名次排列在毛泽东之后，陈伯达、康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重新选举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在今后的文件及报刊上都不再被提及。

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并结束。这次会议及其所通过的《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程序。

三 天下大乱

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毛泽东身着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他走下天安门，走过金水桥，一直走进集会的人群中，同周围的群众紧紧握手，并不断向人们挥手致意。大会进行中，一名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同好亲切握手，表达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这次大会有力地推动了《十六条》的贯彻执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发动。会后，“文化大革命”以更大的规模和力在全国展开，红卫兵运动也在全国勃兴。

从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的任务时起，他就非常注意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他多次向全党指出，青年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党和国家、民族的未来，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处心积虑地要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鉴于苏联出赫鲁晓夫的教训，他指出，要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必须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中苏大论战的第九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毛泽东迫切地希望广大革命的青少年能在这场大革命中得到锻炼，增长知识和才干，学会反修防修的本领，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广大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敏锐活跃思想和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有利于冲破运动初期因许多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所造成的沉闷局面，青年学生可以成为这场运动的先锋队。

出于以上考虑，他对青年学生的造反行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8月1日，他亲自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他在信中说：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的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诉，说明对反动派遣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在鼓励和支持的同时，他又写道：

“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信中的这几段话，表明他并不赞成红卫兵运动初期的种种狂暴、极端行为，而想对此有所约束，加以引导。

毛泽东的信和8月18日戴上红卫兵袖章接见百万群众的行动，集中地反映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即除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还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认识

到，用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法，是达不到培养接班人的目的的。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势若燎原。红卫兵组织从学校扩展到各行各业。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计共1100多万人次。9月5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联走向高潮。这一举措是把“文化大革命”迅速推向全社会的重要步骤，也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红卫兵从学校走向社会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狂热下，大串联，破四旧，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冲击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一些红卫兵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进行揪斗、体罚、抄家，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与此同时，学生中在工作组、校领导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突出，学生因此而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派性斗争不断升级。这种派性斗争与当时尚能勉强维持工作的各级领导抑制动乱的努力，又被归之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作祟。一场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又随之而起。

1966年10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宗旨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克服来自各级领导的阻力。会上陈泊达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则在会上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公然否认党对运动的领导。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检讨。他们的检讨稿都曾送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首肯。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初稿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他还建议把稿子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征求意见。在邓小平的检讨稿上，毛泽东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建议再加写一些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积极帮助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10月24日晚，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讲话。他说：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错误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5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自己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主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谁会打倒你们？

毛泽东讲话中，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泽东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刘、邓负责任。

10月25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要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档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还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于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对于运动的现状，他乐观他说：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他对运动中被指责犯了错误的各级领导表示了理解和宽容，希望他们早日过关。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5个月用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学生）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对于今后的运动，毛泽东的设想是：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可总结。”

与八届十一中全会相比，毛泽东此时的讲话已不再是那么严厉、激烈。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当时运动状况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心情，以及对今后运动的乐观估计。他认为，运动发展至今，中央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刘、邓等又作了比较好的检讨，所以，他对刘、邓及其他许多领导同志的“错误”采取了宽容、谅解甚至开脱的态度。他说，运动“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是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他肯定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干部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明确表示：“我是不要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毛泽东的态度是真诚的，友好的。但是，会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很快就使毛泽东的设想和愿望落了空。他没有想到，从总体上肯定“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造反行为，肯定运动“炮打司令部”的方向，与他以上那些良好的愿望是不能相容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一旦被发动起来，就必然要超出人们的种种愿望和估计，按照它自身的规律恶性发展。刘、邓很快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也不是5个月或两个5个月就能够结束，而是持续了10年之久。毛泽东的计划屡屡落空，他的设想不断被突破，动机与效果冲突，主观和客

观相悖，他已经开始无法驾驭这个由他发动起来的运动了。对于他来说，“文化大革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异己的运动了。而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那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社会因而陷入愈演愈烈的动乱之中。在林彪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组和策动下，“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无政府主义的狂潮四处泛滥。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除野战部队外，都逐渐停止了活动，广大党员的组织生活也逐渐停止。1966年12月，林彪、江青等压制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正确意见，使“文化大革命”正式地、迅速地向工厂、农村扩大、蔓延，工厂生产秩序陷于混乱，这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亲自策动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上海全市领导权力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手中。较之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的设想，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运动发展的实践证明，必须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被“篡夺”了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全面夺权”的阶段。他肯定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做法。1967年1月8日，他在一个会上说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问题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1月份之内，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先后夺权。在很短的时间里，掀起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由此又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和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和鼓噪，这一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派性斗争激化，社会动乱加剧，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生产建设事业受到严重损害。毛泽东没有认识到，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还把“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作为行动纲领，进行全国性的全面夺权，必然造成人民自己夺自己权的荒唐局面。这种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的“夺权”，只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

毛泽东虽然支持了“全面夺权”和“天下大乱”，但对于这种严重的混乱局面也希望加以约束。所以，他当时设想的有关夺权的指导方针的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以及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顺利地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他希望各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还发布了一系列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

毛泽东和中央的这些决策虽然在一些地方暂时地缓和了局势，但在“文

化大革命”和“全面夺权”总的方针下，加之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等人的煽动、破坏，毛泽东的这些愿望和指示实际上很难收到实效。“大联合”、“三结合”不但未被贯彻执行，反而成为新一轮斗争和动乱的焦点。各造反组织都希望以反己为核心实现大联合，由自己夺权、掌权。各派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寸权不让，激烈争夺，围绕着夺权，各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了普遍的冲突，直到发生残酷的武斗。支左部队介入地方后，虽然对稳定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却很难于超然于两派或多派之上，于是在造反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纠纷和冲突，使地方和军队都受到损害。

全国性的“全面夺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激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深深的忧虑，代表广大人民的意志，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在1967年1月中旬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为维护军队的稳定，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两次会议，很快被江青等诬称为“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毛泽东听信了江青等人污蔑性的汇报以后，严厉地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江青等人趁机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这些老同志进行围攻，猛烈批评，无限上纲。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但他并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组打倒这些老同志的企图。他希望在对他们进行批评的同时，还要团结、保护他们。这些老同志的意见中，有一些也被他所采纳。4月30日晚，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当夜，周恩来拟定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这些老同志同首都人民一起，进行了“五一”庆祝活动。1969年1月3日，他又在一份报告中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毛泽东的这些做法，制止了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阴谋，反映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老干部的问题上，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林彪、江青等人的本质区别。“二月抗争”之后，江青一伙借批判“二月逆流”，又煽动掀起了一股“反击全国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浪潮，更激烈地攻击党政领导机关，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全国派性斗争进一步升级，全面夺权剧烈发展。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政治局。

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和派性斗争的升级，1967年夏季，全国一些地方的武斗达到高潮。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并出现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浪潮。7月下旬，林彪、江青等借发生武汉“七二〇”事件之机，公然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7月25日，林彪提出“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7月下旬到8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趁毛泽东下在北京之机，不顾毛泽东有关指示，由戚本禹出面，一手策划了在中南海内对刘少奇、邓

小平，陶铸夫妇的批斗、侮辱。8月7日。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公然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砸烂反动的公检法”。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发表讲话，鼓励夺外交部的权。此论一出，旋即发生封闭外交部党委、砸烂外交部政治部，以外交部名义向我驻外机构滥发指示等严重事件，并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就全国范围来看，1967年7、8、9三个月，“天下大乱”达到了顶峰。

毛泽东虽然曾经提倡过“天下大乱”，但形势动乱若此，却也超出了他的本意和预料，引起了他的不安和警惕。为了制止这种严重的动乱局势，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8月底，他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根据他和周恩来的指示，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了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还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10月，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在这年7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记录。

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对一些省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进行了调查，沿途在不同场合作了多次讲话，集中地谈了对形势，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出了当前的任务。

关于形势，他说：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谈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起，谈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这种离实际相去甚远的看法，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天下大乱”的独特看法（即“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需要。

但是，毛泽东讲话的重点，还是在于约束造反派，稳定形势，促进联合。他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为了促进联合，他还为运动中的“保守派”开脱：

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变的。

他要求：

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他批评了在大联合中“以我为中心”的口号和做法。指出：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中心”是最蠢的。他

要求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针对当时在干部问题上的极左思潮，他说：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

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出来。

毛泽东明确、坚决地指出：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对于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的语气变得严厉了：

对红卫兵可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说明，在外出视察期间通过多方面的调查，他对当时局势的严重性及其原因，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为了稳定形势，同时，也是由于他认为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运动已经克服了阻力全面展开以后，应该防止另一种倾向，出于这种考虑，他对保守派，对各级领导干部采取了宽容的，及时解脱的态度，而对造反派、对红卫兵则采取了约束和限制的措施。毛泽东态度上的这一转变，立即对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讲话经党中央转发全国以后，减轻了受迫害干部的压力，抑制了造反派的极端行为和无政府主义思潮，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对当时的形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毛泽东的决策和周恩来等全力以赴的努力，1967年冬到1968年春，全国形势相对的趋于缓和。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一些领导干部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这种局面使依靠造反起家的中央文革小组及各地的一些造反派骨干分子不满。同时，这种局面又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积郁已久的怀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不断增长，并公开表露。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否定“一月夺权”，否定反“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的言论。上海、北京等地甚至已经出现了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这种动向使江青、林彪等深感不安。1968年3月起，他们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下。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对“右派翻案风”。此风一起，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急剧上升，一些地区形势再度恶化。

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再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除对一些问题严重的省、市实行军管外，他还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为了解决学校中的武斗问题，他甚至亲自接见了北京几所大学生在造反派头头，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的这些努力，使得全国的形势再有所缓和。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表现出这样一种有规律的周期：为了发动运动，克服阻力，便要大批右倾、保守、倚重中央文革小组及造反派，鼓励“天下大乱”；而在动乱超出了限度，造成了巨大破坏以后，又必须依靠党内外健康力量，采取严厉措施，约束极左势力和造反派，以稳定形势，恢复生产。而这种做法马上又会使党内外各种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们情绪高涨，他们的行动不会仅仅停留在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上，而必然很快就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和批评。此时，为了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又不得不再批“右倾翻案风”，形势因之再度陷入混乱……虽然每次的形式，程度稍有不同，但基本内容和过程却大致相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这种循环是在更大的规模和更尖锐的形式中进行的。{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462_1.bmp}

经过 20 个月的社会大动乱的反复，至 1968 年 9 月，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1968 年 10 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极其错误地通过了对刘少奇的所谓“审查报告”，极其错误地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

1969 年 4 月 1 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他希望通过九大能进一步加强党内外团结，他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他说，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总是多团结一点好。他指出：“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并不认为九大标志着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此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具体他说，这个继续革命就是要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个机关地去搞，去总结经验。

讲话中，毛泽东还号召全党都要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他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和传统应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发扬这种精神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结果，它有助于解决我们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他在会上还提出了整党、整团等任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逐渐成熟。这一思想在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的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中，得到了初步系统的表述。

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社论在罗列了以上六个要点之后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继续革命的理论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建国以后，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建国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多方面地、深入地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所做的努力，也赢得了党和群众的拥护、支持。在这一艰巨的、伟大的探索中，他取得过成功，也发生了失误。继续革命理论就是这一失误的结果，这一理论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也违反了中国实际，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主观与客观严重脱离的实践。

四 “斗、批、改”与“理想社会”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如果说在九大以前是大破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路线和上层建筑的话，那么，九大以后的任务，就是在“大破”的基础上，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域里，系统地、全面地“大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针，就是实行全面的斗、批、改。所谓斗、批、改，是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所提出的任务，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十六条》的规定相比，九大之后斗、批、改运动全面展开时，其内容又要广泛得多了。

实际上，在1968年下半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大部分建立时，毛泽东已经提出“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问题。1968年8月，姚文元在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中，转达了毛泽东有关斗、批、改的指示。这就是：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这里虽然说的是工厂里的斗、批、改，但其基本原则对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是适用的，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可继续做，此名斗、批、改。”

毛泽东希望，通过斗、批、改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建设一个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这其中包含了他希望胜利地、圆满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在他看来，斗、批、改既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扫尾阶段。

毛泽东没有想到，对于他来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由他自觉规划和指导的运动，而已经是一个他越来越难以驾驭的异己物了。“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全面动乱”所遗留下来的无数矛盾和创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斗、批、改本身脱离实际的左倾目标，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给他带来一个理想社会，不可能使“文化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归于结束，而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和惊心动魄的斗争。

毛泽东对斗、批、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亲自抓了北京的六个工厂和两所大学作为运动的典型，他派出了身边的警卫部队、医生等工作人员，参加这些试点的运动，以期更多地、更直接地了解实际情况，摸索总结经验，用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六厂二校”的经验很多，面也很广，几乎涵盖了斗、批、改运动的所有方面。例如；《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等等。

1968年至1970年间，新华社总社记者多次报道了六厂二校革委会或宣传队的经验，这些典型本身也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们各自的经验。这些经验因其权威性和全面性，对全国的斗、批、改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总的方面来看，六厂二校经验是“左”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它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但是，较之“文化大革命”前一阶段的“天下大乱”、“打倒一切”的来说，较之与它同时在全国一些地方仍然肆虐的极左思潮和做法来说，这些经验又有其抑制极左，“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恢复秩序，稳定形势的一面。它在一段时间里、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形势，恢复了生产，尽管这只是暂时的。

按照“大破大立”的原则，斗、批、改中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大批判开路。”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判在形式上表现为无限上纲、声色俱厉，不容置辩，武断专横，在内容上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项工作、政策法规和工作条例。这种批判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把发展生产力放到各项工作首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生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核算、利润指标说成是“利润挂帅”；把农村自留地、集市贸易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把关心群众生活，注重物质利益说成是“物质刺激”；把工厂企业中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卡、压；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说成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把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科研人员钻研业务说成是“智育第一”、“白专道路”；把解放前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和建国后的文艺工作和作品，几乎都说成是“黑线”或“封、资、修黑货……”。这种“大批判”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了深远的破坏性后果，这种批判虽然也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但它更是江青、张春桥等把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发展到极端的的结果。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中的一项主要任务。1967年10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批示在整党建党中被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这显然是不符合国情的。

毛泽东迫切希望在整党中进一步发扬党内外民主。他批评了一些党的基层干部遇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征求党员意见的作风；批评“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九大期间，他又提出，这次整党建党要经过群众，不仅仅是几个党员，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以便扩大党内外民主。他认为，组织纪律性还是要有的。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他还通过比喻论述了整党建党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们党员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还曾提到，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

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和整顿看作是建设理想社会的核心，他殷切地希望通过这次整党能够使党更纯洁、更民主、更有朝气，更联系群众、更有战斗力，成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就他所提出的整党建党思想中的一些具体措施来看，例如联系群众、发扬民主、反对特殊化，干群平等，要有朝气等等，都包含了许多合理的因素，反映了他一生一贯的党建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开门整党，新老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实践，新结合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仍保持原工资，等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总的背景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加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这些积极的思想措施不是往往落空，就是在实践中变形走样。整党建党不但不能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发展起来的争权夺利，以权谋私，特权腐败，无政府主义等不正之风，而且使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总是处于一种相互隔阂、相互戒备的不正常状态之中。特别是，在整党建党中笼统地强调朝气蓬勃、强调吐故纳新，结果使许多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混入党内，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但是，也应看出，经过整党建党，毕竟重新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遏止了江青、张春桥等企图依靠造反派掌权的企图，这对于稳定局势，打击极左势力，推进工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斗、批、改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为了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改进干部作风，实现社会平等，毛泽东一贯主张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要途径就是干部到基层参加劳动。“大跃进”期间、调整时期以及四清运动中，毛泽东都对干部提出过这种要求。“文化大革命”中，当局势趋于稳定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干部下放劳动的问题。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新近的一个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编者按》接着说：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毛泽东的出发点无疑是积极的、正确的，他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也有许多合理成份，以致至今对于我们仍有许多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他着眼的基本点只是阶级斗争，所以实际上他又把干部教育问题、干部下放劳动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的干扰，把大批干部、教师、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下放劳动的方法，往往成为排除异己、惩罚干部、摧残知识分子的手段。斗、批、改中的干部下放劳动，

既花费了国家的大量物力财力，又使百万干部、知识分子遭受许多磨难，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

与干部下放劳动一样，让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完成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都是这样要求青年知识分子的，例如，他就这样严格地要求过他的爱子毛岸英。在斗、批、改阶段，他又提出了这项任务，并采取了空前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法。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转述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472_1.bmp}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城市、乡镇里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毛泽东的号召发出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几年之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1600万人。这个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停止。

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边疆，接受了锻炼，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为开发、振兴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正值青春年少时却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这不但对他们个人的成长造成了长期不利的影响，也造成了我国人才生长的巨大断层，严重地拖了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后腿。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靠运动方式进行的上山下乡，不仅加重了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也给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庭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甚至酿成一些悲剧性的后果。

一些人依仗特权“走后门”，使自己的子女躲避下乡或提前返城，在当时的知识青年及其家长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引起普遍的不满。以上种种消极现象，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教育革命”也是斗、批、改阶段中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一贯重视对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已经对此进行过一些探索，提出过一些重要思想，进行过一些实践。但是，他认为这些尝试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五·七指示》中，他甚至得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严重判断。从这一基本估计出发，在斗、批、改阶段，他十分重视教育革命的开展，发出过一系列重要指示。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第3期的一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他在编者按中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

励。实在不行，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前学校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错误观点。他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称为“旧学校”，把“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知识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建国以来17年我国教育工作的实际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实际情况的。基于这种估计提出的教育革命，往往违背了现代教育科学的发展规律。基于这种估计提出的“再教育”任务，在实际上使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处于一种受压抑、受轻视的地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种状况以及他过于强调实际操作和感性知识的教育思想，在客观上造成了对知识、科学、文化、课堂教学不重视的结果。另一方面，毛泽东希望学校教育要突出政治、德育的地位，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的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他还希望缩短学制，活跃课堂授课气氛，发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毛泽东的创造精神，至今仍给我们的教育改革以多方面的启迪。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出的《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把高等学校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当作“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明令废除；而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课程设置为：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要求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报告》规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使教师在学校中处于受改造的地位，破坏了正常的师生关系。学员入学时文化基础参差不齐，学习期间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特别是在招生时，以后门、特权的竞争取代了学生在分数、学业方面的竞争，致使“走后门”上大学成风，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利用了毛泽东的失误，并进一步把这种错误推向极端。在教育革命中，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在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师生关系等各个方面，推行极左路线，更加重了教育界的损失。1971年4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完稿、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长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此外，在斗、批、改阶段，还进行了“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文艺革命”、“整团建团”、“商业改革”、“医疗卫生制

度改革”、“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精简机构”、在基层普遍建立革委会等项运动。1970年间，全国还出现过一次新的、盲目的生产“跃进”。

与前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争权”相比，斗、批、改阶段在形式上不再是那么激烈、动荡，但它在内容的深刻性方面却不亚于前者。人们都在等待着那个曾经许诺在大乱之后出现的大治，但“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激烈的运动使他们不得不再次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他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推动生产的发展，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只不过是又出现了一次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小号翻版，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之后，他们依然过着单调、贫乏和清苦的生活；他们希望在大乱之后能有一个团结、和谐的政治气氛，但“以阶级斗争为纲”又迫使他们仍然不得不相互戒备、疏远，巨大的政治、精神压力使得人们不得不具备两副面孔和双重人格，人与人之间滋生着冷漠、虚伪；人们曾经相信“文化大革命”能够荡涤入世间的一切污泥浊水，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结果他所看到的是“走后门”成风，仍然难以约束的种种特权，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人们曾经希望在砸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规章制度之后，自己能够真正成为企业、生产的主人，但不久他们就因事故猛增、产品质量下降以及各种名称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而怀念起那些规章制度来了；人们曾经被允诺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将出现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但他们实际上得到的只是“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文艺，没有幽默，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纯洁”的文化沙漠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之中，正是在这样痛苦、仿徨的思考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已经所剩无几，怀疑、不满、迅速的增长着。

毛泽东真诚而又热烈地希望在全面夺权以后，再通过全面的斗、批、改实现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当他逐渐看到理想与现实、形式与实际、理论与实践之间明显的差距后，他的热情也逐渐减退。不久，他的注意力又被“文化大革命”自身所酿成的又一个巨大的政治斗争完全吸引过去，而很少再提及斗、批、改了。周恩来等人落实和发挥了毛泽东各项指示、方针中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一面，努力稳定局势，缓和矛盾，发展生产，解决了许多“天下大乱”时遗留下来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极左思潮，缩小了“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他们的努力受到广大干部、群众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江青一伙则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并把“左”的错误发展为极左，使斗、批、改阶段依然不时出现激烈的冲突和肃杀的气氛。他们必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正当人们在斗、批、改运动中为理想的实现忙碌时，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使他们处于极度的震惊和惶惑之中。这个事件不仅中断了斗、批、改运动，也使人们在一种巨大的幻灭感中失去了对理想社会的热情与追求。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林彪集团通过与江青集团的勾结，攫取了巨大的权力，他们的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九大之后，这两个由阴谋家、野心家组成的集团之间开始了争夺更多权力的角逐。林彪一伙预感到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他们迫切地希望通过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由林彪提前接班。

1970年上半年，当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筹备四届人大时，林彪集团不顾毛泽东多次明确地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思，在不同场合几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并要求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在修

改宪法的过程中，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吴法宪等人同张春桥、康生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1970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再次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利用所谓“天才”问题把矛头指出江青集团。当时已经投靠了林彪的陈伯达与吴法宪等人在会议中按照林彪定下的调子，抓住设国家主席的称天才两个问题，没有点名，但是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攻击了张春桥，也就是攻击了江青集团，从而造成一场混乱。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了林彪集团的活动，并点名批评了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矛盾和斗争达到了高潮。这场较量以林彪集团遭到沉重打击而告终。他们妄想由林彪当国家主席，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权的阴谋活动受到挫折。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党内开始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作了许多批示，点名批评了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并间接地对林彪有所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改组了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其宗派势力濒于瓦解，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正当以林彪之子林立果为首的“联合舰队”紧张策划一切罪恶活动的时候，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他在沿途多次谈话中，指名批评林彪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还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林彪、叶群通过其亲信得知毛泽东的讲话后，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9月7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个行动的手令，林立果一伙密谋在毛泽东南巡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毛泽东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林彪、叶群眼见其阴谋败露，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结果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断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在已经进行五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坚持革命，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

惊心动魄的林彪反革命事件，使得人们从通过斗、批、改实现理想社会的幻想中到现实中来。他们开始严肃地思考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和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带来天下大治？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要不要这样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力量？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离理想的目标究竟是更近了还是更远

了?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

五 整顿与反复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理论与实践，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尖锐冲突，使他开始以痛苦、矛盾甚至自责的心情，回顾“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往事。此时，他虽然还没能够从全局上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吸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在一定限度内对以往的政策作了一些调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消除或减轻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令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等离职反省、彻底交待；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清理极左思潮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在以上工作中，一个被摆在优先和重要地位的工作，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林彪事件的发生，不仅使毛泽东彻底认清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的真面目，反过来，也使他加深了对那些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陆续打倒或被贬抑的老干部的认识和感情，深感迅速地解放和使用他们是搞好各项工作的当务之急。在周恩来的紧密配合之下，毛泽东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

“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与九大及其之前毛泽东对老同志的严厉批评相比，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所表露出来的友好、团结愿望，以及一种虽淡实浓的自责心理。毛泽东曾经很喜欢白居易的一首诗，即《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三首。诗为：“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七日满，辩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1972年批判林彪时，毛泽东引用过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识人之难。他除了想以此说明认识林彪一类大奸似忠的野心家需要一段时间，要有一个过程，希望老同志、老战友谅解他的苦衷外，也流露出在经历了又一次风波、曲折之后，他对重新恢复与这些老同志之间的友谊、信任所感到的由衷的高兴与欣慰。1972年1月初，陈毅病重，毛泽东专门让周恩来、叶剑英去向陈毅转达他对“二月逆流”平反的想法。他再次表示，“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毛泽东是想用这个好消息，这份数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的亲情去安慰、鼓舞重病中的陈毅，还是希望陈毅不要带着“二月逆流”之类的遗憾离开人世？

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后，毛泽东难以抑制悲痛、沉重的心情，他亲自阅改了周恩来在追悼会上的悼词，并坚持带病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开始之前，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了嘛。……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他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1969年党的九大时，毛泽东在讲话中曾说，陈毅是作为右的方面的代表参加到中央委员会里来的。而现要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实际上也是对以往错误的自我批评，毛泽东是认真地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的。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8月3日来信上批示

说，应当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表示了对一直未能结束对邓小平“审查”的人的不满。根据他的指示，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央的这个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进一步做了坦率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寥寥数语，一种浓浓的战友之情油然而生。

他又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在短短的一席话中，他三次说到要“自我批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他在干部问题上的深刻转变，还有他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一些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林彪事件后，尽管落实干部政策还受到江青、康生等人极力抵制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周恩来等有可能冲破重重阻力，迅速打开局面。1972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纷纷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亲自对其中一些信件作了批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新的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他们的处境仍然不好，但毕竟结束了被审查、被下放、“靠边站”的生活，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自己的努力。

由于毛泽东的支持和周恩来等积极缜密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党的干部政策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落实。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的工作得以恢复，落实干部政策削弱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暴发起来的造反派的势力，削弱了极左势力的社会基础，加强了党内外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政治、组织等方面

的有利条件。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毛泽东的思想所发生的积极转变，使得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里，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任务，推动了这些部门工作的发展。

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根据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结合起来。他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判，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现象，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周恩来的这些话虽然是批判林彪的，但却不能不使江青一伙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根据周恩来要抓企业整顿的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了整顿企业的具体措施，恢复和健全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国家计委针对生产建设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发出文件，规定了十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强调统一计划，加强管理。这个文件虽因张春桥的坚决反对而未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却已经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针对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和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党中央还作出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央要求各地不要硬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决策、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文化教育方面，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针对当时教育工作中“左”的错误，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提出中学教育要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的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攻击。

在外事工作方面，这个期间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决断和周恩来的努力，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和发展同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的关系。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次全体会议以压倒多数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在对抗20多年以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到1972年底，共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我国外交上获得的重大进展，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1973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价值达43亿美元。这些项目的引进，扩大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毛泽东、周恩来在对外关系上的重大决策，开始打破

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不正常状态，为开辟新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人们认识当代世界提供了有利条件。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0690_0486_1.bmp}

林彪事件之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等为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整顿被林彪、江青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条战线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得到逐步恢复，工农业生产明显好转，文教科事业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怀疑、不满也在逐渐加深，批判极左思潮本身，已经击中了江青一伙的要害，遭到他们日益强烈的反对。而批极左的发展，必然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是否正确这一最基本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批极左的局限性也开始显露出来。

毛泽东从林彪事件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这种认识上的进步却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一更深层次、更根本的问题面前停止了。某些局部性的认识变化并没有使他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他从自己固有的公式出发，认为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事件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和结果，是第几路线斗争，再一次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认为，具体错误可以纠正，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不容否定的，也是不可能否定的。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毛泽东的眼界，也决定了他批判极左、纠正错误的局限性。这样，他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林彪事件之后，与林彪等人有着共同的思想体系并曾一度紧密勾结的江青一伙，曾一度处于十分尴尬、被动的地位。当他们从最初的惊恐中清醒过来之后，便立即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受林迫害的左派”。他们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左和整顿充满仇恨，处心积虑地干扰、破坏，随着批极左和调整的深入，双方的摊牌已不可免了。1972年11月下旬，在一份周恩来487批示同意的内有批判林彪集团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内容的文件上，江青、张春桥一伙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们分别批道：“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以及“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等等。积蓄已久的矛盾终于以尖锐的形式表露出来。

在周恩来等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出于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考虑，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主张。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在讲到林彪集团的性质时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他表示不同意用批极左思潮的思路批林，认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右。

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很快就被江青等人传达到全国。1973年1月1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至此，周恩来等批极左，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大会虽然使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一批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也被塞进中央委员会。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

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的野心因此更加膨胀，活动更加猖獗。

1973年下半年以后，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担心批极左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出现“复辟倒退”的后果，不断在他面前进行诬陷和挑拨。这种挑拨更加深了毛泽东的忧虑。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侨的谈话中，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说话中，他还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子）反法（家）”的。

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再一次失误，于1973年底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从1974年初起，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有关批判孔子的一些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批孔子为名，攻击周恩来等在前一时期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

1974年上半年间，江青一伙活跃异常，到处讲话，接见，到处送材料。报刊上大量刊载“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文章，他们不批林，假批孔，用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等影射攻击周恩来等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他们的煽动指挥下，社会上动乱再起，一些造反派再拉山头，重打内战，到处揪斗老干部。一些早已消声匿迹的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又重新出现，到处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批林批孔”运动使得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因政治动乱再次下降。

毛泽东虽然支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他此时并不愿意看到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当他觉察到社会上已出现运动的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运动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联。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

对于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并对他们进行了有重要意义的批评。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就曾批评江青不执行自己的意见，批评她不研究马列的书和自己的著作，提出江青搞特权，并说“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3月27日，当江青坚决反对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时，毛泽东又气愤地写信给江青说：邓小平出国是我同意的，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随着政治动乱的发展，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他对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批评江青一触即跳，“你也是难改呢”，针对江青到处以特殊身份发指示、讲话、训人、送材料的种种劣行，毛泽东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并警告江青等人：“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明确地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使得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暂时有所收敛。

毛泽东原先希望通过斗、批、改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运动等意料之外的事件又把“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推到难以预料的未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却难以结束这场运动。他不希望这种难以预料的过程无休止地拖延下去，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入手。现在队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实际上等于把“文化大革命”与安定团结对立起来，同时也表达了他希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结束动乱，实现安定团结的强烈愿望。

“四人帮”企图利用四届人大篡夺更多的权力，他们不顾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加紧了阴谋活动。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制造事端，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邓小平义正辞严地顶住了“四人帮”的围攻。

经江青等人策划，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说，这么搞不好”，“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叶剑英同志当面交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当时，毛泽东虽然远在长沙，但是对于北京围绕着四届人大展开的斗争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注意。他对于江青等人露骨的篡权活动日益不满。1974年11月12日，他在江青的一封信中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为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又批道：人贵有自知之明。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政治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谈话中，他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能力和工作的。他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他并提议邓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1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在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对江青集团的多次批评，以及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有力支持，有力地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1975年1月中旬召开的四届人大，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月标，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这些都使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唤起了他们的希望。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病情加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遗祸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所面临的重要困难，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从整顿领导班子，批判派性和消除派性入手，排除重重障碍，大刀阔斧地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鲜明、坚定地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注意落实政策，要落实对干部、对知识分子、对老工人、劳动模范的政策，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邓小平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声，使他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心协力的配合下，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排除了“四人帮”的重重破坏、干扰，由点到面，由浅入深，迅速地，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军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整顿初现成效。{ewc MVIMAGE,MVIMAGE,!09100690_0493_1.bmp}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恢复党的正确方针和优良传统。而当这种整顿全面铺开，深入发展时，必然又会遇到同周恩来 1972 年批判极左思潮、整顿各项工作时间同样的问题，即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本身的否定；遇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能否在“文化大革命”的框架和范围里彻底纠正极左的问题。

毛泽东支持过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他反对极左思潮，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行为，以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和生产顺利进行。但是，他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全面整顿的限度。

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就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问题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等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他又说：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这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是他 1958 年有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观点的发挥。他用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来衡量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对社会主义初给阶段中一些不可避免的，有积极意义的事物，如按劳分配带来的分配上的差距，社会分工，某些与社会大生产相联系的规章制度，农村集市贸易，家庭副业，甚至商品生产，货币工资等等，产生了某种忧虑，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或者是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某种基础。正因为如此，他对社会主义中的这些事物及其发展前途，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促使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八、九年，他自己也想结束这种动乱的时候，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社会主义纯洁性，处于一种欲进不能，欲罢不

忍的矛盾处境。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在全国立即又开始了学习这个谈话的运动。在“四人帮”的策动下，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他们把整顿中提出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察觉。1975年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时，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他要求全党“要安定，要团结”。在谈到“反经验主义”问题时，他说，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他批评江青等人，“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并说：“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会上，他告诫江青等：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可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会上，毛泽东反复几次谈到“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不满表现得很突出，对他们的批评也很尖锐，但是，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全局的考虑，他在进行了上述批评以后又表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6月间两次召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对“四人帮”进行批评。1975年7月14日，在一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中，针对江青一伙把持的文艺界中萧条、冷落的局面，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7月18日，长春电景制片厂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影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状共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意见、批示和政治局的批评，使“四人帮”的气焰和篡权活动暂时稍有收敛，使这一阶段的整顿得以比较顺利的进行。

但是，在由于整顿的深入进一步激化了邓小平等与“四人帮”的矛盾以后，江青等人又利用毛泽东要在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局限性，再次

借机掀起了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的逆流。1975年下半年，“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在1975年8月一次有关古典小说《水浒》的谈话，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了一个所谓“评《水浒》”的运动。江青公然编造出一个“《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邪说，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再一次斥责了江青的讲话，但到此时，他对“全面整顿”的支持也快到极限了。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地触及到“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左”的错误政策，越来越深入地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终于，这种发展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全面整顿被迫停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6年2月，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有关这次运动的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批评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还说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在经历了9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后，在经历了周恩来、邓小平两次整顿之后，在目睹了“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备尝“文化大革命”动乱之苦的广大干部群众中，毛泽东这些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措施被否定，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再次受到打击，一些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起用，一些地区派性斗争再起，领导系统重又瘫痪，停工停产，全国再度陷入动荡之中。

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使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加清楚地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长期以来郁积在人们心中的怀疑、不满和愤恨迅速地接近了爆发的临界点。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丧心病狂，与人民为敌，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的悼念活动，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终于引发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毛远新的汇报，对“天安门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提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

六 烈士暮年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1972年2月会见毛泽东的尼克松在其《领导者》中曾这样描述说：“他身体虚弱是很明显的。在我们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经不能很好他讲话”，他“灰黄的脸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尽管83岁的毛泽东思维仍然清晰敏捷，但身体却更加虚弱了。面对着国内动荡的局势，他已深感力不从心了。

1966年，他满怀信心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在长江中劈波斩浪，畅游近15公里；他在北京八次精神焕发地接见1600万红卫兵。他对这场运动的正确性、合理性深信不疑，对自己驾驭这场空前的运动充满信心，但不久，他就发现了这场运动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超出了他所制订的时间表，一次又一次地超出了他所设计的轨道。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由他亲自发动起来的运动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控制了，1973年以后，真正使他感到为难的不是如何进行这场运动，而是如何结束这场运动，如何把从“潘朵拉”盒子里放出去的妖怪收回来的问题了。他曾几次想通过遏制极左思潮、打击极端行为，实现安定团结、恢复生产、工作秩序以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但这种意图很快又导致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甚至否定。而他希望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努力又一次导致了极左思潮再起和政局的动乱。这种两难的境地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毛泽东，这个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建设事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具有伟大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终生热烈追求实现伟大理想社会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这个强烈地希望中国能够早日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民族英雄，他晚年这种壮志未酬的激烈情怀常常透过他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表达出来。

毛泽东爱诗，他爱读诗，爱写诗，诗言志，歌咏言。如果说他在50年代及1966年以前更倾心屈原、枚乘、三李等浪漫主义的篇章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70年代后，他却似乎独钟于辛弃疾、张元幹、陈亮、岳飞等豪放词人的作品。

70年代初，明显地是受到当时运动中各种反复的影响，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吟诵北宋词人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除此而外，还有张孝祥的《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梦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殫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于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有时他还高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当他因眼疾开刀，无法看书时，便叫身边工作人员人给他朗诵这些辞章，经常听用昆曲演唱的《满江红》。

1975年，当他再一次处身于两难的矛盾中时，他感叹自己年事已高，体衰多病而壮志未酬，也常常慷慨悲歌这些豪放派词人的诗词来抒发自己激烈、豪迈的情怀。他有时以年击节，高声背诵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回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政治局委员会谈话、批评“四人帮”时，要叶剑英念辛弃疾词《南乡子·何处望神州》：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望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此时，这些豪放派词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毛泽东如此强烈的共鸣，一方面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力透纸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勇豪迈、慷慨激昂的气概，另一方面，也是作品所透露出来的一种难以压抑的烈士暮年，壮志未酬，抚今追昔，心事浩茫的抑郁苍凉的心境。

毛泽东临终前曾经说过，他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解放了中国，把蒋介石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后一件事，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1976年9月9日，中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逝世。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并使他们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权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党中央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革命生涯中，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特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

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多方面的艰巨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丰富的经验，也发生过一些失误，特别是他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

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晚年，毛泽东仍然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没能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国际上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永远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注 释

第一章 走自己的路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68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

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5月）。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黄绍竑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

《不平常的春天》，《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第二章 社会蓝图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译本）第417—418页，东方出版社。

《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1959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

《力争高速度》，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载《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2页。

第三章 大梦初醒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266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582页。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22页。

转引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37—38页；44页；46页；57—58页。《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29页，426页。

(11)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12)(13)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11页，413页。

第四章 转折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第22页。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1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44—446页；446页。

《周恩来选集》第406页。

农业部，《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1959年9月29日）。

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1959年10月13日）。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第158页，175页。

参见《党的文献》1984年第6期。

- (11)(13)(32)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用家英》第 68 页 ;55 页 ;71 页。
(12)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 58—59 页。
(14)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15)毛泽东 1962 年 8 月 9 日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16)1961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7)1961 年 11 月 13 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8)1962 年 2 月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
(19)1962 年 5 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962 年 5 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1)(22)(23)(29)参见毛泽东 1962 年 8 月 6 日 ,8 月 9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4)参毛泽东的 1962 年 8 月 5 日会议上的讲话。
(25)参见毛泽东 1962 年 8 月 15 日讲话。
(26)毛泽东 1962 年 8 月 9 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会上的发言。
(27)毛泽东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 年 8 月 16 日)。
(28)毛泽东 1962 年 8 月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29)参见毛泽东 1962 年 9 月 24 日会议上的发言。
(30)1962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报》。
(31)参见毛泽东在 1962 年 9 月 24 日会议上的讲话。

第五章 对一个老问题的新答案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

- 《列宁选集》第 4 卷 ,第 408 页 ;525—526 页 ;526 页。698 页 ;700 页 ;405 页。
《毛泽东选集》(1991 年版)第 1438 页。
(14)(15)《党风党纪建设 70 年》第 83 页 ;101 页 ;102 页。
(1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的讲话。
(12)(1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6)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 年 7 月 9 日)。
(17)(49)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同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18)(19)(20)(21)(22)(2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74 页 ;381 页 ;399 页 ;409—410 页 ;451 页 ;434 页。
(24)(25)(26)《邓小平文选》(1938—1965) ,第 283 页 ;284 页 ;287 页。
(27)《陈云文稿选编 (1957—1965)》第 184 页。
(2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49 页。
(29)《农业集体化文件汇编》(下)第 583 页
(30)(31)(32)(33)毛泽东 1961 年 6 月 12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4)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35)(36)《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三期 ,第 33 页。
(37)《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1961 年 6 月 15 日)。
(38)参见毛泽东 1963 年 1 月讲话。
(39)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1963 年 5 月 9 日)。

(40)(41)(42)(43)(44)(45)(46)(47)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
(48)参[捷]奥塔·锡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

第六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1950年6月6日)。

毛泽东1956年7月14日与拉丁美洲两位人士的谈话。

毛泽东1956年9月25日同拉丁美洲的一些党的代表的谈话。

《当代中国外文》第129页;132页;171页;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609—612页。

《人民日报》编部部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

(1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2)(13)(14)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5)毛泽东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16)《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

(17)《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77页。

第七章 文化批判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7页。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63年1月6日上海《文汇报》。

叶永烈《张春桥浮沉史》第122—124页。

第八章 哲人睿思

毛泽东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页。

毛泽东1955年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

(11)(12)(13)(21)(31)(61)(6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5)(26)(27)(28)(29)(30)(52)(60)(63)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4)(15)(16)(17)(18)(1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20)(23)(24)(40)(41)(42)(50)(51)(58)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

(22)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32)(48)(49)(64)《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33)《介绍一个合作社》。

(34)参见毛泽东1958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35)(36)(37)(38)参见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39)(55)毛泽东1958年4月在武汉会议上的讲话。

(43)毛泽东1958年1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44)参见毛泽东1958年

4月的一次谈话。

(45)(46)(62)毛泽东 1958 年 1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47)(53)(56)(57)参见毛泽东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54)参见(33)及毛泽东 1958 年 4 月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59)毛泽东《矛盾论》。

(66)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

(79)毛泽东《十年总结》。

(80)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对四个文件的批语》。

(81)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82)(8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890页

(83)(84)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1963年5月9日)。

(86)(88)参见毛泽东 1964 年 8 月 18 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87)毛泽东 1965 年 12 月 21 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第九章 动乱岁月

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 623 页，625 页；625 页；

转引自王年《大动乱的年代》第 108—109 页；113—114 页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411—418 页；436 页

尼克松《领导者》(中译本)第 279 页

转引自邓力群《介绍与答问》第 83 页。

